



Palestinian walks
Notes on a Vanishing Landscape

[巴勒斯坦] 拉贾·舍哈德

Raja Shehadeh / 著 马永波 / 译 杨于军 / 译

漫步
巴勒斯坦

记录……一片
正在消失的
风景……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拉贾·舍哈德开始漫步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一片正在消失的风景中行走。那些山可能对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很熟悉——直到混凝土被倾倒在花草上，给那些对这片土地怀着深切眷恋的人们带来不可挽回的改变。

七次步行历时二十七年，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山中、在耶路撒冷的荒野上、在穿过死海边的峡谷……每次步行都是在巴勒斯坦历史上不同的时期进行。现在，巴勒斯坦的很多自然资源都无法接近了。对于如何保护它们，拉贾·舍哈德至少用语言文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看待濒危土地未来的新视角。

舍哈德文字优美，带着抒情诗式的忧郁的失落感，对一片瞬息变换充满冲突的土地作了重要的记录。

——《星期日电讯报》

上架建议：回忆录

ISBN 978-7-80225-980-5

9 787802 259805 >

定价：22.00 元

「巴勒斯坦」拉贾·舍哈德著

马永波 杨子军译

漫步 巴勒斯坦

记录……一片

正在消失的

风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步巴勒斯坦 / (巴勒) 舍哈德著；马永波，杨于军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80225 - 980 - 5

I. ①漫… II. ①舍… ②马… ③杨…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巴勒斯坦 — 现代 IV. I38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3669 号

Palestinian Walks: Notes on a Vanishing Landscape by Raja Shehadeh

Copyright © Raja Shehadeh, 2007,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漫步巴勒斯坦：记录一片正在消失的风景

[巴勒]拉贾·舍哈德/著 马永波 杨于军/译

责任编辑：许彬

装帧设计：王梓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130×183 1/32

印 张：7.625

字 数：117千字

版 次：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5 - 980 - 5

定 价：2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侄子 Aziz 与侄女 Tala,

愿他们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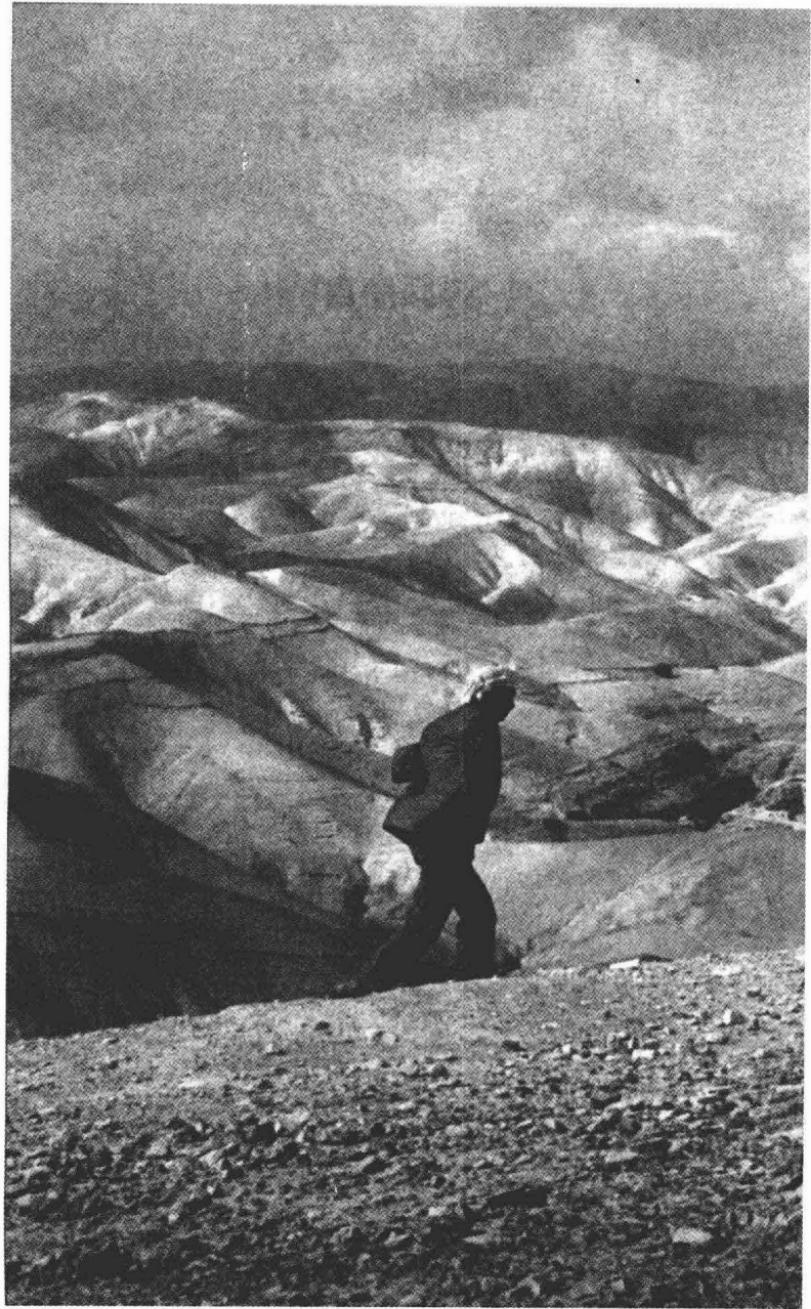
能够在巴勒斯坦的山中漫步。

再版序言

此次新版包括了新近的，也就是第七次漫步，其间作者不幸遭遇两个蒙面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另一次漫步有电视台工作组陪同，重访第一次的漫步路线，遭遇以色列士兵，被对方用枪逼着问话，后平安脱险。

费拉斯·卡斯卡 (Firas Kaskas)，三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在初冬的一天下午和兄弟散步时，被驻扎在同一地点的士兵射杀。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的春天依然将山谷铺满了银莲花和仙客来的鲜艳花毯。我和一群朋友每周五照例一起漫步，我们看到以色列移民不断增多，威胁着被强行开发的脆弱土地，但是我们依然坐在宁静山谷的一棵橄榄树下，看光影在山上层层交错变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仍然期待着这些山峦的未来。一个朋友甚至坚持要用地理时期的长远观点去看。但是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而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些山岭间漫步。



一个巴勒斯坦男子漫步在约特溪谷南边的耶路撒冷荒原（2002年）

导　　言

二十五年前，当我开始在巴勒斯坦的山中漫步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穿越一片正在消失的风景。几百年来，巴勒斯坦的中心高地相对完好地保持着地理原貌，它的一侧向远方倾斜，连接大海；另一侧延伸到沙漠。我在拉马拉（Ramallah）长大，运用想象力可知，我的城市到北部纳布卢斯（Nablus）的土地是和基督耶稣同时代的。我相信，那些山是世界天然的宝藏之一。

我的一生都住在可以望见山的房子里。我把它们当做自己的私人庭院，可以漫步、野餐。而且，在采野花的探险途中，我观察着它们的颜色在一天不同时刻由淡到浓，再由深变浅，在各个季节甚至在无止无休的战争中也是这样。我一直喜欢在山中漫步，不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或者苏格兰高地和边远的岛屿，在那里漫步你可以享受到纯粹的快乐，而不用担心烦扰，不用分心去考虑即将到来的政治和自然灾害。

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开始了我的漫长步行。那时，许多让土地遭受摧残并留下阴影的、不可挽回的改变还没有发生。当时的山林就像庞大的自然保护区，有原始的美丽和该地区特有的自由。本书所描述的七次漫步历时 27 年。虽然每次路线不同，都是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它们于 1978 年开始，2007 年结束，期间我写到我所目睹的该地区的发展，我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我描述了我在拉马拉周围的山间漫步，穿过耶路撒冷荒野干涸的河床以及死海边风景绚丽的沟壑的经过。

长久以来，巴勒斯坦一向是朝圣者和游客到访最多的国家之一。我所读到的描述仿佛写的并不是我熟悉的土地，而是游客们的想象。巴勒斯坦被不断地再创造着，不论是地质学家绘制的地图，还是游客在大量的旅游文字中的描写。重要的不是土地和居民本来的样子，而是观察者的确认和读者的宗教或政治信仰。我只希望我的书不会落入那一类老套。

也许巴勒斯坦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和圣经的想象中心。因此，这片土地要被裁剪来适合记载中的阴森可怕的事件。萨克雷（Thackeray）就是这样描写我所热爱的山冈的：

焦灼的山，阴郁暗淡的橄榄树在瑟瑟战抖，荒凉的溪谷和沟壑散落着坟冢——整个城市弥漫着无法形容的恐怖和悲怆，满眼萧飒凄楚。这地方很适合希伯来历史故事中记载的事件，它们和恐怖永远不能分开。恐惧与血腥、罪恶与惩罚，一页一页连篇累牍。无一页没有暴力行为、惨无人道的屠杀或者谋害，还有用鲜血和恐怖的仪式崇拜的偶像。

(《从康希尔到大开罗的日记》)

仿佛游客们经过艰辛的旅程来到巴勒斯坦，却没有找到他们所追求的、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土地，于是他们强烈地厌恶起真正的所见所闻。马克·吐温写道：“巴勒斯坦坐在涂抹灰烬的麻袋布里悔恨，它荒芜丑陋，不再属于当今世界。它只对诗歌和传统来说是神圣的——它是一个梦境。”(《弱智出国记》)

西方世界和巴勒斯坦的对抗也许是有史以来上演的最久的戏剧。这不是我的戏剧，虽然我也是里面的一个小角色。我愿意思考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我始终在这里生活着，直接去看它，而不是透过文字的面纱，那些文字通常都充斥着曲解和变形。

但是我还是免不了在文学场景中对这个国度进行描

述，“恐惧与血腥，罪恶与惩罚”的当代文化玷污了它的美丽。也许，很多人会在电视屏幕严酷的背景下读这本书。他们在阅读七次漫步中美丽的乡间风光时可能会经历不和谐的片刻：无始无终地充满冲突斗争和流血牺牲的土地真的能够如此平和宁静吗？不过我仍然希望读者把疑问放在一边，以开放的心态去接近它，我希望让读者相信，尽管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它饱受摧残，巴勒斯坦这个国度却依然这么的辉煌和壮观。

长篇剧作还没有结局，舞台已经更换为西岸的山冈。以色列规划者把犹太人聚居区安排在山顶，让他们只能望见其他的居民区，并同时战略性地主宰着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村落所在的山谷。如果你发现路标上的阿拉伯村名被过于活跃的居民涂黑了，请不要大惊小怪。

布鲁克林出版的宣传册，吸引着人们成为伊曼纽尔（Emanuel）超级正统的西岸居民，激发着人们对风景的想象：“伊曼纽尔市，位于海平面四百四十米以上，有美丽的海滨平原和犹太山脉的景色。绿色橄榄园点缀其间，充满田园风光的静谧。”再造出圣经般的如画的风景，成了对这片土地拥有古老权利的证明。

在评论这样的广告时，以色列建筑师拉非·塞格尔（Rafi Segal）和伊亚·维兹曼（Eyal Weizman）敏锐

地发现了“残酷的悖论”：使风景成为圣经式的东西的正是传统居住和耕作的梯田、橄榄园、石头建筑和家畜，这一切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创造，却被犹太人接管了。种植绿色橄榄园并使土地成为圣经式的人们却被排除在全景摄影以外。巴勒斯坦人创造了风景，然后就消失了。^①土地被认为是没有人在场的，这样，以色列的犹太人就可以占用了，从此成为它们的所有者。

以色列开发协会指示它的研究者，要他们提供“从约书亚到我们这一代的内盖夫统治者的持续的历史线索的具体文献”。要达到这个目标，介于其间的年代和当地居民就要被删除和否定。在这个进程中，我和我人民的历史遭到了歪曲和误解。

这样的态度正好符合西方旅行者和殖民者的古老传统，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偶尔注意到也是带着偏见和嘲笑，仅仅当做来自他们想象国度的消遣。所以，萨克雷曾经这样描写耶路撒冷城外一个无名的阿拉伯村庄：“一个海狸的村庄，或者蚂蚁的殖民地，居住条件和那些堆积在平原上的阴暗小棚屋没什

^① 拉非·塞格尔和伊亚·维兹曼编辑，《山，建筑的高度原则，民间职业》，《以色列建筑的政治》，伦敦与纽约，2003年版，第92页。

么两样……”（《从康希尔到大开罗的日记》）

我是作家和律师。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从法律角度描述有关的土地纷争，呼吁反抗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土地开发成犹太殖民地。现在我要叙述这些案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我还描写了这么多年我为之献身的土地，同时挖掘出这被分割的土地的神秘和我对它的不确定未来的担忧。

自从听说下届政府准备在改造我们山地的计划中支持在占领殖民区建立居民点，我就像一个人被告知患上了不治之症。如今，当我漫步山间时忍不住会想，我能这样漫步的时间已然不多。也许折磨群山的这些恶意增强了我对漫步经历的感受，让我不能泰然处之。

1925 年，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达文斯·米喀蒂 (Darweesh Mikdadi)，带着耶路撒冷政府高中的学生远足，通过巴勒斯坦多岩石的风景，一路走向叙利亚青葱的平原和丰饶的山谷，然后穿过黎巴嫩的小溪、河流和岩洞。学生们沿途参观了著名的、几个世纪前留下的战争遗址，受到慷慨村民的热情款待。1948 年战斗继续时，这样的旅程就不再可能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巴勒斯坦地理学家卡玛·阿卜杜·法塔 (Kamal Abdul Fattah)，带领比尔泽特大学的

学生，穿过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进行地理考察。有一年我加入了他们，我们共同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三天，从最为富饶的北部到沙漠的南方，观察地形、熟悉地质构造形成及地理历史与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关系。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谓大开眼界。但自 1991 年以来，西岸和以色列之间的活动受到限制，这样的旅行也不再合法。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进入加沙地带。一个拉马商人发现去中国进口藤椅比去加沙还要容易些，虽然只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藤椅制作在那里曾经是很兴盛的行业，现在却到处堆弃、满是灰尘。80 年代初发布的居民计划已经系统执行，要求巴勒斯坦人集中在孤立的土地上，非人道的计划带来了分隔墙，设计不是沿以色列和西岸边境，而是包围居住区，把它与以色列合并，像用匕首一样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刺穿。所有这些开发的结果是，去学校的较短路径都遭到限制，学生只能在检查点之间来回奔波于遗弃已久的线路。巴勒斯坦围区越来越像犹太人居住区。很多村民只能在有同情心的以色列人和国际团结组织的保护下从自己的橄榄树上采摘橄榄。2005 年选举日，一个卖糖果的人告诉我说他不想参加投票。“我已经五年没有离开过拉马拉了，为什么要我参加？这些选举能带来什么改变？”随着巴勒斯坦世界

的缩小，以色列的地盘在扩大，更多的殖民区建立起来，永远地破坏了溪流和山峰、削平了山脉、改造了宝贵的土地，而很多巴勒斯坦人并不了解这些状况。

仅仅三十年，就有近五十万犹太人在 59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定居下来。维持这么多人口所必须的基础建设是对土地的损害，大量的混凝土被倾倒在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原貌的山地上，建立整座整座的城市，这不能不引起注意。我目睹到靠近我长大的地方已被全面改造，现在我就在描写它。美丽的溪流、泉水、山崖和古老的废墟都被摧毁了，被那些自称对这片土地无比热爱的人们。通过努力记录这片土地在经历灾难之前的感觉和样子，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够用我的文字，保存永远失去的一切。

在巴勒斯坦，所有溪流、泉水、小丘、陡坡和悬崖都有名字，通常都有特殊的意义。一些是阿拉伯语，一些是迦南语或亚拉姆语，证明这片土地是多么古老，千百年来它是如何被不断地居住和占领。我以前全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和我一样的人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山间漫步，了解这类地方历史知识的人少而又少。经过地理学家卡玛·阿卜杜·法塔和他的学生的努力，一些长久被人们遗忘的名字恢复了。他们采访了很多仍

能记得的老人。

经常，在漫步回来的路上，当黄昏的微光降临，沿途的石头在朦胧中变形，我开始看到某些石头上的轮廓和形状，就把它们搜集起来带回家。我尽自己的力气拼命地多捡，但是一回到家就丢弃一边。房间无情的灯光让它们的魔力消退。其中只有一块，我保存了很久。灰白的石头仿佛人面，一条裂缝如张开的嘴，在惊恐中哀号。我应该保留这块石头，作为折磨这些山的证据。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写作本身就是第八次旅行。我不知道我寻求的方向，或者结局会如何。写着写着，我才注意到，有时叙述过于繁冗，并为自己对19世纪旅行者批评的片面而感内疚。整本书中，殖民者，即故事中主要的坏人形象，不断出现。我蔑视他们对我的土地和居民侵略性的意图和行为，但是我很少正视他们。他们被简化集中，就像19世纪的旅行者把当地的阿拉伯人笼统化一样，因为想把他们从所描述的土地上删去。不同的时刻，我从远处观察着殖民者们。担心他们的行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问自己，他们究竟有没有看到我和我的人民。

第七次旅行，我们遭遇了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殖民者，他在同样的山上长大并生活了二十五年。我知道他

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是基于谎言。他也许是在专属于他的人民的国度里那种典型的虚构事实中长大的，尽管那个地方就在拉马拉附近。不会有人告诉他，那土地是从几公里外的巴勒斯坦人那里剥夺来的。但是，不管构成他的世界观的神话如何，我怎么能说我对这些山的爱就能抵偿他所付出的爱呢？这种认领对我们的未来和我们尊敬的国家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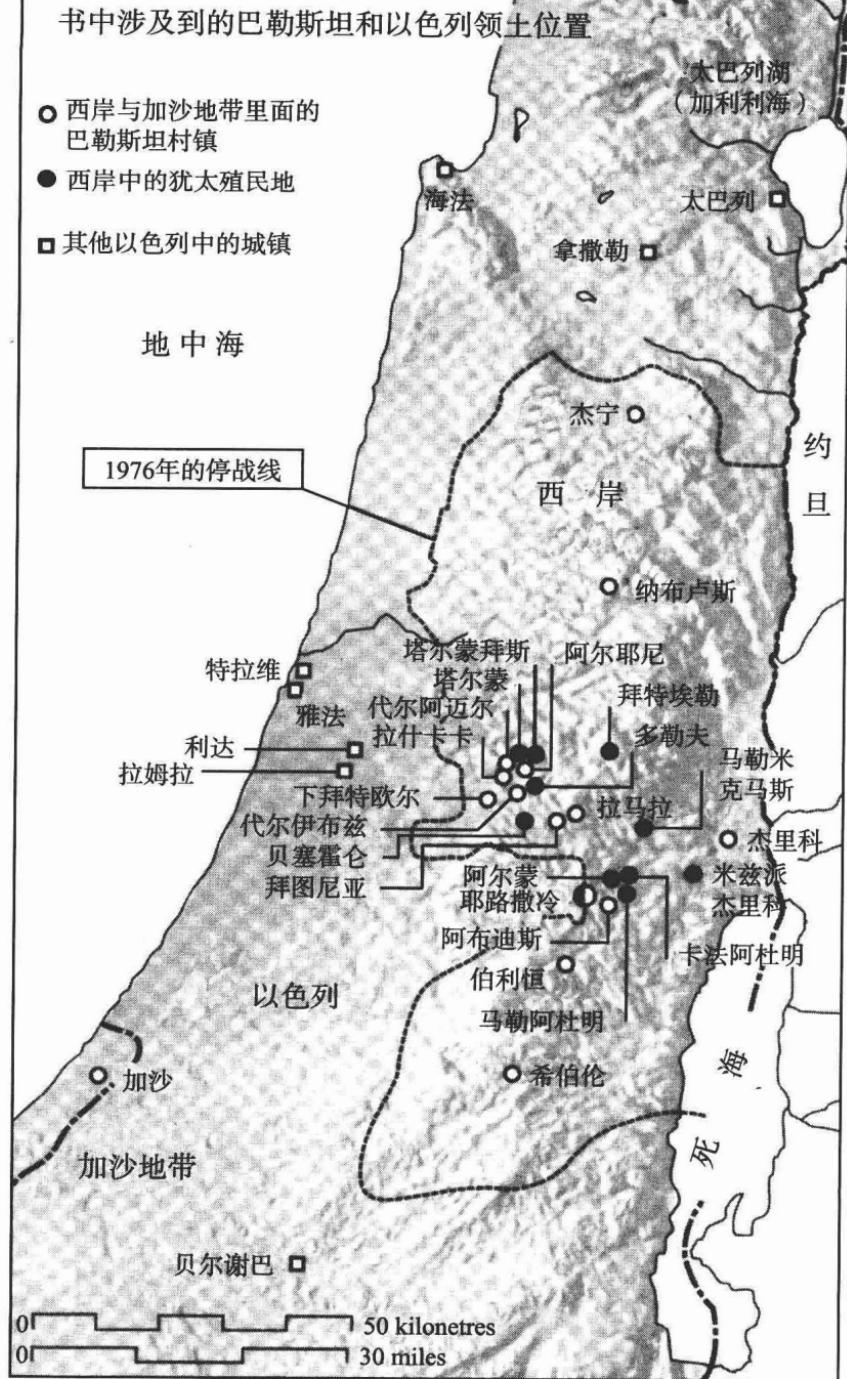
随着拉马拉居住区附近这次不可避免的遭遇，本书的写作，即我的第八次旅行，也在杂乱不安中结尾了。

书中涉及到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土位置

- 西岸与加沙地带里面的巴勒斯坦村镇
- 西岸中的犹太殖民地
- 其他以色列中的城镇

地中海

1976年的停战线



0

50 kilometres

0

30 miles

目 录

再版序言	i
导言	iii
漫步 1 苍白的山神	
…从拉马拉到哈勒沙…	1
漫步 2 阿宾纳土地案	
…从拉马拉到安昆亚…	43
漫步 3 幻想的人口	
…可兰，死海和德拉齐溪谷…	103
漫步 4 沙漠中的修道院	
…纤特溪谷到杰里科…	137
漫步 5 你是如何超越它的	
…加尼亞、拉斯卡卡和迪尔阿瑪…	165
漫步 6 想象的漫步	
…戴博谷…	189
尾声 戴面具的牧羊人	
…拉马拉到艾恩伊扎…	213

漫步 1
苍白的山神
从拉马拉到哈勒沙

在新千年最初的动荡年代里，我感觉我在巴勒斯坦的时日不多了。但是究竟是我还是巴勒斯坦会首先消失，还没有答案。它中间建立起城市，工业园和主题公园，宽敞的多车道的高速公路，更适合美洲中西部的平原，而不是巴勒斯坦的丘陵地带。二十五年内，世界宝藏之一，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会感到熟悉的圣经风景，正在被改变，而且某些部分已经面目全非。

这些山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拯救这片土地斗争的成功与失败也是我的。但是，斗争失败带来的持久痛楚终将会在某一刻被阿拉伯人、犹太人和世界上任何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所分享，对如此超然美丽的地方的持续破坏会让人们同样感到悲伤。

小时候，我听说祖父萨林（Saleem）法官最喜欢在



夏天来拉马拉，和他的表弟阿卜·阿米恩（Abu Ameen）一起去漫游。离开潮湿的沿海城市迦法和蠢笨徒劳的殖民地行政事务，还有他所憎恶的政治。一般都是年轻人喜欢这样的探险。他们会携带一些食物，去开阔的山上，消失一整天，有时是几个星期甚至数月。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去漫游（sarha）就是漫无目的地游荡，随心所欲，无拘无束。Sarha一词的动词形式意为一大早就把牛羊放到牧场上，让它们自由游荡和吃草。通常使用的名词是经过口语化和通俗化讹误的经典单词。一个漫游的人没有目的，不受时空的约束，按照心灵的指引，让所见所闻滋养心灵，回归自我。但是，并不是任何远足都可以称作漫游。漫游意味着放任纵情。是不需药物的心灵激亢，那纯粹是巴勒斯坦式的。

本书是在不同的巴勒斯坦山间七次漫游的系列，穿越时间和空间，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古今不同的巴勒斯坦人——我祖父的表弟、石匠和农夫，最近几次是政治活动家，他们是与我一起从事反抗破坏山林斗争的同事。我们还遇到一些同情心较弱的人，他们并不理会我的漫步。每一次，我都邀请读者加入我，我希望通过描述在山间的见闻与感想，让读者感受漫步巴勒斯坦的独特经历。



有人告诉我，拉马拉周围的山冈曾经就像一个种植园，泉水边有房子，山坡上散布着橄榄树，葡萄藤装饰着比邻的围墙。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在伦敦学习法律回来，这些山不再用于种植。除了少量的橄榄树，什么都没有了。它们变成了大型自然保护区，有泉水和小池塘，青蛙自由自在地跳跃，鹿可以随便在矮墙边跑跳、走动。

拉马拉大约五百年前由五个部落建立起来。居民生活主要靠周围山上的种植。我的家族属于这些部落之一，但是在 20 世纪初，他们就离开了拉马拉，放弃农耕加入迦法的职业阶层，把那里当做他们的家了。我的祖父萨林在英国委任管理的巴勒斯坦法庭做律师，我父亲经营 1935 年自己开办的律师事务所。1948 年，他们都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祖父被流放到贝鲁特 (Beirut)，两年后在那里去世。

和大多数拉马拉家庭不同，我们没有橄榄树林。收获橄榄的季节，我们是少数不用离开城镇去山里的人家之一，而别人要在山上辛勤收获，劳碌一整个星期。我们仅仅是春天野餐时才上山，那时会有几个月时间，林



木葱郁，溪流湍湍。而其他时候，离我们房子这么近的山也显得遥远陌生，只是一种可笑的缓冲物，把我们和被侵占的迦法所在的地平线隔开。傍晚我们充满向往地眺望着，遥远的地中海海滨灯光闪闪。

我第一次接触山地用语是在法庭上，当时我还年轻，跟着父亲，他是有名的土地法专家。他接了很多未注册的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纠纷案，他们用山地农夫的用语，按照物理特点描述自己各自土地的边界。在那里，我接触到了这类词汇，如 sha'b, a'rsa, sabeel 和 by-dar。后来，当以色列占领军越来越有兴趣把巴勒斯坦分给犹太殖民者时，我向以色列法庭呼吁反对土地获得命令，这些文件含义的模棱两可是用来夺取农夫的土地所有权的。

土地对拉马拉居民的性格有很大影响。山坡上的狭长地带很肥沃，但难以耕种，主人要依赖无法预测的雨水和泉水。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内向而不善交际，而且多疑、狭隘和以自我为中心。出去漫步，天高地远，一望无际，没有羁绊，让灵魂自由驰骋，对拉马拉居民是一种解放，因为他们常年被禁锢在崎岖的山里，看不到开阔的地域或大片丰饶的田野。

在我家里，这种做法和祖父的表弟阿卜·阿米恩有

关。我长大时他已经老了，患了中风，走路要拄拐杖。我不记得他提过漫游的事：中风使他讲话很困难。我印象中他是矮个子，很安静，在镇上老街区的黑暗洞穴般散发霉味儿的房子周围拖着脚走来走去。我从别人那里得知有关漫步和小森林的事，过去他夏天在自己的田里耕作，住在开阔的野外，萨林法官可以经常去看望他。

我读书回来，在拉马拉从事法律工作，该职业已经开始了十一年，方兴未艾。法律上阴险但突出的变化强烈证明了以色列对占领地——我的家园的长期政治策略。好像很少人关注这些。人们那种令人不安的沉默，让我焦急和担心。因此，山冈开始成了我反对占领的避难所，传统巴勒斯坦社会加在我们生活上的限制，明白又隐秘。我在其中行走是为了获得暂时的逃避和将来的重生。

起初我不太熟悉路，我会离开路径，攀爬而上，残垣断壁上会有石头滚落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新旧路径的交错是非常不稳定的，我像走模特步一样沿着山的边缘行走，那里有寻找水和食物的绵羊和山羊新近踩出的路径。有一些路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来了，其他的没有。我发现我很擅长独辟蹊径，虽然我在城市里很容易迷路。不久我开始向山的纵深处探险，发现了新的



地形，即不同岩石形成的山地。那里花儿开放得早一些，因为地面低洼更靠近大海。

拉马拉周围的土地多姿多彩，但都不够开阔。中心高地主宰了西岸大部分地区，靠近城镇的山谷狭窄。山势险峻，有的特别陡峭，没有非常高的山，只是丘陵。越向西走，海拔越低，地形趋于平坦，并渐渐下降接近海滨平原。满眼都是山丘，一座接一座，仿佛在波涛起伏的大海里。这种地形是由巨大的构造力向东推进造成的。仿佛大地被一只强大的手攫起，碾碎，这种压力的最终结果是约旦断裂的长峡谷，约旦河就在那里流淌着。大地从来不能安静地延伸向平原峡谷，平缓的河流，却总是不断被弯曲、倾轧，以致断裂。大地表面就像巨型的核桃。

在扎伊尔 (Jazreel) 山谷的富饶平原，在卡梅尔 (Carmel) 山下伸展到西岸的吉尼，还有加利里 (Galilee) 险峻的山峰。16 世纪前著名的战斗大多是在那里发生的，不同时期入侵者的战壕和城堡废墟还历历在目。这也是贸易和朝圣的路线。不过没有入侵者或朝圣者穿过拉马拉的山丘。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城市，就在十英里以南，穿过距拉马拉只有几英里的山谷，经过狭窄的沿海平原就可到达。大型军备武器无法被运过周围破裂的地形。

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占领者的。到了 1901 年，第一条连接拉马拉和耶路撒冷的柏油马路才被开通。

◆

1978 年春季的一天，我回到拉马拉不久，在巴勒斯坦山丘的深处意外地发现了阿卜·阿米恩的传奇小森林。

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季，阴雨连绵，从整个 4 月一直到 5 月的前几天，对世界上的这个干燥地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雨停后，我等了两天就出发漫步了。太阳出来了，地上也不是太泥泞。天空碧蓝，偶尔才有散落的云遮住太阳，非常适合行走。

我那天的起点是拉马拉西北邻近的英国国教学校后面，沿着新铺的路，向北朝着尚未完工的住房开发工程，那是当时城镇最接近山丘的地方。我几乎立刻找到了路，一走上去，一种平静祥和的气息就把我笼罩了。我可以继续前进，不用担心，只管一边走一边欣赏周围的美景。

慢慢地沿着一个叫鸭子山的山谷西边走去，它因卧在山谷上的样子就像一只鸭子而得名。沿路有大片的野花开放。小型的蓝色鸢尾花只有几厘米高，粉红色的亚麻也贴近地面，略微高一些的是马耳他十字（皱叶剪秋



罗) 和金字塔兰, 多彩的薄地毯覆盖着动荡的土地。我走得不急不缓, 朝花溪行去——这是一个多么恰当的名字啊。经过山肩缓慢的下降, 通过一个褶皱带, 下坡然后再上坡, 沿对角线进入山谷。

我发现溪谷的草和各类植物更长更茂盛, 因为这里有杏树河清甜的水的滋养。我走过去, 倾听水滴落入池塘的轻盈音响。然后, 我俯身向岩石空隙渗水的地方望去, 伸出手让清凉的水漫过手掌。乱石杂草丛生, 山泉急需清理, 否则水就会涌出。我坐在旁边, 闻着潮湿的泥土气息, 看着河道对面苔藓覆盖的棕色悬崖。惊异地发现每一个隐蔽处和裂缝都生长出樱草植物, 它们好像总是在为其挡住正午阳光直射的岩石间生长, 拥挤在裂缝里, 保护球茎不会干枯。尽管位置不稳定, 它们纤巧的花笔直, 头上有牧羊人戴的那种小帽子似的保护。大大的斑叶和葡萄叶相似, 只是叶面更厚、颜色也更深。它们神奇地从陡峭的岩石上垂下, 仿佛悬挂在空中。崖上山势越发险峻, 从这个有利地点望去, 高大而令人敬畏。

我在附近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别墅 (qasr)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堡, 即主要是石头结构的圆形建筑。它们点缀在大地上, 农夫可以用来储藏物产和睡在开阔顶棚上。我的祖父萨林和叔祖父阿卜·阿米恩漫步时就是在

这样的房子里露营。在斜坡上建造这样的房子一定需要很好的技术才行，而且它们已经矗立了一百多年了。进去参观前，我看看周围的环境。仿佛大地迸射出它的美丽和颜色，从怀中撒出它精美的礼物，没有任何人类的干涉和参与。我想对着这绚烂的景象大声欢呼。当我叫着“S—A—R—H—A!”（漫步）时，我感觉我打破了曾经长久笼罩这个地方的沉寂。我的叫声在一个又一个山谷里回响，返回到我身边时越来越微弱，最后我感觉自己仿佛可以触摸到整片风景。

沿着阶梯形的墙生长着沙漠座莲，树丛茂密的叶子衬托着浅粉色的花。它犹豫着爬过岩石，在灰色的背景下显得葱绿，好像是有人精心挑选来装饰这面古老的墙壁似的。墙上的石头也是仔细选材堆砌而成，挡住土层，这么多年经历了无数次雨水或是洪水，竟然没有一块脱落。在整齐的岩石间还有茂盛的樱草植物。它们的花呈三十度角立着，满墙都是粉红、红色的小水滴。在两层的空间处，是三级宽宽的台阶，方便两个花园间的走动。台阶旁是黄色金雀花，绿色的叶子又长又尖。清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再低一些是高高的白色常春花，然后是一簇簇的蓝鼠尾草。甚至沿着墙的某些部分生长的长草也增添了色彩和纹理质感。当我抬头望向另



一层，我看见另一个美丽的花园。神话般的几千年历史的橄榄树让它显得幽雅，浅根像密集的动脉缠绕在一起，牢牢抓住地面，形成完美的木质凿痕的座椅，可以坐下来休息，把背靠在树干上。花园以上，还有花园。这一层的宽度足够两棵橄榄树立足，被花草的彩色地毯围绕，一路延伸到墙边，连接着上面的另一座花园，一层又一层，一眼望不到顶。我感觉我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就在这房子旁边，饱尝造物主奇异的美景盛宴。曾经住在这真正伊甸园里的人是多么幸运啊。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9世纪中叶的记录是多么不恰当。他把这个地方描述为：

整个地域弥漫发霉的气息——麻风病般的惨白，腐败岩石的碎片像过期的干酪一样嘎吱作响，仿佛被啃咬着，喃喃而语——纯粹是创造的废物和垃圾——就像迦法城门外的垃圾——仿佛朱迪亚^①整个就是这样的垃圾积聚而成的。

（《欧洲和黎凡特旅行志，1856年10月11日—1857年5月6日》）

① 朱迪亚（Judea），古代罗马所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

我不想在西方旅行者的诽谤和不实之词上浪费时间，而是把思路转向阿卜·阿米恩，想象他是如何在这里度过许多夏天的。生活在古堡里有这么艰难吗，以致使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像我这样看一看这些奇异的环境？也许他不需要停下来看。也许他所有和萨林一起在山中的时间就是一次长长的漫游，这是我可能永远无法做到的。

干涸河床旁边的池塘积聚着泉水，里面有大量青蛙，高高的荷兰薄荷、普通的芦苇、长长的海藻漂浮水上，这在干燥的山里是罕见的。河道的这部分比较宽阔，叫做加斯亚（Qasrya）溪谷，两边都是低矮的山丘，仿佛向后倾倒。旁边是几条小溪，包括茴香溪和王座溪。我离开加斯亚溪谷，开始爬北部的高山，那里是Khirbet Sakrya 废墟，只残存着几间石头房子。

朝北走，我左边的山坡上没有梯田。我想，要花费多大力量才能把这里改造成梯田啊。看着这荒野的山，计划怎么细致地划分它一定是很可怕的。人们怎么知道在哪里建造直线的阶梯式墙，或里面只够种一棵树的弯成圆形的围墙呢？他们一定是非常小心地按照自然地形的轮廓，记住整个坡度才决定如何划分的。无法搬动的巨大岩石就被留在原地，随处可见。梯度沿斜坡蜿蜒而



下，一边连接河床，另一边向上，随褶皱带弯曲，总是留下一条通道，方便骡拉的手扶犁通过。有陡坡的地方都修成了缓缓下降的阶梯。我的祖先就是这样开垦了荒野，拥有并安于属于自己的这块土地。

我正要继续走时听到一阵沙沙声。我担心是一群野狗。我颤抖着向上望去，看见七只灰色的瞪羚，颜色接近岩石，它们跑上了山丘，修长的腿迈着大步，轻松地跳过大块漂石，没有碰落一块碎石头。

我继续向上，跟随着自己的沉思冥想，寻着百里香强烈而短暂易逝的香气，它们成片地长在山间。忽然，一只灰色巨鸟不知从哪里朝我飞来，打破了我的安宁，它的翅膀伸展开有一米宽，飞向对面的山上，停在一块岩石上，等待着看我是否会去打扰它的巢穴。我快速离开了。

转过大山，一片新的景象展现在我面前。阿卜加什（Abu Qash）村南边的山像汹涌的海上大浪一直向西奔腾。我现在要经过雨溪，沿着它有一条很好的路通向村子。越过灌木丛，我的手拂过矮矮的树丛，牛至的清香萦绕。我看不见另一片使人难忘的壮丽景色，我朝它走去。

小路引我走到背面，蓄水池一定是庄园的主人挖

的。我走到生锈的金属盖子旁，然后进入田野，石头都被清理了。一片松树林，树枝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我绕到前面。站在门前，忽然感觉到应该有人家住在这里。但是没有人在家，一切都被废弃，也许还有灵魂徘徊。这次漫步，我至少经过了十二座这样荒芜的庄园。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离开了，生活方式不存在了，主人搬去了别的地方。有时候土地可能无法留住开垦它的人，更有利的生存机会在石油丰富的海湾和新世界招唤。当我在他富丽堂皇的华盛顿郊区的房子遇到来自拉马拉的法利德时，他告诉我30年代末他在拉马拉长大，家里穷到没有钱给他买鞋子，一年接一年都要穿同样一双越来越显小的鞋子，在拉马拉长大，最深的记忆就是穿着夹脚的鞋子。

根据以色列法律，法利德和我家人的财产要被没收，归以色列国有，供以色列犹太人使用。因为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并进行第一次残酷的人口普查时，没有住在那里的人们都视为外居者。这些法律我读过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巴勒斯坦人只有他居住地财产的拥有权。一旦他离开，不论何种原因，他的财产都不再属于他。“归还”给以色列制度所认为的原来的合法主人，即犹太人，不论他们



在哪里。放弃财产，起初在一些地方作为经济强制，另一些时候作为选择，获得了法律和政治含意，带来可怕的后果。

我停下来休息，朝庄园大门里扔了一块石头，不是为了驱赶鬼魂，因为我不相信有什么鬼魂，而是吓走可能潜伏在里面的动物或爬行类昆虫。然后我低头走了进去，里面的空气因动物粪便而污浊不堪。刚好有一点儿光透过石缝，让我可以看见圆形结构内的旋转楼梯，它通向第二层。我手向前伸着摸索探路，在半明半暗中爬上去，屋顶很矮，我必须低着头。出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二楼，这里有深开的窗子，窗台很宽，不像一楼那么暗，空气也清新一些。光从低低的窗子照射进来，在侧面潮湿的石头上发出反光。我不想久留。还有楼梯通到房顶，我走上去。这座非常高的两层楼房子顶棚却很低矮，周遭有半米高的斜面墙。没有铺木板或砖，而是覆盖着土和鹅卵石，里面还有小草长出来。

我在房顶也没有停留很久，太阳很高很烈。我走下来感觉阴凉舒服了一些，蜷缩在窗台上休息。

窗外山谷那边有田野。地面有梯度完美的梯田，橄榄树分布均匀，之间的石头都被清理掉了。周围荒凉混乱，梯田的梯级修到一半，其间有很多灌木杂草丛生。

我想这房子的主人会是谁，他是做什么的呢？我可以想象他坐在窗子旁边，就像我现在这样，俯瞰他的财产。也许他有几个孩子，他从瞭望塔看着他们，大声命令着：“嘿，木聂尔，把那边的石头捡起来，犁一下李子树旁边的地。”“法利德，给那边的茄子浇点儿水。”因为有蓄水池，他们除了果树还可以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收获劳动果实的时候，一定会向东走路或带着骡子去阿卜卡什（Abu Kash），然后进入拉马拉。也许和我走的是同样的路呢。牵着满载货物的骡子，他们一定要多花些时间。

时间仿佛在这个房子里凝固了，进入了一种永恒的现在，我能够通过这个建筑奇观和我死去的祖先联系起来。这就是我长久渴望的漫游吗？我盼望着，期待着，我的目光落在离大门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我想要更仔细地查看它，就走下黑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一楼，就像我刚才进来时一样，低头穿过小门，到开阔之处。等眼睛刚适应了光亮，我就开始认真查看起这块巨大而摆放奇特的石头来。

它好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又不属于任何地方，奇怪地倾斜着。它在这里干什么？旁边的石头都清理了。是不是这块太大就留了下来？或者是什么人把它



搬到这里的？但是为什么呢？这么大的石头放在花园中间会有什么用途呢？我开始围着它转，细看，它表面有残留的泥土。我开始刮，可是越刮好像泥土越多。这让我更好奇起来。我会发现下面埋着什么呢？我挖得越深，土变得越硬，因为下面的土密度更大。徒手挖不了更深了，就去找来一块锋利的石头用作凿子继续挖。土是如此硬，我得用另一块石头把凿子敲下去。这样我就可以一下凿出一大块土，土碎了，露出石头的一大部分，这时我才发现石头实际上不是矩形的。什么样的自然力量把这块石头凿空了？

现在发现了这石头的弱点，我的工作就容易多了。很明显，石头的背后比平行等高的两边要高，这不可能是大自然的偶然杰作。一定有人凿刻过它。现在我加快了动作，不管土散落到什么方向，很多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我的嘴唇上有泥土的气息，我只是吹掉它，继续工作。一层细腻的土从石头表面脱落，露出清晰的金属凿刻的痕迹。那么这是雕塑家的杰作了。不过这是什么？他想要创造什么呢？背面是尖锐的角度，但是边缘线条柔和弯曲。它们看起来像两只胳膊，手爪，或是法老的斯芬克斯雕像？我的心跳加速了。我感觉我正处在发现的重大时刻。我更起劲地刮着，泥土

飞落到我的脸和衣服上。我浓密的眉毛和头发都覆盖了一层细细的土，可以想象，我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疯狂的活雕塑。很快我就已经挖出五十厘米深的土，到达石头的底部。当我的手拂去最后一层灰土，我发现我清理出的是一个座位的中空部分。

我转身坐在上面，立即发现自己坐到了一个比例精确的石椅上。深度和角度刚刚好，支持着背部。高度也恰到好处，让我的短腿平放到地上，减轻了脊柱的压力。胳膊肘舒服地放在扶手的凹处，也刚好符合我胳膊的长度。不管是什人设计了这把椅子，他的身材一定和我的比例相似。我安坐在这个纪念碑似的座位上，不想动。

柔和的风吹着我满是灰土的脸。我的全身从脖子到脚都很放松，我坐得更安稳，平和宁静的气氛笼罩着我。这个角度的视线并没有被房子挡住，可以看见整个田野，我假设自己是这个夏日别墅的主人。他不但拥有这房子还有王座。这时我记起，听说祖父的表弟阿卜·阿米恩在森林里的一个孩子在他房子旁边有一个王座。这就是他的吗？这里就是我祖父萨林和阿卜·阿米恩过去漫游过的小森林吗？

当我坐在王位上，松林的沙沙声就像一个家庭围坐



在花园聊天。我倾听着，阿卜和他的生活开始回来了。

他是一个安静的老人，头发灰白，拐杖弯曲的一段就像他的光头顶一样光滑。小时候我非常好奇，一个像阿卜那样普通的人跟拥有一幢别墅和王座好像很不协调。直到后来我意识到别墅和城堡完全不同，除了名字都很夸张。一天，有人说我们房子旁边那座坍塌的石头房子就是城堡。那以后我就只对王座好奇了。

在我家附近田野里，几乎半倒塌的城堡一定是在这里还没有人居住时就建好了的，这些房子只在远离集中建筑区的地方才有用。我孩提时代的朋友伊萨米瑞（Issa Mitri）和我经常在快要倒掉的房子上玩耍。我们假装有神仙住在石头下面，如果把石头翻开，他们就会逃掉，所以我们从不敢走进房子。当我听人说阿卜去了山里，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时，我对他特别崇拜。很难想象独自在荒野中待上半年；很难想象独自漫游和生活在森林里的探险者阿卜，与我所知道的阿卜是同一个人。

阿卜·阿米恩，他的名字是阿奥（Ayoub），我父亲的二叔。他和我祖父完全不同。小时候他们去同一间由英国教会建立的小学。不像他的表兄，阿奥不喜欢上学。他觉得太拘束。学校没有给予他认为是实用的知识。萨林是聪明的学生，经常反驳老师，他似乎懂得很

多。阿卜·阿米恩觉得表兄很讨厌，又爱搞破坏。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费力气学习，为什么把教育看得那么认真。他的策略是混日子，然后他就可以离开这个叫做学校的监狱。

他们都来自普通家庭，没有土地。不过阿奥决心要拥有土地。离开学校后，他计划做石匠。石匠活儿很多，他会努力赚钱。然后会有足够的钱买下靠近拉马拉的一块地。开垦好之后，就利用他的石刻技术建造大宅，让它成为山里最好的房子。他会结婚，生小孩，那时幸福就圆满了。而萨林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渴望，听到阿奥说出自己的计划时他感到惊骇。

“什么？”他不可思议地问他的表弟，“石匠？这就是你立志要做的吗？”

“那有什么不妥吗？”

“难道你不想读大学，不想提高自己了吗？”

“我这样很开心。石匠会有很多活儿，不会失业的。你认为这很容易吗？很复杂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我自信。这个学期一结束我就开始。”

“所以你就不认真复习准备入学考试了？”

“考试有什么用？如果我成功了会有人资助我读完大学吗？”



“这不是借口。你可以自己努力，就像我计划的一样。”

“为别人工作，而我自己有干不完的活儿？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待在这儿，在拉马拉。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改变。”

萨林坚持自己的计划，去美国学法律。他没有回拉马拉，这里没有他的工作。结果他在迦法（Jaffa）的英国委托的法庭上做律师。虽然喜欢法律，他却不喜欢英国人。他在那里住到 1948 年，像其他居民一样被驱逐，和家人搬到了拉马拉。最初几天，他住在阿卜的房子里，因为它的墙壁厚，可以抵挡飞机的轰炸。但是只维持了几天，萨林就把家人留给阿卜，独自去他在山里的夏日别墅了，那是用阿卜挑选和切割的石头建造的。一个月后他设法离开了拉马拉，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住在这里。他的表弟没有原谅他：“他独自离开，把我留给他那难以相处的妻子，朱莉娅（Julia）。”

他过去常常抱怨。萨林后来去了贝鲁特。那是像迦法一样的一个海滨城市，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萨林到处旅行时，阿奥一直待在拉马拉。事情比他预想的时间久一些。他干了好几年才有钱买土地。但是当时正处在一战和土耳其帝国统治结束之间，国家被英

国委托不同的行政部门接管，他成功了。他获得的土地真的离城镇很近，正如他期望的一样。不过不是很诱人的地段，因为那里到处是石头。不过他知道如何把它改造成耕地。买到田产后，他很快就结婚了，这和他预想的不一样，他本来要先建造房子。在蜜月期间，他带新娘子去了他的地产，在野外露营。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两人准备进行建造房子的艰巨工程。首先决定位置。新娘清理地面，新郎寻找合用的石头。他说基础部分需要较大的石头。他到处搜寻，抱回来或扛回那些大石头。他很强壮，有像山羊一样敏捷的短腿、结实的肌肉和宽阔的胸部，是适合这样多岩石地貌的山里人。他的妻子扎伊菲（Zariefeh）对他的体力当然很满意。可她还是很意外，因为他个子不高。没想到他一个人能把那么大块的石头搬到建筑工地。他从不抱怨，也很少休息。他们一起合作得很好，大多时间都是默默地干活。他不爱讲话，很严肃，一般是她说得多。说到石头，他的技术无人能比。只要摸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种类，能否承重等等。

一般建造房子是大家的事儿，全体加入也要花好几天才行。但是阿奥没有可帮得上忙的家人，表兄弟们都没有用，他们要读书，毕业后又离开家乡去美国深造。



他看不到那有什么意义。他们抛弃了拉马拉，好像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乡似的。而他们应该在这里扎根，娶妻生子，把他们养大成人，就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可是他们都移民走了，留下他一个人。

他在乎吗？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是独子，现在又没有了表兄弟帮忙。不过他已经习惯了靠自己，还有妻子在帮他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俩一起就能建造房子，并让它成为这里最好的一座。

第一天他们想在黄昏时回拉马拉，但是他们忘我地工作，等他们停下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如果他们这时回去，就要摸黑走路，不安全，路上有可能被豺狗袭击，所以他们决定留下来。阿奥去打来泉水，扎伊菲带有面包、白色的山羊奶酪、洋葱、无花果干和葡萄干。他们一起吃着。他们本没有计划在这里过夜，所以没有准备帆布。不过一晚没有问题。周围没有人，所有的山都是他们的。阿奥点了火以驱赶豺狗，尽量保持清醒，照看着妻子，但是最终还是睡着了。当他在一个清凉露湿的早上醒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在天堂里了。他喜欢在山里，年轻的妻子在旁边，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是和动物一起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而是在露天，在上帝

的开阔地。他检查昨天的工作，看到扎伊菲把地上清理得很干净，还有自己打下的地基。他去野外洗漱，不必担心有人看见或经过。他打水回来发现妻子已经醒了。

他们这样连续辛苦干了六天。因为扎伊菲知道野外什么可以吃，他们才能活下来。他们只带了一天的供给，而不是一个星期。他们分了面包，找到野芦笋、豆瓣菜和百里香。晚上她准备了甘菊茶，那是生长在山边的新鲜草药。他们吃了所能采摘的野生植物，赶走了饥饿，不停地工作，只有很短时间的休息。

他一开始很害羞，不敢在光天化日碰她，一切都显得这么暴露。但是到了第三天，他的欲望如此强烈，无法遏制。况且，房子已经有一米半高的墙壁了。他想应该不会有人看见，而且有人经过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在墙里睡觉也舒服些，动物轻易跳不过这么高的墙。当然，即使跳跃也会碰落石头，惊醒他的。

房子完全是由石头建造，没有水泥。建造得完美无缺，经过大半个世纪还完好无损。门很小。开始只有一层楼。不过他预料等家庭人口增加就需要扩建，所以设计足够的空间，沿墙壁搭了旋转楼梯，就像宫殿似的。它的确是整个拉马拉山上最宽敞高大的建筑。

我记得听人们讲过阿卜是如何与妻子一起在蜜月建



造房子的故事。我们听说完工后，他在周围找不到任何人跳舞来庆祝房子落成。就叫妻子：“来吧，扎伊菲。”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总是戴着穆斯林头巾，还装饰着土耳其银币。她摘掉头巾，拉起刺绣的传统长裙，牵着丈夫的手，他们一起绕着新房子跳着，直到跳累了倒在地上。从此，家族里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每当我们条件不够又不得不努力应付时，总会说，“来吧，扎伊菲”，能找到谁就让谁去做。我怀疑蜜月场面的描述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他们结婚时，蜜月这个名词还没出现呢。这对夫妻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时间。他们是顽强而讲究实际的，条件很艰苦。令我惊奇的是，在做苦工的时候，阿卜找到了全身心投入的时间，用自己学到的技术，为自己的房子凿刻了一座矗立七十五年的石头纪念碑。

我长大后听说了阿卜传奇性的生活经历——六个月在家里，六个月在山上，这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我从没觉得那是真的。只认为是家族故事，民间传说。

我还听到过我们家族住在这里时经受的灾难和毁谤。我自然只听我父母这一边的说法，他们和阿卜家里饮食和行为的习惯都不同。不过现在我可以想象他受了多少苦。我的家族喜欢审判，傲慢地以自己的教育和地

位为荣，瞧不起阿卜和他的家庭。

“他把自己变成了什么？”他们会责难地问，“什么都不是，他不过是个石匠，坐在粗糙的遮篷下，日复一日敲石头。”

阿卜起初的收入确实微薄，很难养活这么大的一家人。不过1948年后，拉马拉充满来自划归以色列的海滨城市的难民，他的运气来了。大批人需要住房，所以阿卜有更多的工作可做了。这意味着他要少去森林里的别墅，于是那个地方就被忽视了。他只能设法照看葡萄藤和橄榄树，做基本的工作，比如剪枝，秋天收获后在树木旁边犁地。

1955年灾难降临。葡萄藤遭受了致命的葡萄根瘤蚜虫害，当时无法可解。制止传播的唯一方式就是砍掉作为传播路径的葡萄藤。但是农夫们不懂，也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宝贵的成果来挽救所有的种植物。大家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虫害先是影响到北部的河床，靠近阿卜的土地，然后向南和东朝城镇方向蔓延。短短几年，所有让拉马拉的春天和整个夏天充满绿色生机的葡萄园都消失了。只有坚强的橄榄树活了下来，好像它们更持久，种在梯田的中间，那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阿卜气愤而绝望地看着发生的一切，但是毫无办法。



法。那个夏天，他所有的葡萄都死掉后，他计划下一年冬天栽种些新枝。结果到那年秋天。他就患了中风，之后只能跛脚走路，不能干农活了。其他土地上枯萎的葡萄藤也没有重新栽种，因为很多地主不在了。他们移民去海湾和美国找工作去了，留下来的也失去了老一辈人那种在拉马拉干燥多石的山上为可怜的经济回报而劳作的忍耐和顽强。

我几乎不记得山上梯田挂满葡萄藤的日子了。一般不把藤茎从地面抬起，而是就让它们挂在石墙上。这样到夏天，石阶上就覆盖着一片绿色。在山里行走时，你仍然可以看见一些这样的茎干，仿佛切除的炭黑色手臂或腿，散乱地放在石阶上。它们遭虫害毁坏时，我应该是五岁。我住的房子可以望见山，但是不记得见过枯萎生病的葡萄树。父亲总是坚持说最好的葡萄是来自拉马拉山的。大家都同意。

我长大时，大多时候山是干枯的荒野，显得很遥远，被荆棘野草缠绕，除了牧人和羊，没有人去。灌木随意地四处生长。阶梯墙需要重新修复，部分已经坍塌。挡土墙崩溃，土壤侵蚀、流失。乱石遍地，覆盖了阿卜和其他人过去种植的地方。他赶骡子的许多小路也被湮没了，无人清理，山泉阻塞。河床在夏天开始之前

就干涸了，山地荒芜，被遗弃的证据随处可见。

但是春天一到，它们又一次变成紫色亚麻的细长地带，从远处可以望见，与牛舌草、三叶草和小型鸢尾属植物的蓝色交错成不同图案，像用宽宽的刷子涂出来的彩色信号旗。清早，露珠挂在野花纤细的花瓣上，反射着阳光，山谷闪烁着万花筒般的瑰丽色彩。

阿卜在拉马拉的房子外面有泼洒出来的洗衣水腐朽的气味。老镇中心厚厚墙壁的小石头房子里，钟形大陶土锅里放着保持凉爽的饮用水，我们叫做 El Zeer。阿卜养了七个孩子，六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对上学都不感兴趣，父母也不鼓励他们。父亲对孩子的期望只是他们可以耕种。但是就连这样也做不到。他们中没有一个愿意哪怕是去森林看一眼，更不要说去耕种了。他们个个都是大烟鬼，觉得去山里走路太辛苦。

十个人住在那座有两个小房间的住房里，包括阿卜年迈的母亲，森林对阿卜的生活显得更加重要。每天早上，他走出房子，感觉昏昏欲睡，几乎要因金属炉子上烧的炭火释放的一氧化碳窒息。厕所在房子外面，冬天夜晚动物被带到房间里，睡在楼下。房间很狭窄，不通风，而且很吵闹。他的脸颊发红，头颅沉重，新鲜空气会让他惊奇。他说女人们不断的唠叨让他头疼。几乎等



不到冬天结束他就去山里，睡在他的别墅顶上，望着满天星光，早上醒来衣服被露水打湿。他最渴望的是宁静，山里独有的那种宁静，甚至可以听见蛇在灌木丛里滑动的声音。

他还盼望远离孩子。很难让他们劳动。他们想要的只是抽烟和玩乐。他们不关心土地。房子后面也有不小的一块地，可以开垦成一个天堂般的花园。可是他们太懒惰，不愿意动手。而在山里，他就忘却了一切烦恼。不打扰任何人，也没有人来打扰他。如果他不洗澡，身上有味儿，也没有人在旁边唠叨抱怨。他会睡觉，打鼾，没有人因听见而生气。他也不必忍受家里其他人的鼾声或动物的声音。不用告诉别人去做什么，如果他们不听还得和他们打架。没有人需要用甜言蜜语去哄，没有责骂和争吵。在这里，生活是他自己的，只有驯服的骡子，真是幸运啊。

整个冬天，他都会等待天气转暖，盘算着春天去山里要做些什么。冬天一过，他打点好行李套上骡子就出发了。

一到达他的土地，他感觉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地不算大，仍然有很多活儿干，很多石头要清理。

这个季节他有大的计划。首先是基础工作，修剪和犁地，然后是房屋装修。他想着要把门前那块大石头凿刻成一把椅子，因为它太大了，搬不走。他想要把它变成最舒适的座椅，比例恰当，支撑背部，还有结实的扶手，一个真正配得上国王的王座。干完活儿，他可以独自休息。做自己世界的主人，一个人，快乐，满足。

他一整天不停地凿啊凿啊。碎石飞溅满身，石屑让他的衣服、脸和头发花白得像一个老人。他有能力了解石料，每凿一下都使石头的形状接近他的设计。完工时已接近傍晚，太阳在沉落，起风了。他疲惫的身体坐在石椅上，非常满意它的比例，正是他所希望的。环顾四周，他看见自己和妻子建造的美丽别墅。前面土地的阶梯已经开出，他感觉自己的幸福达到了极致和完满。

有时，在城里他会怀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当表哥萨林从迦法来拜访他们时，这感觉尤其强烈。在森林里，他盼望他们来，但不是在冬天去拉马拉。萨林会穿着三件套的外罩，金属边眼镜，抽着烟斗。阿卜相信，是读书太多弄坏了表哥的眼睛。他自己有老鹰一般的视力，从不需要戴眼镜。萨林认为自己现在是迦法人了。他甚至在城里有一间欧洲式的旅馆。他读厚厚的英文书，还不停地抱怨英语。他笨拙地坐在低矮的椅子上，其他人



坐在地上，围绕在他身边。他看起来好像是主宰着所有人，即使在卑微的房子里他也是法官。他从不谈论阿卜如何一辈子一直住在这个村子，甚至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房子，但是他的沉默说明了一切。仿佛他一直在说：“看看我吧，我有所作为，我离开了拉马拉，读书深造。而你们还是没有文化，无知，穿着长袍，像你们的父亲，怎样都没有出息。”

但是现在，在山里，所有这些疑问都消失了。他如此自信，幸福，不比任何人差。干吗要把舒适的长袍换成拘谨的西装呢？想要解决问题时就找一块石头，附近有大量的石头。他会提起外衣，蹲下就行了。不必像表哥那样麻烦，又脱长裤又脱外衣。大腿间空气流通，他可以感觉得到，滋养新鲜。为什么有人要在夏天把自己包裹在大衣里那么闷热呢？为了像英国人一样吗？他干嘛要在乎他们呢？他们和他又有什么相干呢？

在这里他远离那令人讨厌的一切。英国人从来不来这里。他整整六个月都在山里，见不到一个人。他们怎么会来呢？他们对山里不感兴趣。山不属于他们。他们住在大城市，到这儿是活不下去的。他们太文雅高尚，太脆弱，被宠坏了。他的表哥正在变成他们那样。他甚至讲话都和他们一样了，嘴唇几乎不动。不是自己卷

烟，而是装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向旁边看时要把烟斗推到一边，好像他在计算，在判断。

当阿卜做自己的事情，耕种果园，忘记了其他一切时，人类历史最残酷的战争在进行着。纳粹在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呼声日益高涨。萨林急切地等待读报，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际的，而且已经有了对世界大事的看法。他还对巴勒斯坦的暗淡前景做了预测。犹太复国者的坚强决心和巴勒斯坦人无用的地方领导让他震惊。

他们碰巧谈论这些话题时，阿卜强烈抗议说这和他无关。对他的家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是拉马拉人。他认为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在一个不会和犹太人或被大量谈论的殖民者接触的地方。他的表哥去插手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是在自取灭亡。

在这山里，坐在他的王座上，他是国王，至高无上的国王。他想着表哥去美国，吹嘘如何在轮船的甲板上露宿。唉，他听他重复那个故事多少遍了。家里其他人爱听他讲，每次他来访都叫他再讲一遍。睡在甲板上，在船尾干活，还要付船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整个夏天都睡在露天里，却没有人说什么，这和在甲板上有什么区别吗？而且还是在海上，几个月见不到陆地，多



不可思议呀。不，他可不干，绝对不行。

他属于这里，为什么要假装成别人呢？这是他的家，他要在这里待到老死的那一天。这是他的世界，他喜欢的世界，胜过其他一切地方。



阿卜可以望见在他一生中都没有什么改变的山，除了葡萄树没有了。他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享受这份安全舒适，看到山间不变的风景。我出生在山里，差不多和阿卜的晚年一样的山里。但是我长大后，不幸目睹了它们不断的变换。我是 Al - Haq 领导人之一，通过这一人权组织的调查研究，我最早得知以色列政府的殖民计划。我所读到的东西令人担忧。但是我想知道，这些计划可能实现吗？我们的山冈，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山冈，几年内就能成为十万犹太殖民者的家吗？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神圣的权利，最终想要把我们赶出去。我宁静漫步的山冈，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让我更感到自由的山冈，最终要变成禁闭狭窄的危险地区，成为不断产生焦虑的来源。

一个又一个山顶，被犹太殖民者占领，殖民地联合起来形成了区域。建筑群之间修建了公路，周围的开发

区也保留给将来的发展之用。村子赖以生存的农耕地遭到剥夺。在拉马拉北部就建了一个这样的殖民区，东部一个，南部还有很多。东部的殖民区之间叫做前哨的较小些的殖民地突然出现，夜晚当我朝北部望去，可以望见一片连续的建筑和道路形成了一个拉马拉包围圈。更糟糕的是，一条六百七十公里的隔离墙正要计划修建，它将穿过西岸，把拉马拉和周围的村子进一步隔开。这会让我们的生活无限制地变得复杂，让美丽的景色遭到更大的破坏。

我多么羡慕阿卜在自己生死相依的山里感到的信心和安全，他认为永远不会改变。阿卜可曾梦想过，像他为了逃避村子里的封闭生活而进入的开阔山林，将来有一天，他的子孙却无法进入吗？世界上多少艰苦跋涉的步行者没有意识到走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没有愤怒、恐惧或不安是多么奢侈，可以随意地行走，头脑里没有强迫性的政治辩论在进行，不用担心失去他们所热爱的一切，不必忧虑被剥夺享受这种漫步的权利。只是行走，尽情吸取大自然的馈赠，就像我曾经做的一样。



阿卜去世时，我才六岁。他的妻子扎伊菲活得比他



久。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中，一个去了中美洲，从此再没有音讯。老大是拉马拉第一批去阿拉伯海湾开采石油的人。那里夏天气温达到五十摄氏度，没有空调。他做公共饮食业，回家的途中会经过贝鲁特。他在石油丰富的海湾那疲劳闷热的环境里花掉大部分收入。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带了两个弟弟去他的公司做工，但是他们无法合作，因为个性太强，不断争吵。他们两个也忍受不了大哥的专横跋扈。一个移民去了美国，另一个去科威特工作了，但是并没有干多久。他受不了那里的温度，渴望拉马拉的清凉天气。“我不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告诉妻子，“我不想母亲也这样。”他妻子向往在科威特工作，过上好日子，因此感到很沮丧。她不想回到古老的城市和破旧的房子，同他母亲一起生活。我记得她，当我去接他们回来，她孤独地坐在拥挤房子的角落，眼角发红，泪水从她苍白的脸颊上滚落。她用我从没有见过的柔软的卷纸擦鼻子。我记得她情绪低落，眼泪浸湿的面巾纸是她从很多人发财的地方带回的唯一的东西。

萨里迈 (Salameh) 是最小的弟弟。他做玻璃，装裱图画。学校午休时我经常去祖母的房子。在那里见过他。我从没有想到，一个人年纪轻轻，在店铺外花那么

多时间，却不去做什么工作。一天他开始谈论移民。我祖母试图告诉他所有关于美国的糟糕的事情，她是家里唯一去美国看过儿子的人。“不是你想象的样子，遍地是黄金任你去捡，”她说，“我四次经过大西洋，我很清楚。”

扎伊菲死时，除了阿米恩七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在最后时刻被叫回，设法从海湾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他很伤感，唯一忍受她离去的办法就是借酒消愁。给她送葬时，醉得要被人抬到葬礼上去。阿米恩母亲死后，家族最年长的人没有了。她是坚强而值得尊敬的女人，几年来一直身体不好，气色日益变差，癌症侵蚀了她的肝脏，让她的眼睛失去了神采。她是家族最后一个穿阿拉伯长袍的女人，那是传统的裙子，有彩色刺绣，戴装饰着土耳其银币的穆斯林头巾。

母亲死后，阿米恩没有动力去海湾继续工作。他决定像兄弟们一样移民美国。我记得祖母说他一走，我们的近亲都没有了。她极力说服他不要去，警告说他妻子皮肤较黑，会被认为是黑人，“美国虐待黑人，”她补充说，“他们在街上跟踪、嘲笑黑人，甚至射杀他们。”她讲述的样子令我奇怪阿米恩怎么会考虑移民美国，如果妻子的生命都这样受到威胁。



这些警告不起作用，这对夫妇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他们日夜拼命干活，赚了不少钱。他们的孩子学习说英语就像电视上的美国孩子，含糊的发音和语调，连父母听着都觉得陌生，完全不像他们在拉马拉生养的小孩儿。对他们说阿拉伯语，他们会拒绝回答，恳求说别让他们在朋友面前丢脸。孩子们太快太好地适应了美国社会，但是父母亲不行，他们白天在黑暗的屋子里干活，沉默、压抑，想念着家乡，而以色列人不准他们回去。创造了小森林的阿卜·阿米恩的七个孩子及其四十个子孙都没有留在拉马拉。萨林的子孙中，我弟弟萨莫尔（Samer）和我是唯一仍然住在这里的两个人。



2003年春天，离我最初发现小森林已经很多年，我决定带侄儿阿兹（Aziz）去看他祖先的别墅，让他坐一下王座。他是萨莫尔十岁的孩子。

第二次抵抗运动于2000年9月开始，导致国内从西岸其他城市，比如纳布卢斯（Nablus）和吉宁（Jenin）移民去拉马拉的人数增加。以色列的政策使人们在那里无法生活下去，所以拉马拉就成了西岸少数融合巴勒斯坦各地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城市之一，也让它成为巴

勒斯坦官方没有命名的首都，是巴勒斯坦立法会所在地，这是政府和最高法院的行政办公室。不过，所有这些发展都是有代价的。随着城市人口增加，更多的土地用来建筑。周围荒野和美丽的山地开始被侵占，不仅是犹太殖民者，还有城市居民扩张发展的无休止的欲望。

奥斯陆协定后，巴勒斯坦警察机构建立起来，在英国国教学校后设立了总部，就在靠近我山林漫步的起点。在十二公里以外，这个六角形建筑的圆屋顶漆成柠檬黄色，效仿现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它不和谐的侧面继续主宰着山的这一面，直到抵抗运动早期，被一架以色列 F16 战斗机投下的一吨重炸药炸毁。

阿兹和我绕过炸掉的警察局去小森林。他很兴奋，期待看到我很久以前就和他说过的别墅和王座，我们加快步伐，抄最近的路线。到达那里时发现别墅完整无缺，不过一定有一些愚蠢的盗贼挖掘过王座，也许是想要带回自己的花园或卖掉它。但是没有料想到它是从这么大块的石头上凿刻出来的，根本搬不动。但是在恶意的尝试过程中，他倒是把阿卜的王座倾斜向一边，使它变得无法使用了。

阿兹很是失望。王座被亵渎，被转移，变成山坡上



许多岩石中的一块。我无法向他解释有庞大的基座埋在地下，它原来直立的样子是多么辉煌，或者坐在上面感觉多么自豪。现在，我说服他和我穿过山路做这么冒险的旅行的那种魔力被剥夺了。

我们参观了别墅，从旋转楼梯上去，站在顶上望着远山，不过这也不足以补偿，因为阿兹已决心要坐我许诺过的王座。我们走另一条路回拉马拉，希望路上能发现什么值得兴奋的东西补偿失望，让他忘掉不快。结果走到废弃的警察局，阿兹说他很好奇，想看一看。我们慢慢跋涉过一片田野，到处散布着报废的车、垃圾、碎石、毁损的金属、铝、发黄的混凝土块、玻璃、炸弹碎片和废子弹，遗弃多年的瓦砾，破碎的希望，抵抗和战争。

阿兹要先跑过去，沿着视察轰炸地区的以色列坦克留下的车辙。我走在低一层，继续在改变了的山中寻找原来的旧路。这时我听到他叫我。抬头，看见他举着一条长长的金属管。“这是什么？”他问。我没有马上想到阿兹拿着的是一个没有爆炸的导弹。他站在那里，背后有金光闪闪的太阳，等待我的回答。一阵惊慌攫住了我，我麻木了，变得如死一般，仿佛看到侄儿在我眼前爆炸的可怕场面。慢慢而用力地，我说：“举着它，别

扔。”开始稳步朝他走去。他一定是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恐怖，僵直在那里。我到他身边接过那个东西，抓住它，让他快速跑开。我的心猛烈地跳着，但是看到侄儿逃脱了致命的爆炸物而感到狂喜。我慢慢把它放回地面，心里暗暗祈祷。



有时我早上醒来，从房子里眺望远山，想象阿卜站在他深山别墅的屋顶，沉迷在笼罩山谷、模糊了褶皱带的迷雾里，它让整个山地显得平滑。我可以看见迷雾是如何沉落在他周围的隐蔽处和山谷裂缝里，在干燥、烘烤着的山里生成无数蒸腾的小湖。当太阳在天空升起，他依然站在改变了的风景里，观看着阳光吸去迷雾，晒干夜的湖，让起伏的山回归炎热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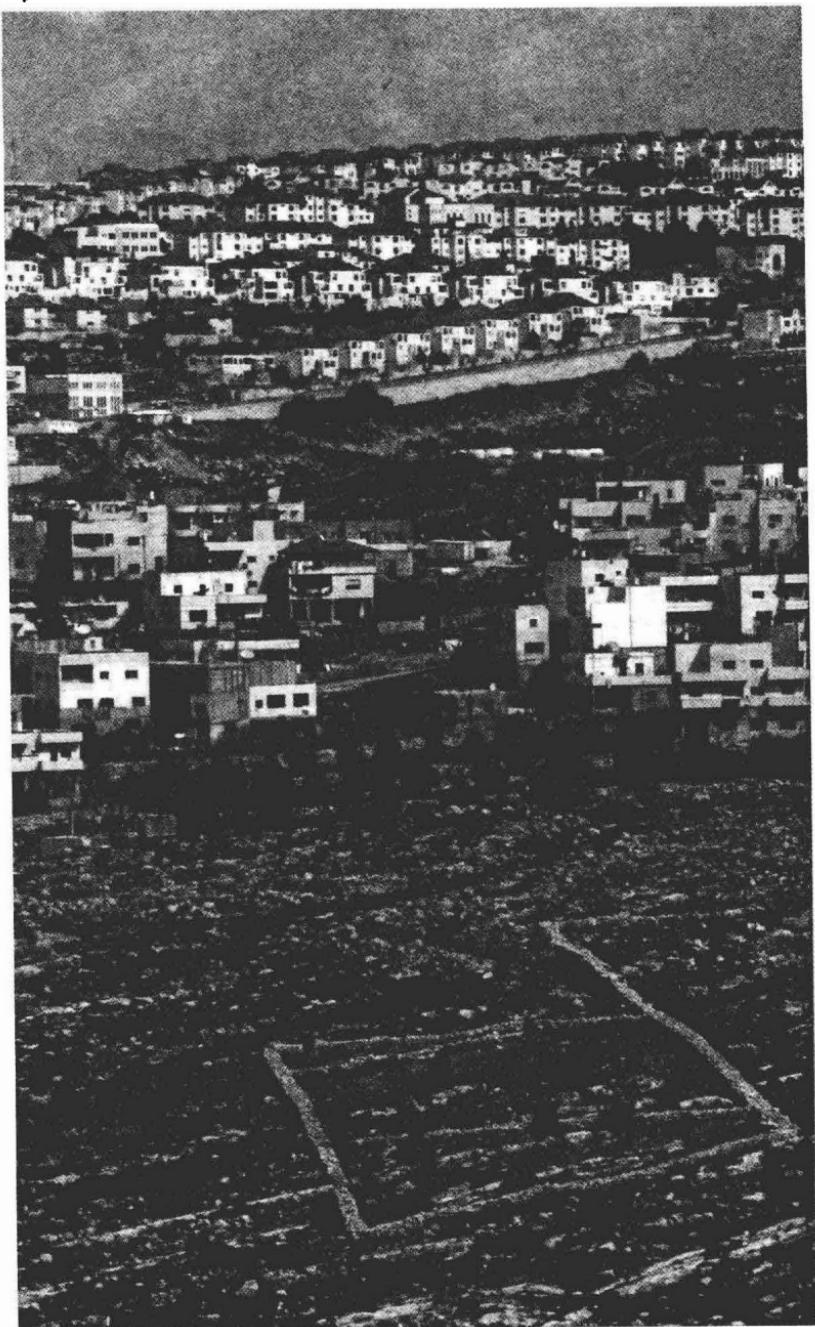
如果有人从远处来寻找阿卜，开始不会认出他来。当迷雾被揭开，阳光分外强烈，一个明亮的身影就会出现。一小股环绕着他的纤细蒸汽也被阳光照亮。彩虹色的闪光让他的身体无比灿烂，仿佛给他安上了翅膀，翱翔山谷之上，转瞬即逝的影子像野禽或暗淡的山神。

我早上站在这里，俯视乡间田园时经常想到阿卜。



如果他看见现在山林的样子会说什么？他的灵魂会对我们充满愤怒吗，因为我们允许这片山野被摧毁，被侵占，或者他还会喜欢做一次长长的远足吗，让他的灵魂像从前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漫步，没有羁绊？

40
M.G.
20
A.L.



前景中是伯利恒西南的巴勒斯坦村庄纳哈林，背景中为

漫步 2

阿宾纳土地案

从拉马拉到安昆亚

以色列占领西岸的前二十年，我还可以毫无阻碍地去山里漫步，虽然这里到处都建立了大量殖民地。边境这边的殖民者还不算多。我们仍然相信，占领终有一天会结束，以色列西岸巴勒斯坦国家会建立起和平。但是以色列军队执行的土地管理法律令人担忧，我带着深深的关注跟踪着时局的变化。

1979 年的一天，我去坐落在拉马拉的土地管理部，我经常去那里查看客户的财产状况。平时聚集在门口的人群不见了，周围显得荒凉。我敲了门，等待。最后土地登记员哈兹开了门，他好像很吃惊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我需要核对土地登记。

“不行。”他说。

“为什么？”我问。



“新政策。”他回答。

“那你帮我查一查。”

“没时间，”他说，“我们都很忙。刚接到命令，要调查不同类型的土地，要花很多时间。今天没人能帮你，也许明天也不行，这几个星期都没办法。”

之前以色列军队政府控制的土地登记部的记录和民间管理档案是对外开放的，因为是在约旦统治下。从1979年那天起，就不能查看了，都保存并保密起来了。负责巴勒斯坦土地权的以色列官方，在巴勒斯坦雇员的帮助下，进行着各种土地调查，确定登记过的土地占有多少百分比，有哪类登记文件存了档等等。这个信息对殖民项目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被谨慎地守卫着。自从那天起，巴勒斯坦公众就不能再接近土地记录了。

我回到办公室，专心准备阿宾纳土地案。我正在以色列法庭上抗辩以色列公共及在外业主财产监护者的一份声明，事关拉马拉附近贝特厄村（Beit ‘ur）的土地。我以为这要用上一整天，但在中午前我就完成了。我决定回家。今天得走路，因为弟弟借了我的车。我回到家才发现身上没有钥匙，它是和车钥匙系在一起的，给萨莫尔时忘记拿下来了。

我坐在通向花园的台阶上，想着下面该做什么。忙

了一个早上，多想进到房子里放松一下。我的房子是三年前租下来的，两间结构，很简单，有一个小花园，一棵无花果树从岩石中长出来，给我当主要通道用的侧门提供了阴凉。我的睡房兼工作室有一扇窗子朝着花园。这不是特别吸引人的房子，冬天还非常冷。我选择它只是因为它靠近山里。

上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房子。我把自己关在里面写作，听雨重重地敲击着房顶，感觉轻松。雨从天上倾泻下来，流下水管，最后流到靠近无花果树的蓄水池。冬天不下雨时，我就非常紧张，感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雨季一来，幸福安宁的感觉就又回来了。这是听雨的好地方。这种因雨而生的困扰和我的祖先传下来的原始焦虑有关系吗？他们一辈子都以农耕为生。生活在干燥的地区，所有的水都来自冬天那几个月的雨水，那种对旱灾根深蒂固的恐惧一定深深植根在我身上，虽然我从没经历过那段岁月。我还有什么别的隐藏的恐惧，我一直试图发现它，并让自己解脱出来，我一直那么渴望自由。但是我的努力会有结果吗？

也许正是雨的匮乏造就了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如此忧虑重重和情绪化，以致和平总是躲避我们。就是在这里，先哲认为



他们听到了上帝扣除雨水的惩罚，或风调雨顺土地富饶的奖励。这么小片的土地，地形却如此多变：一座属于叙利亚的冰雪覆盖的山峰、一片沙漠、一个淡水湖和一个盐度很高的湖，还有一条河流。好像什么都不缺。极度缺水的生活促使我们不断地仰望天空祈求雨水。

几天大的阵雨后，昨天晚上雨停了，天空呈现新鲜的绿松石色。这样明丽的天气，待在室内太可惜了。我还等什么呢。我有书，去山里漫步也不需要特别的衣服和鞋子。只是卷起裤脚，避免泥泞溅到上面就是了。我想我可以走到半山腰，到巨大的松树下读书。山里松树不是很多。这一棵不知道是谁种的，或许是松树自己播种的。我经常带着书去那里阅读。等我回来，弟弟就会把车还回来了。他会照约定把钥匙放在门左边松动的瓦片下。

我以为小路还会很泥泞，但是发现表土已经干了，走上去软软的，但不粘鞋。土地的主人很多年前修建的路，有几米宽，旁边是石头边墙。沿山的一侧缓缓倾斜，然后拐弯朝山下而去，设计很精细。如果是直线下去，在冬天会被冲垮，就不能用了，那更像水渠而不是山路。

路开始转弯下山时，我跳过阶梯墙，走了几米，去

松树所在的位置。当我拨开松针，一阵松树的清香袭来。我进入了有五十年树龄的香气缭绕的树枝洞穴的深处。里面很暗，不见阳光。这棵树不像是种的。真正的农夫不会在这里种树。因为它没有作用，只会把土壤变酸。一定是种子被风意外地吹来，或某个倒霉的农夫无意中带过来的，可能是夹在衣服的皱褶里，在他经过此处去查看自己的橄榄树时恰巧落下来。

通常我都是坐在地上，背靠树干，面朝东方看书，让树枝的沙沙声陪伴着我。不过今天地太潮湿了，我没带什么能垫着坐下来的东西，就跨骑着树干，背靠在树上。我没有看书而是欣赏风景，这棵树给大山带来一种多么不同的气氛啊，我想。我坐在这里，被垂下的树枝环绕，看着眼前的景色。

现在，既然想到松树，我注意到对面山上橄榄树中间生长着的松树。只要有一棵树扎根，结实，然后松果炸开，把松籽传播到一片又一片阶地，成倍增长的松树就会排挤掉比它们早生多年的树木。尽管我喜欢松树，还是觉得它们像入侵者，是山屈服于自然力量的证明。它们高大，茂盛，强烈要求拥有扎根的土地。像橄榄树一样，它们的根保持接近地面，纠结缠绕，像指节般平滑，蔓延在同一块地上，使它们无法共存。



现在是风暴的间歇期，另一场过几天就来，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在这里交界。天空暂时还是那种青绿色，晴朗的日子里，从死海水域就能看到。没有云的时候，冬季几个月透明的空气让人可以望到地中海。

我原来打算坐在树下看书，但是眼前山色清亮新鲜，橄榄树也经过了雨水的冲刷，绿色仿佛被泼洒在大地上，还有开放的野花的芬芳，驱使我走下山谷去欣赏更多的景色。我把书插进口袋就上路了。

过去山里的路只有常走的人才知道。他们知道哪片地是哪一家的，边界在哪里。到了 1865 年，巴勒斯坦“为了调查圣地的考古、地理、地质和自然历史”，建立了开发基金会筹备会，在西敏宫耶路撒冷厅举行了首次会议。协会最初的章程宣布：

没有任何国家比写着我们信仰的文件更让我们感兴趣，它们所描述的重大事件业已发生。同时，没有任何国家更迫切地需要例证……甚至对于一个在圣地上随意旅行的人，《圣经》在形式上，某种程度也在本质上，成了一本新书。通过发掘这么多种族和这么多代的遗迹，人们会获得很多，这些遗迹就隐藏在那些村子矗立其上的堆

积的垃圾和废墟中……

由此开始了持续到今天的旅行者和殖民者执行的程序，他们通过《圣经》的历史棱镜看待这片土地，忽视现在的事。他们急于占领他们想象的土地，利用幻象伪造它，使它与他们头脑中的神话图像相符合，对巴勒斯坦居民则毫不理会。

从 1882 年到 1888 年，巴勒斯坦开发基金会一直派制图师描绘测量图。山冈开始目睹带着可笑仪器和帽子的外国人。他们中有的可以用当地语言询问地名，当地人帮助他们。英国人要了解每一座山丘，每一条溪流和山泉的名字。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几年后成功征服的先决条件，占领军需要知道这片土地上的各种道路，它们的特征、秘密和名字。另一队人来到人们和他们的土地之间。所有这些都是在英国统治之前发生的。

欧洲和后来的犹太复国运动都致力于探索古代以色列，努力拯救这个地区的历史意义。但在探索它自己的文化根源的过程中，抹杀了巴勒斯坦历史，把它归为史前史，为现代以色列控制土地及巴勒斯坦的时间和空间铺平了道路。与耶路撒冷、吉里楚 (Jericho)、纳布卢斯 (Nablus) 和希布伦 (Hebron，即哈利勒) 等地不同



的是，拉马拉在西岸各城市中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在《圣经》里被提及。它是一个暴发的村子，在历史和宗教上都微不足道。我多么庆幸这个疏漏。犹太人殖民地位于我们的边缘，因此我们的村子得以免受狂热的正统派基督教徒的围地静坐，声称根据《圣经》这里是属于他们的祖先的，就像在希布伦发生的那样。

1888 年，巴勒斯坦开发基金会绘制出了 1 : 100000 的巴勒斯坦比例图，这是土地登记的基础。土地登记开始于 1955 年，即半个世纪后英国统治期间，在约旦统治期一直持续着。1967 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就暂停了。

土地登记覆盖拉马拉西南部所有的山，包括贝特恩村，我当事人阿宾纳（Albina）的土地所在的地方。那天早上我就是在做他的案子。但在这个地区，土地绘制过程的最后一步是无法完成的。权利计划已经准备好，并在约旦的安曼签署，那是 1967 年以前土地部的所在地。然后计划要被带回拉马拉，调查结果才能进入当地登记，完成最终程序。1967 年 6 月 5 日开始的战争妨碍了它的顺利进行。阿宾纳土地的准确界限在地图上描绘出来了，也给予了土地号，但是登记证明没有发放。这个手续是殖民者用来质疑我当事人对自己土地所有权的漏洞。

我沿小路快速走着，好像在逃跑。我在逃避什么？直到路又一次慢慢向右侧转弯，我才停下来，朝邻村方向走去。那里有大块光秃裸露的岩石，是停下来喘口气的好地方。我已经走得太远，看不见城镇，当然，也没有人能看见我。年轻时我曾多次逃离父母和社会的一切，来到山里。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地区，这些山是我唯一的避难所，就像对阿卜·阿米恩一样。现在我可以放慢脚步，在岩石上休息，看“节疤溪”流淌的宽宽山谷，和对面开阔的山坡。我蹲下来，轻柔凉爽的风吹拂着脸颊。那天第一次，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干净的空气充满我的肺部。

几乎可以称作纤细的一层小草，在岩石间闪亮，上面装饰着小水珠，让它们在阳光下闪光。青苔和地衣覆盖的岩石上涓涓流动的水显得发黑。午后阳光拉长了橄榄树的影子。绿草丛中和冬季花卉间，墨绿和炭黑成为主宰的颜色。

饱受上个夏天热度烧灼的薊和灌木，混合着泥土，变得湿润。其间有去年幸存的鼠尾草嫩枝，我掐了一条，在指间感觉它浓浓的芳香。大地在绿色和灰色的石头间变幻着，点缀着深色的斑点。绿色经过粗大的树根上升，环绕结实的树干。岩石间有青紫色的绵枣儿。我



慢慢滑下去，回到路上。注意到番红花在雨后生机勃勃，填充着我刚才坐过的岩石周围的一小片空地，像粉红色的薄雾。我不想踩到它们紧贴地面的精致而脆弱的花瓣，但是无法避免，因为它们遍地都是。

因为工作繁多，加上大雨使道路太过泥泞，我上星期一次都没有出门走路，这加剧了我紧张的情绪状态。漫步使我能对事物进行透视和远观。我开始加快步伐，匆匆走下斜坡，来到溪流边。我走得越深，周围越发寂静。往往是距离和安静让我专注脑海深处理藏的烦乱思想。我走着，许多这样的思想就浮出水面。我筛选它们，头脑只留下可以解决的部分。在这山里，我的能力极限提高了。

有一次我得请求一个士兵让我回家。当天我从吉里楚的冬季别墅回来，我在那里度过了轻松的一天。要恳求以色列士兵，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在拉马拉实行了宵禁令。我整天在外，没听到新闻广播。“我很累了，”我说，“就让我过去吧。”唉，向一个陌生人求情真是丢脸。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痛苦；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思考黯淡的前景，像一个被捕猎、受折磨的人，恐怖地意识到宿命渗透了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不能生活在此刻，安逸舒适。但是我知道答案。

如果我和我一样的人们离开而不是留下来反抗占领，几年后我们醒来将是另一个现实，我们的土地已经被从我们脚下夺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与我们的困境抗争。

只要附近没有以色列殖民地，我就假想我拥有整个山林。一个寂静的舞台。我走的路曾经连通拉马拉南部和北部的村子，许多人走过这条路，不是娱乐而是为了工作，运输农产品或往返于村子之间。在铺路开通前，这曾是附近唯一的路。直到最近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甚至我漫步走的这些小路也都在英国军用地图上标出了。我曾经想相信这就是我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是我自己的发现，这些山是我的私人舞台，我可以独处。我查看过军用地图，发现我朋友说得没错。路被标出了，它从拉马拉西边的村子安阿里克 (A 'yn Arik) 开始，一路延伸到地中海。

一般来说，如果我的时间只够做短暂的散步，我就一直走到山谷，然后返回。今天时间充裕，我决定朝北走，横穿我所在的山进入另一个溪谷。离城镇越远，土地被开垦的越少。最后，我来到一座野草覆盖的山丘。从石头台阶上垂挂下来的是死掉的炭黑色的树枝，是曾经使整座山生机勃勃的葡萄树的残余，稀疏地散落下



来，我停下脚步仔细查看，我可以闻到潮湿腐朽的气息。

大多岩石是石灰岩，在曾经覆盖这片山林的深海里形成的水成岩。我经常发现不同贝类、甲壳类化石。在我家里的书桌上，有几个石化的蜗牛。只有在大断层的这一侧才会找到海洋化石。在约旦河东面，古代海洋的浅水边缘，只有陆地砂岩和粗砂。

在附近我还发现一些样子奇特的石头。我跪下来仔细观瞧。从它们中间伸出来浮雕一般石化的根。我拾起来一块，有手掌大小，它嵌在台地墙上。它棕土的颜色吸引了我的注意，和建造墙体所用的其他灰色岩石不同。我把它托在手上，仔细看着。真是太神奇了，看起来仿佛是数百个海蜗牛、海星星和海胆压缩在一起，形成了这块有沟槽的小岩石。岩化一般是用来说明转变疏松的沉淀物为岩石过程的名词。大多数沉淀物被压缩化合，也就是把松动的石灰颗粒紧紧压在一起，粘牢，石灰围绕颗粒沉淀，把它们凝固成结实的岩石。岩石一定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自从这里还是被淹没在海水里的时候就存在了。

我探险进入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离阶梯墙不远，我看见一块像祭坛一样高的大块岩石，它好像是被

移动了位置，从高处跌落下来的。有几个地方裂开了。我把胳膊肘放在上面，仔细看。阳光以三十度角照射在它上面。它上面刻着两个拉长的圆形瓣叶，一边一个，中间是一个巨人脚趾样的长形隆起物。整个东西超过一米长。开始我想这些形状是水长期侵蚀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水会弄出圆形的槽呢？我曾经见过恐龙的脚印照片，和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抬起眼睛，试图想象巨大的动物一只脚站在这块岩石上，它的头几乎达到俯视拉马拉山顶的高度。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多么短暂。看着这些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是沉没在海里，不是被巨大的动物主宰，而是充满丰富的宝藏，这瞬间又是多么美丽。

离开这块岩石前，我确信记住了它的位置：从松树下来几个阶梯，山顶和溪谷之间，一个布满普通的长穗荆棘（natsh）的地方，这种荆棘很可能就是用来编结耶稣基督所戴的荆冠的。在这些山上，长穗荆棘就像石南在苏格兰高地一样遍地都是。两者都是顽强的植物，有坚固的根。冬天，长穗荆棘会长出厚而窄的叶子保存水分。田野里到处都是绿色的小土墩，与箭猪相似。干燥的夏天继续，叶子最终干枯落下，留下一丛丛结实蓬起的网状丝条，农夫们有时剪回去做扫把，清扫粗糙的石



子路面。它还可用来排水，而且因为有弹性，可以代替弹簧床垫睡在露天时用。在阿拉伯语中，natasha 的意思是采摘，因此锄草机就叫做 minttash。

在以色列军事法庭，这种草享有盛名。从来没有哪一种草被如此开发和政治化，至少不是被丹尼·克莱莫 (Dani Kramer)。他是负责为犹太殖民区开发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军事政府的法律顾问。丹尼懂一点儿阿拉伯语，natsh 是其中之一，很多次我听见他在军事土地法庭法官面前站出来宣称：“但是，尊敬的法官大人，土地长满了长穗荆棘，我亲眼看到的。”意思是说：不需要什么来证明这片土地是没有开垦过的，因此是公共的，以色列殖民者可以使用。

除了丹尼，还有一个殖民计划的英雄，库克拉比 (Rabbi Kook)，我早有耳闻，但是没有见过。他曾对信徒描绘他和土地是多么完全的一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撕裂了。不清楚受到质疑的土地是否长满了长穗荆棘。当然没有！他是在比喻性地说明更深刻的事情。1967 年 5 月 14 日，导致巴勒斯坦领土被占领的战争前期，以色列独立日前一天晚上，联合国承认该国合法身份的周年纪念日。他布道时总是大声呼喊，身体悲痛地摇晃。他回忆起 1947 年的通告，当时联合国决定划分巴

勒斯坦为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当犹太人在街上跳舞，这位拉比独自坐着，哀悼土地的分割。他问他的信徒：“希布伦在哪里？我们忘记了吗？我们的纳布卢斯又在哪里？还有杰里科（Jericho），我们会忘记它吗？约旦的边远地区是我们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地区和任何一个地方都属于真主，怎么可以在我们的手中放弃哪怕一毫米？”然后他继续说道：“在那个国家，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受伤，被撕碎着，我无法庆祝。”读到这里，我想，上帝保佑我们。不过现在，我不想再想这个狂热的库克拉比和他的身体，或者丹尼和他对 natsh 的合法迷信。我要享受我的漫步了。

通向山谷的路最后一段很窄，长满了长而尖的灌木。我硬挤了过去，划伤了皮肤，一直来到到向右转弯的地方。阶梯墙分出岔路。我继续沿着和山谷平行的宽敞的路走。从开阔的绿色山野吹来温柔的风，轻拂着我。我的左边是一片长长的草地，橄榄树茂盛地生长在深厚的沃土上。我走着，经过了两座山间的溪谷，在这个区域它们是最宽的。在阶梯间蜿蜒前行的绵羊在山腰漫游，像淡黄色的绸带。我寻找牧羊人，看见他正要吹奏他的牧笛。我停下来，在岩石上坐了一会儿，听他的牧歌。然后又开始走，尽量悄悄地不打扰他。



不久就到了河床的那一段，1981年，我与人权组织的同事乔纳森·科塔伯（Jona than Kuttab）漫步时，此地经常能激发我们的谈话热情。远离城镇，在山间干涸的溪谷边，我们坐在岩石上，脚在草地上摇晃着。乔纳森当时在考虑结婚。我们讨论他的前景，谈论我们的未来。我们都读过西岸犹太地区委员会与世界犹太人复国运动组织殖民部合作制定的殖民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986年以前，八万以色列犹太人将要在我们的山里定居，分为二十五个殖民地，二十个边区村落。有二十亿美元确保计划的实行。数吨重的混凝土将要倾倒在这些山上。这个计划要求以每年150公里的速度铺路。每年开发面积500当（一当为1000平方米）的工业区。所有可用自然资源都将被殖民者独占。“殖民区”将到处出现，我们的城镇和村子将被隔离，它们的发展将受到大量公路网的阻碍。

这个计划把我们的存在视为障碍，目的在于阻止我们的“不合需要的发展”。通过建立新的人类居住区，把它们和道路连接，隔离已经存在的居住区。这样就不但扼死了我们的社区，还破坏了美丽的风景，只短短几年时间就会改变保存了数百年的一切。当时的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宣称，我们将给这个国家

留下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图，让它无法再被忽视。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宣布：“在占领地建立殖民区是犹太复国运动的灵魂。”以色列报纸报道，以色列政府断言它永远不会接受分裂以色列这伟大的土地，决不同意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我们确信在这种威胁下不能继续无所作为了，我们要竭尽全力反对。如果这个计划执行，一代代犹太人的孩子将在我们的山里长大，并认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要为巴勒斯坦的这部分国土再奋斗几百年。坐在岩石上，我和乔纳森继续规划着我们反对以色列计划的合法斗争。

溪谷底部的橄榄树站在平坦的刚刚耕种的土壤上。我们把这里当做漫步的中间点，从这里开始上坡回拉马拉。我们一边继续讨论一边吃着苹果。我们策划着如何通过合法行动挫败以色列全盘的殖民计划。我们会筹集资金，用法律手段挑战每一项土地征用命令，结束这种装模作样的把戏，它声称殖民者只是在占用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

和乔纳森谈话的当口，我环顾四周。我很喜欢这里的岩石，有绿草围绕它们聚成一团，看起来仿佛是从地上迸发出来的，绿色海洋上突出的小岛。山在我们前面



展开，安然地向后倾斜，形成宽阔的溪谷。一个坍塌的别墅废墟出现在我们右边。冬天，水会从山上渗漏，滴入岩石间狭窄的河道。小路就从旁边经过。这里的鲜花比山上任何地方都繁盛。

我们意识到，以色列军方的主要论据是西岸没有登记的土地属于公共所有，所以可以安排以色列犹太人。这种暗示会带来灾难和不幸。根据这种对土地法的解释，真正属于巴勒斯坦的唯一没有登记的土地是他们居住在其上或持续耕种不少于十年的那些。所有其他的都是公共土地。这就使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擅自占用者而非合法拥有者。根据以色列政府法律和历史版本，真正的合法拥有者是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对土地的权利追溯到远古，到恐龙刚刚灭绝的时候。在法律上，这种身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但是却没人对此提出挑战。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法庭进行过联合抵制，提出质疑和反对。殖民者可以自我安慰了，他们没有在他人的私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居住地。

乔纳森留着非洲式发型，白亮的牙齿和长手指，强调每一个词。他着重论述什么要点时会睁大眼睛，他那黑色的智慧的眼眸闪着光。“我们必须反对这些主张，”他大声说，声音响彻山谷。“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不能让以色列轻易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把成百上千的案件诉讼到他们的法庭，直到打垮他们的体制。你明白吗，去找军事法庭的奴里特（Nurit），带着成盒成盒的声明，看她对着要处理的弹幕射击般的新案件，露出那种吃惊的神情，我很开心。想象一下就兴奋不已。”

散步结束时我们的热情并没有消失。艾哈克（Al Haq）建立了特殊法律赞助基金，帮助那些付不起军事法庭起诉费用的人们，数百封起诉书被递交上去了。

第一批接受艾哈克基金法律资助的人中包括农夫萨布里·哈里博（Sabri Gharib），他住在拉马拉南部的贝特查（Beit Ijza）村。我们认识，因为他是1982年艾哈克第一个接受的宣读宣誓书的人。在里面，他证实了自己遭到吉万·哈达沙（Givon Ha'hadasha）殖民者的无情折磨，他们就在他的土地旁边建立殖民区，阻止他耕种自己的土地，朝他和孩子们射击，威胁要毁掉他的房子，夜晚经常被以色列军队逮捕。

萨布里和他的家人坚持立场。痛苦的经验持续了二十四年。2006年5月我拜访他时，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尽管要面临不断的压力，他还是设法保住了坐落在山顶的房子。但是现在殖民者从三面包围了他的房子，在四周建造了金属护栏，只留给他一条几米宽的通道，他只



挽救了一小部分农耕地，其他的都被强占了。最近引起他注意的问题是，正在建造的以色列分隔墙会把他和村子以及他在山下给孩子建的房子分开。结果他在殖民地的一边，在只为犹太人规划的住房区中成了不受欢迎的异教徒。他要向以色列最高法庭争取墙边的小路，给为正义所提起的无数早期诉讼案又增加了一件，结果却被一次又一次地回绝。我和萨布里站在阳光下，透过建在他房子周围的金属护栏看着殖民地。他给我讲了他最新的案子，这时我们看见一个老人在栏杆另一面溜着拉布拉多猎狗。我极力想引起他的注意，想要知道他这样困住邻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那人眼睛抬都不抬，严肃地走着，和狗同步，对萨布里和他的客人毫不在意。

萨布里的名字本意为耐心，他的达观和顺应能力真是非凡。尽管坚持了令人筋疲力尽的同殖民者的漫长斗争，世界犹太人复国运动组织和支持他们的军事政府却都在向他征税。虽然他无畏的黑眼睛里仍然有怒火，他讲述他的状况时仍然充满勇气和信心，他的健康却在恶化。最后一次拜访，我才发现有十个孩子的萨布里自己是独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土地，并决心保护好它，留给下一代。我还意识到这位勇敢的斗士对民族主义问题并不关心。他只相信两个永恒的存在，就是上帝和土

地。他认为，不去努力保住他的土地，就是悖理逆天，就是亵渎。

在 80 年代早期，殖民计划强行推进前，乔纳森和我幻想通过我们的合法斗争，能从犹太殖民者手中拯救巴勒斯坦的这些群山。我们都是梦想家，自信有精力，决心实现我们的计划，挑战以色列政府土地获取政策的基础。我们还希望拖垮军事法庭体制，延迟殖民时间，直到所有案件都处理完。而二十五年后的现在，那个日子还仿佛遥不可及。未来变得多么复杂和灰暗，土地仍然被将近五十万的以色列犹太人占领着，数百个殖民区散布在我们的山上，由横穿溪谷的宽阔公路连接。最近围绕殖民区又建造了围墙，摧毁了我们美丽的山丘，把我们的村子和城镇分隔，吞并我们的土地，附加给以色列，破坏本来可以达成的和平前景。

没有乔纳森，我独自一人，没有在标志漫步中间点的那块岩石处久留。我继续走下山谷，路径变得狭窄。这里叫做狗溪谷（El Kalb），下雨时，雨水会在这里汹涌翻滚。但是我没有走下那条窄窄的溪谷，而是靠左边走，沿着绿色蜿蜒曲折的小路，可以踩着石头，避免践踏其间的幼草和纤巧的番红花。

我继续走了大概十分钟，来到溪谷左边叫做鸟（El



Asfourah）的地方。要过去那边需要翻过长满苔藓的湿滑的宽岩石。周围靠近地面的是蛛网般的绿叶和甘菊的黄色花蕾。在浅浅的池塘里，小蝌蚪扭动着身体。到更低层山谷有一段下坡，下大雨时会形成瀑布。小路在这里分岔。继续朝南的上山的路叫加伯艾达（Jabal El ‘qda），后边是艾恩阿里克村，以清甜的泉水和石榴树著名。

我沿着狗溪去艾恩昆亚（A ‘yn Qenya）。此处狭窄且长满灌木丛。我沿着溪谷而行，跳过冬天被水冲得光溜溜的石头。我估计要两天才能走到沿海平原。

如果 1948 年 7 月那炎热的一天，被赶出家园的利达（Lydda）和拉木（Ramle）的难民必须穿过这些山谷回到自己的城镇，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以色列不许他们停留，但是也许象征性的回归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出埃及的恐惧和被赶出家园的耻辱。那将是象征性的回归之旅，返回埃及，洗刷当初被驱逐的耻辱。也许之后双方可以谈判其他问题。尽管我知道这不可能发生，梦想一下总还是好的。走在这些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疯狂的计划。

在拉马拉到艾恩昆亚的小路与山谷里的这条路汇合之处，我碰到了无法攀登的一些悬崖。它们成群地立在那里，像一个大门挡住了溪谷。东边的岩石紧密连接交

错，形成一种遮篷，可以在下面躲避阳光和雨。我绕着悬崖走，到山谷的另一面，继续穿过艾卡伯（El Kalb）去艾恩昆亚泉，村子就是以此泉命名的。

艾恩昆亚是人口不到一千人的小村子，房子没有自来水。每天早上妇女和孩子们要拿着桶到山泉那里去打水。有驴的可以一次运两桶水，放在驴肚子两边保持平衡，慢慢上山，经过多石的小路去运水。没有运水任务时驴就待在村中心的路边。最近它生了一头可爱的小驴。小驴安静地靠在妈妈旁边，低着头，看起来好像只有驴才能那么幸福。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漫步经过这个村子的情形。我们那晚就是在我旁边的这块岩石上睡觉的。那是 1969 年的夏天。我平生唯一一次参加拉马拉男童子军工作营。一天深夜，我们决定走路去艾恩昆亚。我忘记了是因为什么，也许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听以色列指派的拉马拉市长令人沮丧的辩论，他应邀给我们讲话。他倾斜的肩膀上下抖动着，为自己的笑话忍俊不禁，胳膊摇晃着。没有人笑，甚至也没有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可。或者我们出发去探险只是想证明我们做得到，毕竟我们正值那个年龄，虽然没有人认识路。

以色列士兵两年前作为统治者来过这些山。也许我



们认为克服对黑暗深渊的恐惧就是在重新夺回我们的领土。这次探险当然有解放自己的因素。夜很静，没有月光照亮前路。我们是黑暗中的八个靠不住的年轻人，第一次懂得人多是可以找到安慰的。我们脚上的靴子发出沉重持续的声音，这对其他居住在这些山里的生物是一种警告，如果不想被粉碎，就别挡住我们的路。加德从一棵老树上砍下一根树枝，威胁式地把它举在前面。我们谁都不肯承认自己害怕。不可能停下来，我们胡乱地走了几个小时，就都没有力气了。我们迷路了。我们爬到大块的岩石上，立刻陷入深深的睡眠。这样做可是太不谨慎了，但是我们年轻，敢于冒险。早上太阳出来，我们才醒，听到驴的叫声、绵羊的呼吸和远处妇女呼唤孩子去山泉打水的声音。尽管枕着石头睡得脖子和后脑勺都很疼，我还是记得，山谷里回响的水晶般清澈的声音多么让我着迷。记得我还在想村子里的人们是否和我一样喜欢早上的这种合唱。为什么他们那么大声地彼此讲话，或者原因很实际，那只是山里散落的房子之间通过山进行交流的方式，用人类的噪音代替电话？

然后是诱人的面包香味，那是村民自己在热石头上烘烤的。早上又冷又湿，我们饥饿难耐。我们循着香味穿过村子，烤面包的妇女慷慨地给了我们几条。

那是以色列占领的初期。有很多我们要了解的事情。和加沙地带不同，西岸很少有武装抵抗。忍受失败的耻辱，这痛苦更为微妙。我十六岁，渴望发挥我的潜能和力量。我浪漫，想扮演英雄角色。我不能接受市长颤抖着肩膀要我们明智一点，要我们放弃任何要抵抗的想法，但也不知道什么可行的斗争方式。我被强大的恐惧和不安压抑束缚着。当时我正准备读大学，不明确生活的道路会怎样。唯一确定的是我会在这里，在巴勒斯坦。我已经决定不去逃避。现在，十年后，我还是在空想，但没有成为英雄。我走到泉水处，阳光还在熠熠闪亮。

西面的山上是大片果园和耕种的田地。泉水聚积在池塘里，用于灌溉。在这片绿色的山坡上面有很多石头房子，完全荒废了，被巨大的橡树和松树所环绕。梯田使山色更加壮观。占领后就没有人在这里住了。看不到有路通向村子，只能步行、骑驴或骡子才能到达那些房子。

太阳在山后移到我的左边，我穿过半阴凉的村子。我想可以走上北边村子相连的有树的山，然后再回来。接近那里时，一群灰色瞪羚在我前面跳过，迅速向山顶奔去。



也许是飞奔的瞪羚让我忽发奇想。我想要追赶太阳，在山顶抓住它消失前的最后一道光线。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不论如何，我决定要把我选好的地点作为这美好一天的终曲。我脱下夹克和衬衣，裸露着上身向上跑，享受冷风刺在光裸皮肤上的感觉。我绕来绕去，避开路上的大块石头，感觉自己像马一样小心地落蹄，避免伤到脚踝。即使上气不接下气，我也没有停下。我一定要看着太阳沉落在迦法的海上。

我做到了。气喘吁吁赶到那里时间刚好。空气干燥清新。低低的山在我脚下铺展，像一片起皱的蓝色天鹅绒，小小的村落散落在褶皱间。迦尼亞 (Janiya)、第阿瑪 (Deir Ammar) 和最高峰上美丽的拉斯卡卡 (Ras Karkar) 村，都延伸在我下面。那些村子越远显得越小。最远处是一小块墨绿色，像一个小池塘。一座山丘和另一座山丘紧密连接，缓缓向海滨平原倾斜，最终进入大海。我站在最高峰的悬崖边。感觉自己仿佛处在西岸的中心，平坦高原的边缘，贝特恩和弗朗西斯·阿宾纳的土地占据了它的另一个角落。我继续欣赏风景，夕阳徐徐结束它最后的旅行，静静落下迷蒙中几乎看不清的地平线。我尽量屏住呼吸，直到橙红太阳最后一道银亮的边缘消失，只留下晚霞反射出粉光，散落在天穹，

把我笼罩。此刻，也像往常一样，太阳一落就开始起风了。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将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在空旷的山里。不久，以色列官方就开发了这片土地，建立了多莱夫（Dolev）殖民区。

回想 80 年代的那些岁月，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漫步，能够充分利用那种自由来了解这些山，这让我很满足。遗憾的是，有一次计划好的漫步最终没有办法实行。那是从拉马拉西边开始，穿过贝图尼亞（Beitunia）到达埃尔玛库（El Mahkwm）溪谷，经过贝特恩北部。在准备阿宾纳案件的过程中，我多次去查看我当事人的土地，所以熟悉了拉马拉西部那个地区。小路经过中部山丘，它们连绵到海滨平原，一直延伸到蔚蓝的地中海。我精心策划了这次漫步。现在因为殖民区和分隔墙，它化为了泡影。

阿宾纳案件是我接手的第一批土地案之一。我有足够的证据并希望我会获胜，设法拯救土地，反对在贝特恩村旁边建立殖民地。我清晰地记得这个案件是怎么交给我的。

当时我在法庭审理另一个牵涉合同的案件，一个矍铄的老人，一个高尚的人，拉住我的手。



“你是弗朗西斯·阿宾纳的律师，”他断言道。

这不是一个问题。他做了调查并且找到了我。

“是什么事？”我问。

他告诉我殖民者来要土地了。

我仿佛还能听到老人低沉的声音，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殖民者就要搬进来啦。你一定要做点儿什么了。”

老人是木可塔（Mukhtar），亦即贝特恩艾法夸（Beit ‘Ur El Fauqa）村中的长者（该村叫做上贝特恩，因其南方还有一个邻村，叫做贝特恩艾塔塔）。在村中，阿宾纳是当地的“基督徒”。“基督徒”家旁边的土地就是“犹太人”的。两块地在村子东南边界，限制了它的发展。约旦政权期间，犹太人拥有的土地是由约旦财产监护部门管理的（这是1948年开始约旦统治后，根据保护该地区以色列犹太人所拥有土地的法律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它英勇地斗争，保护土地不受非法侵占。弗朗西斯·阿宾纳的父亲，安托尼几年前去世了，40年代初他买下了这块土地，因为喜欢它的位置，它坐落在最高山的顶部，可以俯瞰海滨。一定是他开车从迦法到拉马拉住处的途中注意到的，因为它靠近公路。

从这块地再向下，约旦军队开发了一片地区，建了营地。但是没有人侵占阿宾纳家族的土地，无论是私人

还是政府官员，即便弗朗西斯住在东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开旅行社。私人财产在约旦统治下是受保护的。当以色列开始建立殖民地，村子附近的居民还以为基督徒把他的土地卖给了犹太人。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木可塔确信我们的办公室可以代表阿宾纳之后，来到法庭告诉我，以色列军方监护人发给他开发土地的命令，因为他是村子的长者。

我从木可塔询问我们该怎么做时的怀疑态度看出他是在探查什么。他想了解阿宾纳把土地卖给以色列犹太人这种猜疑是否有根据，这个命令只是一个掩盖，为了保护阿宾纳并消除对他背叛行为的怀疑。

但是阿宾纳并没有出卖土地。他父亲经常说起这块地是委任统治时期买下的，是靠近贝特恩艾法夸山上一块风景秀丽的土地，能够俯视西部平原和大海。他父亲做房地产生意，作为投资在不同位置购买了很多地。没有人告诉阿宾纳殖民者想要回土地。当我向他转述木可塔的询问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土地受到了威胁。后来，当我找到给木可塔签发命令的以色列监护者，给他看有关登记文件时，他才说不知道这土地是私人所有，所以才下的命令。当然，他本可以查询财产登记处，这对他轻而易举，那样他就会查明土地是登记在阿宾纳名



下的。可见他的行为是不可靠的。

现在，弗朗西斯·阿宾纳已经长大，高大魁伟，一表人才，不容忽视。他吸烟斗，穿有背带的裤子，大脑袋，总是一副快活的样子。当我告诉他监护者的话，他笑翻了，露出烟熏的牙齿。“我九十二公斤的超重体重还不算在场？我那么容易被忽略吗？”不但他本人高大魁梧，他的旅行社有大型招牌显眼地布置在萨拉丁街中心建筑上，那是东耶路撒冷的主商业街，上面写着大型黑体字母“阿宾纳旅行社”。

不过，这案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要查明政府对相应巴勒斯坦土地所使用的所有论断。

监护者提出的第一个声明，是说弗朗西斯不在本地，这很容易推翻，因为他一生都是东耶路撒冷的居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1967年战争期间或其后，他没有离开过国家，也不在被赶出国家的人们之列。

第二个荒谬论断是不在场人财产的监护者，碰巧也是政府土地的监护者，现在说如果弗朗西斯在本地，那么他的土地就是公共所有。“但这不是事实，”我说，“它是登记在我的当事人名下的，我有文件为证。”我出示了地图和早期土耳其和英国登记证明。但是监护者说地图与土地不相符，契约所属的土地和命令所指的不是

同一块地。我们继续抗辩，直到让法庭确认土地确是私人所有。

然后是第三个声明，称此案中的土地不属于非在场者，也不是公共土地，所以当被约旦政府开发用于军事用途。“如果这样，”我说，“给我们看开发令。”我把约旦官方政府的公报带到法庭，证明任何情况下约旦军队要开发土地都需要发布相应命令。这是约旦法律要求的，事实上，那个命令就是附近的约旦军营发布的。“没有必要下令，”监护者说，“约旦军队使用土地就证明政府要了它。”“他们用来干什么？”我问。“你会明白的。”他不可思议地回答，并要求法庭实地调查。全法庭去查看土地现场的计划很快制订好了。

办理此案的第一个月，我只与监护者保持联络，他懦弱而迷惑。我希望他取消这个命令。当我们陷入僵局，他建议我不要给法庭找麻烦，用手势和眼色提示我土地已经被政府拿去，要不回来了。但是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答案。于是，别无选择，我只得把信任不情愿地寄托在法庭程序上。

法庭主法官是阿卜·艾阿非亚，40年代时是我曾就读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1948年前，他是我的搭档和叔叔弗达的亲戚的好朋友。现在是常任以色列律师，



对土地法有专业经验。事实上，我们在英国领事馆都有共同的当事人。他是他们在西耶路撒冷的辩护律师，而我是他们在西岸的代理，包括东耶路撒冷。我相信我可以信赖他，他可以制止执意要骗取这块土地的监护人对法律的曲解。

案件来到我这里时，监护者已经租了土地。弗朗西斯来拜访时发现，基础建设工程已经开始。几乎所有指定给殖民区的财产，都以代表以色列国家的名义，由政府土地监护者所有。然后，监护者以长期租赁的形式把土地分配给世界犹太复国运动组织的殖民分部。租契规定，承租人不得转租给非犹太人。国防部必须批准这项分配。

在弗朗西斯的土地上建立新殖民地的工作由犹太代理机构负责，前期犹太复国运动得到了英国的认可，1922年英国委托他们统治巴勒斯坦，对于英国官方来说，他们代表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作为发展中的政府服务于犹太人，从国外把犹太慈善机构引入巴勒斯坦。这是世界犹太复国运动组织的兄弟组织，1897年由亨泽尔（Herzl）创办的国际团体，致力于推动犹太复国运动。1948年，这个犹太代理机构把大多职能交给了新国家，但是继续作为管道存在，通过它离散的犹太人可以

继续进行经济支持，捐献给非政府组织，而不是一个外国国家。它与政府的一项合同大致明确了职能分工。它被认为是一个全国性机构，连通犹太国家基金会和西岸附属的哈曼努塔（Hamanuta），后者以犹太人名义购买和管理西岸的土地财产。

1967年以前，在以色列就有裁减殖民部的建议。建造殖民地以造成既定事实的做法被认为是属于种族斗争时期，而不是国家已经存在的时代。但是，1967年对巴勒斯坦领地的占领扩大了以色列政府吞并土地的胃口，这个组织膨胀而不是缩小了。

我首先要求法庭颁发禁制令，停止在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工程。“由我来担保另一方的损失吗？”委员会主席问。“损失？”我问，“谁的损失？”“当然是犹太代理机构的损失。他们和大承包商签了合同。”主席说，“如果我们阻止他们执行，他们要因违背契约支付赔偿金。”他还说，万一耽搁已经订好的工程的话，那只有我准备担保二十五万美元的损失赔偿，他才愿意颁发禁制令。拒绝下令预示着不妙的结局。法庭继续审理案件时，工程也在继续。这不再是迷惑的监护人和我的事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大笔美国资金都启动来打这场仗了。

我认为法庭主法官不会是殖民计划的支持者。他当



然不是右翼分子。每个以色列犹太人都要履行应尽的责任，这是履行责任的最佳方式。奴里特（Nurit），法庭书记员，会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安排适合他的时间和审判地点。在指定的日期，他穿上军服，花几个小时为国家效力，省了去兵营或野地帐篷的不便。州代表要求的实地查看是他要进行的唯一现场勘察，那完全可以忍受。我们可以开车去那块土地。

当庭长反复叫我去法庭的时候，我对法庭公正的担心加剧了。有时他的语气是这样的：“你们阿拉伯人总是死脑筋，从不愿意妥协。难道你就不能是个特例吗？”另一些时候，他又用长者的语气给一个固执的、有勇无谋的年轻人以善意的忠告。总之都是催我建议我的当事人卖掉土地，暗示说反正也保不住的。他的眼睛带着疲劳的眼袋。最后他有点儿恼火地说：“这至少能给你的当事人弄到一些钱。”但是我不让步。我的全部目标就是拯救国家，不把土地出卖给敌人。幸运的是，我的当事人，也不愿意出卖土地，我有义务向他转达所有信息。像我预料的一样，他和我一样是个爱国者。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有充分的证据和登记证明，这是我可能获得的最好的案子。我决心打赢它，向全世界的人揭露殖民者的谎言，他们说自己只是用了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

我听到和读到大量关于疯狂的殖民者和他们更为狂热的拉比的事情，在确定的现场勘察当天，很有可能会遭遇一群非常古怪的人。

去贝特恩的路还是那条狭窄蜿蜒的小路，自从委托统治时期，我父母 1948 年以前，每年都从迦法沿此路去拉马拉的夏日别墅，不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车程。在 1948 年 4 月 27 日那重大的一天，他们也是走同样的路，放弃了拥有的一切，再也没有回来，除了作为依依不舍的参观者。自从那时我们就被困在这些山后有限的空间里，远离我们海边大城市的家。我父亲被迫回到阿卜·阿米恩的土地和拉马拉的省城生活，这一定是极其悲惨的。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唯一了解的生活。

1948 年，犹太军队企图通过海滨到城市的唯一通道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损失了不少士兵。1967 年后，后继的以色列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在耶路撒冷周边安置殖民地，确保可以通过另一条路进入它，使之最终会附属于以色列，这使城市的西北边界加厚了。殖民者被宗教动机所驱使，他们是国家利用来完成战略目的的便利媒介。他们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

从拉马拉到迦法的旧路，我们去实地考察时走的那条，是在其他道路依然绕山而建的时候修的，早在富足



的以色列政府开始深入挖掘山体之前。切开山体是为了让道路直而平坦，能很快把殖民者从国家的中心运输到犹太郊区，把迦法和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和特色，说服了很多以色列人来西岸的这些地区居住。这条旧路通向最高的山峰，经过阿宾纳的土地附近。弗朗西斯的父亲一定登上过这里，被俯瞰地中海的壮丽景色和清新空气弄得目眩神迷。也许他打算将来在那里建造夏日别墅呢。

我们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就从拉马拉到达了那块土地。走进去之前要经过路右侧的约旦军营。这块地已经被殖民者接管，丑陋的红色大篷车式的房子已经竖在那里。然后是“犹太人”拥有的空地。原来的地主是本村的。人们说在 1948 年的英国委托统治时期，他被迫卖掉土地，筹集资金付他儿子的辩护律师费，因为他儿子被指控谋杀。1967 年以后，没有把土地归还给不在本地的犹太人地主，以色列以犹太人的名义占领了土地，担心如果把它们归还给以色列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土地但不在本地的巴勒斯坦人就会要求同样的待遇。这块土地因此转到我的当事人手上。他现在有理由要回自己的土地，从一小块地开始，抓住一座山。阿宾纳的土地沿着山边上升，蔓延到村庄的第一批房子那里。居住者已

经把第一块地和阿宾纳的地用没有铺石砖的路连通了。

那天风很大。我们迎着风从临时的建筑一路上山，走居住者挖出的土路。一个美国居民热情地指出地上的裂缝，他说是约旦军队修的沟渠，据他解释，这是国有土地而非私人的证明，以色列人有权利拿回去。法官保持冷漠。像我一样，主法官非常了解约旦法律要求下达开发命令。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与风和山搏斗了一番，我们又冷又累。被邀请去新的居民社区大厅喝茶。

在居民总部，我预料会遇见魔鬼化身，狂热的疯狂的人，充满幻想的宗教激进人士，和我们强行对峙，迫使我们卷入多年的流血牺牲。想到要和这样的殖民者面对面，我就兴奋不已，有一种冒险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些邪恶的人的样子和行为如何。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在他们中间我能安全吗？

看起来非常严肃认真的人来接待我们，没有妇女。他们用泡沫聚苯乙烯杯子给我们倒茶。我们坐在长桌子周围，我觉得自己是老犹太人复国运动者的目击证人。我想以后他们这样的人只能在旧日的梦想中生活。这些人三十多岁，穿着牛仔衣裤。很多人留着胡子。看起来和蔼可亲。不是充满幻想而是固执坚守职责的，完全不知道他们行为的受害者阿宾纳怎样看待他们。他们好像



也不在乎。如果我明白地告诉他们，我深信他们有罪，并且反对他们的殖民计划，我怀疑他们甚至不会听我说话，因为他们充满了自己的意志。

他们的热情具有传染性。如果不是处在对方的立场，我也许会被感染。他们实际上是在露营，把敌人推出去，扩展他们国家的地盘，也许被自己的“漫游”迷惑住了。一些合法的反对在他们神圣高贵的目标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我认为的邪恶的人应有的相貌和怪癖。

他们也不疯狂。他们是高效率善于计算的商人，想要跨过法律障碍。更加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对我毫无愧疚感。我代表财产被他们占用的土地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他们偷窃的。我料想他们至少在我面前会显得抱歉和胆怯。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对贝特恩的巴勒斯坦人完全不在意，而我们已经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几个世纪，决不想被新居民排挤出去，这些人的住处离他们的办公室距离才几百米。对使用任何欺骗和谎言来达到目的，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这一点我后来才发现。对他们来说，结局使任何手段的使用都正义化了。这就是那些自认为在为更高目标服务的人们的所作所为。

将要建立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区叫做伯和仑（Bet

Horon），和仑是乌加里特文学中迦南人的神。《圣经》把上下伯和仑的创立都归于舍伊拉（Sheerah），以法莲之子比利亞的女儿（《历代志上》7：24）。除了这个古老的圣经联系，计划在我当事人的土地上设立殖民地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计划吸引了普通的中产阶级，非宗教以色列人，而不是信徒，他们愿意住在乡间安宁的环境中，有惊人的美景，不超过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特拉维夫的便利交通。

当我和乔纳森坐在那块岩石上，策划如何通过合法行动挫败整个殖民计划时，我们并不知道法律方面只是很小的部分，最终是微不足道的。在占领区建立殖民地是国家项目。不会受到法律的牵制。监护人、法律顾问和法官要自己找到法律途径。政府知道要从这些土地法庭得到什么结论。更高的国家利益不顾忌法律的准确运用。

我记得很清楚，上次开庭时，尝试了很多诡计之后，监护人试图让一个阿拉伯年轻人来作证，向法庭证明土地是由约旦军队使用的。天气恶劣，法庭里阴沉沉的。外面寒冷潮湿，听说要下雪了。我们被安置在过热的俄国式房间，那是以色列法庭、警察局和监狱的所在地，几个巴勒斯坦人曾在那里被折磨致死。法官席主审



法官阿卜·艾阿非亚（Abu El Afia）是以色列犹太人，有阿拉伯人的姓，意为有活力的父亲，在试图用可尊敬的外表灌输这些欺骗过程时，他的青蛙眼会睁得大大的。他的两个同事坐在长椅上，大多时候沉默不语。他右首是巧克力厂老板，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看起来有点儿心烦意乱，可能在想着他的巧克力。另一个法官温顺谦恭，很可能是政府官员伪装的。

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被律师带进来做目击证人。他的头全部用黑白的布缠着，是老巴勒斯坦人喜欢的格子头巾，只露出眼睛。他证明 he 和约旦军队一起训练，就在阿宾纳可怜的土地上。我强烈反对这种证人。我坚持说 he 必须露出脸来，没有道理这样带 he 进来。州代表丹尼·克莱莫（Dani Kramer）不想说出证人的名字和年龄。很显然，he 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可能十五年前就在约旦军队中服役。主法官有些尴尬。他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在民事案件中没有理由掩盖证人的身份。

这时，丹尼·克莱莫走向前台，对主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他立即同意戴面具的人可以裹着头作证。眼睛犀利、头上缠头巾的人开始背诵练好的台词。我怀疑他是被收买的，不是用钱就是军方对他或他家人做了什么承诺。

我想知道，面具后边的人是谁？我想我认出了那双眼睛。它们热诚地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究竟是什么？道歉，还是请求理解和宽恕？那眼神里没有卑鄙，没有报复，只是热切。什么样的人会接受出庭作证，这样说谎，背叛自己的国家？

我，还有我的同事莫娜·里斯玛伊（Mona Rishmawi），急切而紧张，我们竭力想知道是否应当继续这种闹剧。我们继续到底对巴勒斯坦有好处吗？或者我们只是给了非法法庭以合法性？律师和全体陪审员在讨论，不断咨询。那天法庭里没有其他人。

我向窗外望去，云在聚集，天气更加恶劣了。证人已经完成了证词。这黑暗而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件恰好和开始不情愿地落下的雪的纯洁形成对比。不久它就会覆盖那红色瓦屋顶，中间有庭院的建筑就会被一层温柔的白色改变，甚至墙上铁丝网的针刺也会被掩盖。如果雪落在路上，回拉马拉的路就很艰难了。我的车没有这样的装备，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我也不是个好司机。

我们开始戳穿这种装模作样的游戏。戴面具的年轻人说他参加过约旦军的民防部队，他们在山上训练，使用过阿宾纳土地上的沟渠。“那又怎样？”我争辩道，“这能证明什么，如果是军队挖的战壕？他们可以这样



做，而土地仍然属于私有。土地不会在军队接触它的一刻神奇地改变。土地只有在被开发时才会改变主人，但是这没有发生。”像我一样，主法官对这些很清楚，不过他会保持职业正直和勇气按照法律行事吗？

我再次望着长长的窗子。雪还在下，犹豫不决地，像棉絮一样飘落。我坐着，听着丹尼低沉的声音，绒毛般柔和的雪片在外面的路上翩翩起舞，让我心不在焉，它们掩盖了灰尘和肮脏。我迫不及待希望开庭快些结束。离开时，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法庭旁边臭名远扬的监狱也会被洁白的雪覆盖。我开始担心怎样回去。

我们没怎么费力就出了耶路撒冷，回到拉马拉，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雪比耶路撒冷还深。从一条小路开上大路时，我决定不在停车标志那里停，我担心车会打滑。这时，一辆以色列军队的吉普车正好经过。它突然转向，停靠在我旁边。士兵问我为什么不停车。他们发现我的行为可疑。我试图解释，但他们不听，假设我是想逃跑。一个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上前干涉，为我说了好话，他们才放我走。要不是有这个可能的合作者的干预，我在那个寒冷的雪天就会被拘捕。

艾恩昆亚漫步后的几个月，阿宾纳土地案有了结

果。没有开庭宣读决定，是邮递给我的。军队抗议委员会查明“我们毫不怀疑上诉人是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即使如此，委员会还是决定，监护人和犹太人复国运动代理机构所立四十九年期限的出租合约是“合法的，确实而有效的，尽管我们认可上诉人对土地具有所有权”。这个奇怪决定的根据是第 58 条军规第 5 款，它说：“任何不在场者财产监护人与其他相关者的善意交易，只要监护人进入此财产时相信它已被遗弃，交易就是有效的而且持续有效，即使证明财产当时不是被遗弃的。”

总之，我已经预料到这种可能性，他们会援引这个条款，于是我写道：“如果第 5 条款没有经过严格解释，监护人相信不论采取什么行动（即使基于不恰当的法律考虑）都是有追溯效力的，只要是遵守诺言，无须以严格的标准去确定它事实上是否存在，监护人可以自由行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的陈述好像对法庭没有一点儿影响。法庭不但找到方法把接管我的当事人土地合法化，还没有下令给他任何补偿。阿卜·艾阿非亚的确是个忠诚的以色列人。我庆幸没有建议我的当事人缴纳二十五万美元的保证金，那是法庭下令在案件未决期间停止土地上的建筑工程的要求条件。



根据西岸继续实行的约旦土地法，土地长期租赁必须在土地登记部登记土地权限。我问过土地登记员哈兹，阿宾纳土地的出租是否在拉马拉登记处（它的权限包括贝特恩）登记过，他说没有。那么租赁是在哪里登记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军事命令，不可思议地提到“特殊土地交易”要在特别土地登记部登记。我一直想，既然不是在拉马拉，那一定是在贝特恩西岸军事总部，不是在以色列，因为土地不在占领区。多年后，我碰巧核对耶路撒冷当事人的一块土地，发现包括西岸的犹太殖民地土地租赁都是在以色列土地部门登记的，所有以色列国有土地都在那里登记。这个发现终于揭开了所有谜底。我意识到，事实上，西岸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土地都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以色列的土地。神圣的法令决定西岸属于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地位，被长期合法地充分利用，通过详细的行政安排，确保土地在任何方面都属于以色列，除了名义上。

2006年11月15日，纪念巴勒斯坦独立日假期，我去贝特恩拜访作家阿德尔·萨玛拉（Adel Samara）。也想看看阿宾纳的土地怎么样了。已经不能走捷径进入村子了，那只需要二十分钟。我们要向西，转南，然后再向东，绕一大圈，通过艾恩阿里克、德伊兹（Deir Ibzi）、卡弗尼

玛 (Kafr Ni'ma)、萨发 (Safa)、贝特艾塔塔 (Beit 'Ur El Tahta) 等村子，经过九十分钟艰苦跋涉，穿过羊肠小路，翻山越谷来到贝特恩艾法夸。一到了村里，我就听见沉重的车辆在 443 号公路上行驶的噪音，这条公路代替了原来把贝特恩和拉马拉连接到海边平原的旧路，穿过村子中心。新路在旧路的南边，从村子外围经过。尽管新路包括长达 9.5 公里的西岸路段，“以公共需要”的名义建造在从六个巴勒斯坦村侵占来的土地上，其中也有贝特恩的耕地，以色列军队却禁止巴勒斯坦人使用，并以水泥路障关闭了通向贝特恩的出口。阿德尔每天要在居住的村子和工作地拉马拉之间往返奔波。他指着下面的路说：“看看这图解的种族歧视的例子吧。”他告诉我说，他的家在路的另一面拥有橄榄树，但是不能去摘橄榄，因为没有人行通道，要横穿繁忙的高速公路是非常危险的。

阿德尔的房子位于有八百居民的小村中心，我们开车经过和上次法庭一起走的同样的路段。我还记得我们过去常常停下来买当地烤的面包，那家商店还在，但是今天我没有胃口吃东西。

我开车到阿宾纳的土地，爬上村子最高点，经过半损坏的古老的土耳其防御工事。阿德尔指着塔上的孔，



那是一战中，和驻扎在村东面山上的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指挥的军队开战时，土耳其驻军为了保护耶路撒冷北部公路炮轰造成的。经过短短的下坡路，我们来到一座高达五米的墙前，由钢筋混凝土建造，它围住了阿宾纳的土地。它让我大吃一惊。我记得原来缓坡周围只有不多几棵松树。现在古老的村子被粗暴地结束掉了，仿佛一个监狱被放置在山的南端。围墙里是富裕的以色列人的豪华别墅，主要是信息技术行业的技师们。他们背叛了巴勒斯坦邻居，以生硬粗暴的方式说明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资助一个现代消费社会在免费土地上建造豪宅。那里有奇异的美景和清新的空气，和中心城市相连的四车道的高速路，也是建造在邻居的土地上，而他们却无权使用。从村子里看不见殖民者的住处，任何部分包括房顶都看不见，只是街灯整日整夜地亮着，给它们提供进一步的保护，以防村里的年轻人用梯子爬上围墙攻击住宅。我曾试图询问阿德尔，殖民者和村中居民的关系，两者的数量几乎相等。但当我看到当时的状况，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答案显而易见，以最明确的方式显现出来。

站在墙前，我可以从混凝土的方式看到，过去三十九年来，一系列以色列政府追求建立犹太殖民地政策的

后果。占领者通过合法狡辩占据土地，完全违反国际法，安排自己的人居住在敌方城镇和村庄里，这只能导致暴力血腥事件。这样夺取土地绝对不能接受。流血斗争不可避免。高墙把住在贝特恩与伯和仑同一座山上的混合人口分隔，这不能安抚任何人，只是挡住了强占者，让他们看不到被不正当分隔的村中人们眼里的愤怒和憎恨，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活动受到限制，未来注定灭亡。

大墙从山顶延伸到公路，留下南边的山坡，在边界外，一些村民的房子就在那里。政府学校服务包括两个贝特恩在内的几个村子，坐落在山脚底——被夹在墙和新高速公路之间。沿墙边有一条陡峭狭窄的柏油马路可通到学校和村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十二岁的男孩放学回家，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山。阿德尔（Adel）指着他们说，每天两次他们要经过这个禁止入内的丑陋建筑。而过去，他们可以看到山谷四周的风景，一直延续到东边。“他们长大会怎么想？”他大声说。

我停好车，我们站在被墙环绕的山顶，看着山和北面的溪谷。以色列军队挖的另一条路穿过山中，那是最近开通的军用路线，连接伯和仑和耶路撒冷，从东边环绕拉马拉南方的贝图尼亚镇。阿德尔解释说这条路是要



建造的墙的边界，把村北的整座山都开发出来，与环绕伯和仑的墙连接起来。这样就把殖民地放在以色列想要吞并的北耶路撒冷的一个殖民区内部了。我问阿德尔，我们望见的地区有没有可走的山路。他说他年轻时经常从他的村子走到拉马拉，穿过溪谷，现在还记得那条路。他还告诉我路上有两个圣人的神殿。一个叫做圣阿卜·扎图 (Maqam Abu Zaitoun)，另一个是圣阿姆·艾西可 (Maqam Um El Sheikh)，他猜想后者是前者的母亲。还有两条泉水，一条流得非常急，水质甘甜，常年活跃，叫做安亚加由特 (A 'yn Jaryout)；另一个叫做安亚梅塔 (A 'yn Meita)。

“那么我们看见的这条向西的山谷呢？”我问。

“这条宽阔漂亮的山谷我们叫它艾玛勒其 (El Mallaqi，聚会谷)。也许它的命名是因为它连接着中部山区和海滨平原的很多村子。”

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直想走的那条路，通过它可以实现从拉马拉山到沿海平原再到大海的愿望。可是太晚了。即使我冒险攀登贝特恩高峰到达溪谷，也很难走完全程的五分之一。一旦要经过比尔伊 (Bil 'in) 村到西北去，我就会遇到新建的高墙，即使我能设法越过，溪谷和山上大量的穆迪 (Moodi 'n) 殖民地，还有其他跨

越绿色地带的殖民地，也会挡住我的去路。这个漫步计划是永远不能实现了。



我总是把艾伊昆亚山谷的小路和我结婚前的日子联系起来。六年后，也就是1988年，我和佩妮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高潮中成亲了，巴勒斯坦宣布独立的几天后，我们从我的旧居搬进沿路向下的新房子。我们开始在艾弗达(El Wrda)溪谷散步，阿卜·阿米恩溪谷就在我住处的后面。但是199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佩妮来办公室找我。

“去山里散步吗？”她问。

我正准备离开，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她已经想好了要走我们一直忽略的艾伊昆亚山谷路线。

我们已经进入了过渡阶段，即奥斯陆协定指定的五年时间，在确定占领区最后地位的协商开始之前。那之后就是决定殖民地命运的时候了。巴勒斯坦对更美好的未来和结束冲突的希望反映在更高级的投资上，它们大多用于建筑。拉马拉东部和南部已经被犹太人殖民地包围。城镇发展的唯一土地是西北部山区，但也很快被新巴勒斯坦建筑开发了。离我们房子不远的伯利恒大学员



工住宅就要竣工了。还修建了一所新的私立学校，以及一些漂亮的别墅，显示出新锐分子的财富实力。结果，我们要多走一段路，才能到山谷下面去。但是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从山边倾倒下来的成堆碎石。我们先尝试走过一堆，但是土堆太软太滑，无法通过。我们继续穿过建筑工地，直到找到一个可以向下走的地方，那里有条路勉强可走，可能是误倒的混凝土形成的。我们下去，我向佩妮建议说，我们应该先看看附近别墅。这样我们开始下坡，冒着要摸黑走回来的危险。

这时我们听见了枪声。我感觉很近，不过还是乐观，佩妮以为那只是回音。接着传来更多的枪声，更大也更接近我们了。不可能是回音。一声呼啸掠过头顶，佩妮倒在了地上，我担心她中弹了。

不过没有。她抬起头说：“我想他们是在朝我们开枪。”

我拉住她的手跑到岩石背后躲避，它形成下山的阶梯墙。枪声是从我们后边和上面传来的。我们希望紧贴在岩石上，不让身体各个部分暴露于弹火中。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谁在射击，我们是目标吗？还是我们碰巧挡了他们的路？

我环顾四周，看看山下还有什么事发生，但是什么

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火力加强了。我确定我们是目标。但是为什么呢？

自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管了拉马拉，以色列军队一直没有冒险进入城镇。朝我们开枪的好像也不大可能是以色列士兵。但是为什么巴勒斯坦警察要射击我们呢？是把我们当成殖民者了吗？如果这样，我可以扭转这个误会。

我举起帽子挥舞，用阿拉伯语大声喊：“你们为什么朝我们开枪。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停下，停下。”也许我的帽子没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我的声音传不了多远，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射击还在继续。

“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殖民者。”佩妮喘息着说，“他们不打犹太人的。这太复杂了。别拿你的生命冒险了。”

枪声无情地继续着，没有停息，我们没有喘息的时间，也无法镇定地思考下一步怎么办，如何设法逃脱。一串子弹在头顶炸响，击中我们藏身的岩石正面，碎片在空中散落。仿佛一些子弹要跳起来打中我们。

最后短暂地平静了一下，我再次尝试。这回我走向前，也许亲自出来比挥舞帽子要令人感动。我转身向上看。我看不见他们了。两个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穿着牛仔衣



裤，站在没有完工的建筑上，对我挥动着枪。他们能看见我，我确定。我想现在他们看见我该停火了吧。但是没有。年轻人的弹雨落下时，我及时跳回岩石后面。现在我相信他们不把我们打死是不会停手的。我蹲在岩石后，不知道自从以色列结束依赖开始直接统治以来，情况到底有没有改善。我们的严酷考验持续了漫长的二十分钟。

枪声停了，我们又等了五分钟才摇晃着溜出来。低着头，靠近阶梯墙的岩石，疲惫不堪，心烦意乱。上到公路，走向特里路一端的巴勒斯坦检查站，离我们几乎送命的地方不远。我们想对士兵报告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年轻的杂役出于礼貌听着，他看出我们是多么恐惧，他知道有两个年轻人在山里射击。他一定是听见了。但是他年纪大些的同事过来，问什么事。年轻人复述了我们的故事，但是这个年长的官员不想听。他打发我们走，拒绝和我们说话，也不听我们报告。

这件事情过后好几天，佩妮不断和我说，我们应该向巴勒斯坦总督报告，应该递交一份正式的书面投诉。我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我一直鼓励人们通过法律手段，呈交合法投诉。但是现在，我不愿意采取任何合法行动。根据我对奥斯陆协定的理

解，我充分意识到，要说清可依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和抵抗占领的合法行为的区别是不可能的。这种边缘的模糊意味着迷惑和法律空白，让人不可能知道在哪项法律下这些年轻人可依法受到处罚，或者向谁递交犯罪诉讼。我也找不到我的上诉可以依据的法律，哪一项确立和规定了武装力量的职能。有这么多疑问我如何起草我的投诉？后来有一天，我父亲多年的一位朋友碰巧来我办公室，和我搭档讨论他感兴趣的一个民事案件。我趁机告诉他山里发生的事情。听我说完他显然很紧张。

“你不应该去山谷，”他说，“年轻人总是在那里开枪。那是他们演习的地方。就在几天前，他们说有日子没有打枪了，就上山去练习射击。”

他叫了他的卫兵问：“你们上次去射击是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他转身向我说：“你看，那就是你说的事件发生的日子。情况是这样吗？”他又问他的卫兵：“你们去哪里射击的？”

“在特里（Tireh），靠近穆斯塔可巴（Mustaqbal）学校。”

“是吧。和你描述的地方很近。”他又问：“什么时间？”



“晚上十一点。”

“我们遭到枪击的时间要早得多，”我说：“而且我们不是在学校后面。我们靠山上一些，离检查站不远。不可能是他们干的。有牧羊人和其他人在山里走。我走了二十五年了，这些山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从来不需要担心。应该鼓励人们去山里散步，可以增强人们对国土的感情。”

他不同意。“你不应该去散步，”他用父亲般关切的语气说，“太危险了。”

“也许你的士兵认为我是在和一个外国女人幽会。”我推测说，“他们想要破坏气氛。不过，看看我的光脑袋和佩妮的灰白头发，哪还有什么年轻人的狂热。”

“可怜的拉马拉。”他说着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因为帮不上忙而感到尴尬，感到抱歉吗？当年在社区非常有势力的朋友的儿子，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在山里被射击，而他却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



又是六年，另一次抵抗运动，我再次走向同样的山谷。这次是和一个巴勒斯坦裔荷兰诗人，拉姆齐·那

瑟 (Ramsey Nasr)。我曾经在拉马拉迪万咖啡馆举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见过他，并邀请他来山里漫步。他很兴奋，因为他喜欢化石和徒步旅行。我们租了的士，把我们带到通向废水处理厂的狭路，在穆斯塔可巴学校后面。然后我们开始下坡。

大概是下午四点。天开始阴沉，但没有下雨。伯利恒大学住房开发工地下面的台地上，新的房屋和道路在迅速建起。我想工程很快会延伸到溪谷。有恐龙脚印的祭坛岩石也幸存不了多久了。很多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已经被更高层台地上倾倒下来的碎石覆盖。最后我们设法绕过这些疏松的泥土和石头堆，找到可走的路继续前行。我们边走边聊，彼此了解得更深了。不久到达了第一块大岩石，我记得这是靠近石化脚印的那块。我四处寻找，但是没有找到。这时我听见不远处的狗溪那边传来狗叫声。不知道有多少只，会不会攻击我们。我让拉姆齐站着别动，我自己十字形地走过石阶，去找那块岩石；在比记忆中远得多的地方找到了它。这时狗叫声更近了，是一群野狗，可能有狂犬病，很危险。我砍下几根干枯的长穗荆棘的茎秆，拿在手里，万一狗来袭击我可以自卫，除了做荆冠，这是荆棘的另一个用途。

一开始，拉姆齐对岩石没怎么注意。不过当我指出



它的与众不同后，他就看到了可能是恐龙的脚印。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们在危险的拉马拉山里的探险用荷兰语写成诗。他要拍照。他不慌不忙地仔细拍着。天光渐暗。开始下雨了，狗叫声也近了。我留心听着，希望我们能在灾难降临前离开。拉姆齐正在欣赏另一块有树根化石的石头，是我找给他的。他犹豫着。“拿着。”我说。他接过去，谢了我，好像它是属于我的。他彬彬有礼。

他终于拍完了所需要的照片。我们开始朝上坡走。我有荆棘武装，而他拿着那天下午给父亲买阿拉伯语词典用的塑料袋，还有带树根的化石。我快步走在前面。

“你是很好的主人，”我听见他叫，“给我一根树枝防狗吧。”他一定和我一样担心狗。

“不，”我开玩笑地说，“在这些山里要自己顾自己。”

不一会儿我听见他轻声说：“看上面！有士兵，他们有枪。”

我一直忙于在岩石间找路，没有注意。

“士兵？什么士兵？以色列的还是巴勒斯坦的？”我问，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

朝上看去，几层石阶上，一些杂役兵的剪影投在地平线上，他们用枪对着我们。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

坦，这些山里不应该有士兵，也许在任何山上，世界任何地方都是。

以色列士兵为什么会长到拉马拉来，他们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

仔细看看，我发现这些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像以色列士兵。我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招呼。开始没有回应。我决定慢慢走过去，尽量保持镇定，强压住对他们破坏我们散步的愤怒。

走到跟前，我告诉他们我是谁。他们问我在干什么。

“散步。”我说，不想告诉他们更多的事。

现在雨下得很大。

“让我们看看身份证件？”

我拿出钱夹，幸好带着，抽出律师证给他们看。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间散步干吗？”他们问，好像这里是极度危险的地方，死亡幽谷。

“散步。”我重复道。然后补充说：“我们下去看有恐龙脚印的奇特岩石。”

我想也许恐龙会让他们感兴趣。但是他们没有反应。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客人。我们认为这位外宾被绑架了。我们已经包围了这个地区。山谷另一面也有我们的人。”

他指着艾伊阿里克山谷那边的山。他们显然部署了军事行动来逮捕我，营救拉姆齐。

他和其他的士兵通话。“没问题。”他用对讲机告诉他们。

我还拿着准备对付狗的荆棘。“我希望你们没把这当做枪。”我说。

他挥挥手驳回了我的暗讽。不过他确实说他们怀疑我们下面还有同伙，是一起团体绑架。

“我经常来这些山散步。”我对一直讲话的应该是指挥官的人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和我差不多高，眼睛乌黑热切，穿着工作服。“事实上我曾和妻子来过这儿，那是 1999 年，当时你的士兵向我们开枪。”

“那时我在那儿，”他指着说，“我在那儿。”他顽皮地笑笑。

“你差点儿杀了我们。”我说。

另一个士兵用奇怪的辩解语调插话说：“这些山很危险，我们在这里发现过很多尸体。”

我们站在黑暗里，大雨倾盆，我回忆起六年前那个

恐怖的下午。我从来没有想到以后会遇到朝我和佩妮开枪的人。他好像也不是特别内疚，当然也没有向我道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并不期待道歉。不过我仍然感激地想到，每个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局。





靠近通往峡谷步道开端处的德拉齐溪谷（2007）

漫步 3

幻想的入口

可兰，死海和德拉齐溪谷

很多年，我继续在以色列法庭上争夺被用做犹太殖民地的巴勒斯坦土地权利。正像阿宾纳土地案所表明的，即使证据非常确凿，也不可能完全获胜。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的努力可能会减少被以色列政府和过分热心的不在场者财产监护人夺走的土地。我还相信，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行为不应该不引起争论。接替的以色列政府继续贯彻在占领区殖民的政策。数十亿美元投资到这个项目上，有时资金是从以色列很需要帮助的地区转移来的。西岸中心地区总体规划后，又有同样野心勃勃的开发北部和西部的计划。政府竭尽全力执行，尽管违反国际法。

征购土地不是殖民的唯一先决条件。有利于他们的土地使用计划也同样重要。它的目的是指定大多数空地



为他们将来使用，孤立巴勒斯坦人口区，通过殖民地包围来破坏他们领土的连续和完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委托统治时期准备的西岸区域计划被改变，1980年代末草率完成了多数巴勒斯坦城镇村庄的规划。这些都包括在用标签笔在航拍照片复印件上残忍勾画出的计划之中。主要目的是确定限制巴勒斯坦城市发展的界限。同时犹太人殖民地提纲也正在准备，目的恰好相反。他们保留最大限度的土地以备未来发展之用。在法律的掩护下，一个具有高度差别的城镇隔离规划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我对这些方案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西岸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以色列移民，思想上是倾向于殖民计划的。即使巴勒斯坦人找到经济来源，雇用城镇规划员来合理规划自己的村子，规划委员会也拒绝了他们，坚持原来的方案，把村子限制在现有建筑的范围内。当我询问村子如何为居民的未来发展提供土地，他板着脸回答说可以在内部建造高层建筑。一想到起伏山脉中美丽的村庄挤满摩天大楼就让我害怕。

这些发展迫使我反思自己的策略。很显然，合法争辩不能限制或减缓大量犹太殖民区的建立，有必要超出以色列法律和法庭的条条框框。当马德里国际和平会议在1991年9月召开时，我期待着和平谈判的前景，因为

它是唯一夺回我们被强占的土地的机会。

不过以色列也对形势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成功地将谈判范围限制在“有关过渡政府对巴勒斯坦人安排的会谈”上。殖民、土地划定及其与以色列在行政和法律上的联系不在本次会议的范围内。让巴勒斯坦代表团有说服力地争辩包括这些问题的案件是不容易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团长请我帮助他计划合法策略，应付这个挑战。

我研究了此事，提出了建议并且去了华盛顿，洽谈正在充满希望中进行。我很快发现，巴解组织首领亚瑟·阿拉法特正在指导突尼斯代表团，他关注的东西有所不同。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对巴解组织的认可。三年后，原则宣布时，这一点以殖民地不受巴勒斯坦官方管辖为代价而取得。巴勒斯坦官方也没有权利改变村庄和城镇的地域划分，或拒绝以色列夺取土地用于建立殖民地的要求。我沮丧而惊恐。一下子，政治私利导致了接受所有非法改变，而我们在占领区二十多年的斗争都被抵消了。

尽管存在根本的缺陷，奥斯陆协定还是被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接受了。我发表相反意见时，就被归类为反对派。为了让协定更受欢迎，国际基金流入占领区，目的



在于分散人口，不让他们继续为结束占领而斗争。大量批准非政府组织进行民主训练，鼓励人们想象巴勒斯坦已经获得了独立，所缺乏的只是人们集合起来进行民主实践。以色列还控制着大部分水资源，昂贵的项目引进教育人们要节约水。大量资本注入占领区意味着多数人愿意把主宰他们四分之一世纪的国际主义议程放在一边。看到人们如此变幻无常，很容易让他们放弃曾充满热情坚守的立场，我感到震惊。我们反对占领的斗争的中心是殖民地，现在它们围绕着我们，以色列继续扩张，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人们却说奥斯陆协定提供了我们和以色列人未来和平的方式。

以色列愿意做出的少数让步是允许巴解组织领导回到巴勒斯坦领土。塞尔玛·哈萨（Selma Hasan）是其中之一。她在突尼斯给奥斯陆巴解组织领袖默哈莫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做翻译。自然，她对参观巴勒斯坦的一些遗址很感兴趣。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和佩妮决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到死海散步。

她详细描述了她所住的街区，不过还是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签署和平协议以来的两年里，拉马拉局限在以色列城镇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它更加拥挤和破旧了，给新来者建造的新的高层建

筑塞满了狭小的土地。浓得几乎让我看不见路的冬雾，也没有使它显得好一点。

我们最终到达塞尔玛的房子时晚了十分钟，我们发现她在外面的街角等着，快要冻僵了，牙齿打颤，她挣扎着说没想到拉马拉这么冷。

“你期待什么？”我问，“这里比耶路撒冷纬度高。温度总是至少低一两度。”

“但是这雾，还有潮湿，就像住在海边。突尼斯暖和得多，但是今天的浓雾倒让我想起那里的冬天了。”

“我们朝向大海。没有缓冲带。天晴时从你的屋顶可以一路望到特拉维夫。真的没有那么远。”

“不论我读过多少，听人们谈论过多少，看过多少照片，我怎么都无法想象。”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甚至 1967 年以前也没有吗？”

“我的家在萨法 (Safad)，1948 年后去了贝鲁特。我从没来过西岸。”

她补充说 1974 年她加入了法塔赫 (Fatah)，巴勒斯坦主要抵抗运动组织。她的生活与我截然不同。她丈夫伊斯安姆 (Isam) 是法塔赫的军官，现在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没有以色列的批准他不能回到西岸，审批要漫长的过程。我问她是否知道他何时会回来。



“他还在安曼等待以色列通行证。不过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先是允诺，然后又否认。我一直胆战心惊地生活，整理好房间却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机会一起住在里面。这状态真是糟糕透了。”

“如果他得不到批准回来，你能留下来吗？”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每天早晨醒来想念他，又感觉能回到巴勒斯坦已经够幸运的了。新生的巴勒斯坦。原来从没有想到我能活着看见这一切。”

我听着，对塞尔玛错误的理想主义感到懊恼，但我还是保持沉默。我们要在通向耶路撒冷途中的第一个检查站停下来。

对像塞尔玛这样的新来者，这里的自然历史从现在开始。她不会知道，除非我指出来，几年前拉马拉和东耶路撒冷都还没有障碍，以前几乎是一个城市。虽然不情愿卖弄学问，我觉得还是有责任对她解释这一切。同时，我愤恨做向导这个事，我更愿意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照顾自己的思想感情。

我从没想到西岸会和以色列分隔开。不过记忆多么短暂！我在约旦统治时期长大。当时有严格的界限，我不能访问 1948 年的巴勒斯坦地区，它已经变成了以色列的一部分。但自从 1967 年西岸被占领，拆除以色列边

界，我开始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了。现在新的边界又被以色列单方划出，没有依照西岸和 1948 年以色列历史上的绿色边界线。

我们沿着邻近的西可加拉村（Sheikh Jarrah）向东耶路撒冷走去，途中我意识到，多年来象征古老耶路撒冷的萨赫拉清真寺美丽的圆顶已经看不见了。它被故意设计的新建筑遮蔽了。以色列城市规划者不但阻隔了这个熟悉的地标视线，还沿着阿拉伯东耶路撒冷西外圈修建了宽阔的高速路，限制它的发展，并把它和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就分隔邻居关系方面，高速路是更有效的地理屏障。墙总是可以拆除，但是道路一旦建好，成为残酷的现实，就很难改变。参观者现在也不再叹息了，更不用说像很多征服者和朝圣者那样为古城被群山包围而下跪。现在，遭受控制，充满阻碍，墙和丑陋的街区，它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备受折磨的城市。

我们开过斯考普（Scopus）山底的一个隧道，它缩短了玛里阿杜米（Maaleh Adumim）殖民地和西耶路撒冷的距离。我们正要走下死海所在的洼地，殖民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建在伟大的圣马提里乌斯（St Martyrius）拜占庭修道院。殖民地的名字意思是红色坡地，以岩石的颜色命名。开始时它是在那里建造工业园的工人



的临时营地。低低的挡土墙围住高地，没有挡住视线。以色列政府命令城镇规划者建造一座尽可能大的城。命令被严格认真地执行了，所以现在市区比特拉维夫还要大。建筑师计划把它所在的山削成手掌形状。把市中心放在掌心，层层的房屋紧排在手指上。中间的山谷开放。总体计划是以一系列环形占据每一座山，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用经过内部的公路。路边的山坡被挖开，使其错开，以免岩石崩溃，土和碎石从上面的大型施工地落下来。建造这个殖民地是戈尔迪·梅厄森（Golda Meir's）政府 20 世纪 70 年代启动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加强首都”。三十年来，耶路撒冷已经从三十七平方公里的小型城市发展壮大为一个大都市，延伸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但是增加犹太人口和巴勒斯坦人口的比率方面没有成效。过去二十年里，有三十万犹太人因为它的糟糕规划而离开了这个城市，这使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口比例保持稳定。

苏格兰作家威廉·达尔林普（William Dalrymple），把玛里阿杜米贴切地描写为“米尔顿·凯恩斯被放逐到中世纪意大利壁画的风景里”。殖民地永远地摧毁了贫瘠土地和丰饶居民区之间的戏剧化对比，正是这种对比规定了圣城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作为人类文明面对荒野的

最后边区，耶路撒冷的独特性就来源于此。

我们从前一直走的耶路撒冷到杰里科 (Jericho) 的旧路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福音书记载，耶稣曾经走过，在现在的伯大尼 (Bethany) 停留，把死去的拉撒路 (Lazarus) 救活。一排修道院和教堂标出耶稣最后一次的耶路撒冷之旅。在以色列政府用墙把西岸部分和以色列分开并吞并其他地区以前，我们沿着古城墙一直旅行到拉斯艾蒙德 (Ras El Amoud)，穿过东耶路撒冷，清真寺金顶闪烁的古城非常壮观。然后沿狭窄蜿蜒的路段下坡，到杰里科。过了伯大尼和阿布地斯 (Abu Dis)，只有汹涌的大海般的黄色山脉，更像是月球上的环形山，冬末的几个月如果雨水充足才会有薄薄的绿色边缘。西岸的这个中部地区被描写成平原，但实际上它是由一层层水平褶皱带组成，一条地层互相靠拢的裸露山脊，朝反方向下陷。地质时期第二代，褶皱期出现，使巴勒斯坦中部山区提高到海平面以上。南部褶皱不是太严重，山脊单一，虽然面积较大。如果把地形比喻为风暴在海上引起的海啸，北部的浪要大一些，频繁而汹涌，而南部平稳些，海浪间的距离要大一些。我们经过的这些山的褶皱多么像海：波谷巨大的波浪一直绵延到耶路撒冷荒野尽头的马头丘，形成古尔 (Ghor) 谷地高



大的边界隔离墙。

过去，去杰里科的双重托架公路蜿蜒而危险，因为它穿过连接高山上的耶路撒冷古城和杰里科绿洲的荒野，那是地球上最古老最低洼的城镇，低于海平面以下二百五十八米。就在艾坎艾阿玛 [(El Khan El Ahmar) 红可汗] 废墟的后面，也是撒马利亚好人的客栈，我小时候常在那里等着去路边的山洞。父亲不忙的时候，会停下车，我会跑下车，快速爬上小山，向下望。除了开始的几个阶梯被外边的灯照亮，其他都是一片黑暗。我的精神集中在山洞上，后面车辆的声音会在背景中消失。据说这山洞有台阶一直通向杰里科。不过即使是想象，我也不敢超过极限走进可怕缝隙的深处。我会危险地站在湿滑的坡上，完全进入催眠状态，直到父亲不耐烦的叫声打破了寂静，我才匆匆回到车上，以免让他不快。

为了让道路直，没有那么多拐弯，以色列新修建的高速路从山底穿过。我不知道山洞的命运。很可能被以色列推土机用被屠杀的山的碎石填死了。我也怀念像静脉一样流过岩石的彩色地层：棕色、炭黑、紫色、暗红和黄色。山被残杀了，再也看不到岩石地层。颜色似乎已经消退，公路穿过的暴露在外的岩石染上了颜料。

“我从来没有想到很多人谈论的犹太殖民地是这

样。”坐在后座的塞尔玛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我问。

“仅仅为了表明存在的临时房屋，不像这些有花园和树的石头房子。它们看起来永久坚固而且巨大。上面山里的殖民区有多少人口？”

“玛里阿杜米现在一定有两万五千人。”

“几乎和拉马拉一样大。”

“巴解组织等得太久了。谈判应该早就开始了。时间越久情况越复杂。”

“好像巴解组织没有尽力。以色列拒绝和我们协商。”塞尔玛说，她的声音暴露了她对我的自以为是的烦恼。

我的思想再次飘到了总体规划设计上，每当我欣赏风景时常常就会这样。以色列计划 1986 年前在西岸中心地带安置八万以色列犹太人。尽管有巨大的经济动机，只有六千人被说服，在预定日期进住。但是根据奥斯陆协定，巴解组织同意保持相当西岸三分之一的面积，称作 C 地区，不属于巴勒斯坦官方管辖。它这样做没有质疑以色列把这个地区当做公共土地。以色列将此呈现给公众，以表明巴解组织默认，以色列在登记以色列国有土地的同一个土地部门登记的土地，仍归以色列所有。



这促使殖民计划蓬勃发展。一般的以色列市民相信已经和巴解组织达成协议，把 C 地区定为以色列殖民区。他们对投资住宅有安全感，就让家人搬过来了。

我对塞尔玛说了我对协议的看法。

“别这么轻率判断，”她说，“协定可能不完善，但给了我们立足之地。一旦巴解组织来了这里，一切都会改变。等着吧。现在是新时代。”

我第一次有了 1948 年待在以色列的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感觉，1967 年战争后，他们和我们争论的感觉。他们会告诉我们：“你对以色列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们可以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土地开发，部分地区划分会扼死你们的城镇，不公平的征税让你们贫穷。”我们会用谦卑的恩赐态度看着他们，认为他们在以色列统治下生活了那么久，已经被殖民化了，无法超出狭隘的幽闭恐惧症的现实来思考。他们很可能认为以色列就是全世界，我们要自我安慰。不但是他们的土地被殖民了，连他们的头脑也被殖民了。谁想听被征服的人讲话呢？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以色列权威法律语言在西岸的发展。监视着以色列政府如何通过夺取土地并在以色列土地部门登记来扩张到被占领地区。多少地区被划分给以色列区域委员会，并被囊括进以色列。规划是怎

样改变的，一块接一块的土地实际上被以色列吞并，我们的城镇和村庄像岛一样被孤立在以色列扩张范围内，实现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80年代初的诺言，以色列将留下“这个国家全新的地图”。这一切表面上都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的，在西岸有效地使用法律，因为正规来说西岸不属于以色列。明白这一点并与之斗争是我的目标。

我们遇见一辆以色列军队吉普车拦截了一些巴勒斯坦汽车。士兵们在检查文件，一个司机被叫下车站在路边。塞尔玛很吃惊：“难道我们不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吗？以色列军队有什么权利拦截巴勒斯坦车辆？”

我试图解释，按照协定，以色列保有公路的管辖权，然后补充说：“你知道吗，整个为殖民地服务的新公路计划都受到挑战，很多年以色列法庭无法解决这件事。奥斯陆之后，他们快速结了案，以至没有人注意。在我们的土地上为殖民者修建了这么多新公路。即使在我们被禁止使用这些路时，也没有任何人采取合法的反抗。你记得我写的五十号道路规划的领导层备忘录吗？”

“你的备忘录很难翻译。”塞尔玛说。她抱怨说我的句子太长了。

奥斯陆会谈的巴勒斯坦主要谈判代表默哈莫德·阿



巴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认为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华盛顿代表团过于咬文嚼字了。他在奥斯陆和以色列秘密协商，要减掉所有废话，结果签署了众所周知的奥斯陆协定。奥斯陆的巴勒斯坦谈判代表不寻求法律建议。通过监视和挑战以色列战略所获得的有关以色列法律策略的所有经验和知识都因为风格文体问题而遭驳回。启示很简单：唯一被承认的斗争是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区以外进行的斗争。像塞尔玛一样，巴解谈判代表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殖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巴解签订的协议让我们承受以色列的法律和行政安排，它打算不平等地划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土地。

“你真的相信合法挑战可以迫使以色列停止它的新公路系统吗，更不要说殖民区计划了。”塞尔玛问道，她的声音耐心但是显得紧张。

“也许不行，但那样以色列就不能声称自己是合法行为了。”

“这就是关键所在。”

受到鼓励，我继续说：“还有协议强化的所有以色列占领过程中发布的非法军事命令。”

“什么军事命令？占领已经结束了。难道你不能想想现在是新时代了？”

我们继续向杰里科行驶，经过了米次培杰里科（Mitzpe Jericho）新殖民地。征服的气氛显而易见地遍布山地和荒野，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失败——从早期堆积在干燥的粉色山坡形成玛里阿杜米城的殖民居住区到最近以色列在荒野的殖民投机。华盛顿谈判期间，我和我的代表团穿过这个地区，去约旦河上的艾伦比（Allenby）桥的路上，这些殖民区还不存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它们的数量翻了一番。

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得不再次想起总体规划设计。我说：“你知道这个地区的总体规划要求把殖民区扩展到杰里科吗？从耶路撒冷到杰里科的荒地都会被开发居住。”

“这样啊？我们没有得到管辖权吗？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权利废除它。”

“如果你认为它这么好骗，那么你是没有读过协议，不了解以色列。”

“为什么这样担心殖民区？”塞尔玛问。“我们也要发展。会有资金注入，我们将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等着瞧吧。”

“以色列仍然控制大部分土地，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要在现有的一切上工作。在殖民区购买房



屋，让一切发展起来。记住现在是新时代了。”

我开始厌烦了她的“新时代”颂歌。我们继续下坡到最低点，她的话塞满了我的耳朵，在我脑海里回响。真的是新时代了，我自言自语，望着窗外密集的新殖民区，它们占据了曾经空荡的山地。

看着固定在岩石上的蓝色瓦片标明的深度，我们继续下坡。第一个写着海拔二百米。开着开着，我的思绪又飘走了。塞尔玛没有意识到巴勒斯坦法律案件被奥斯陆协议摧毁的程度，还有它对我们未来意味着什么。下一块瓦片上写着“海平面”。我瞄了一眼，这时我们到了路的转弯处，群山分开，死海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几十年来，一个贝督因人（Bedouin）站在这里，骆驼装饰着五彩缤纷的鞍子，等着让游客骑着征服曾经的蛮荒，飞速变化的宇宙中的一幅静态画面。塞尔玛兴奋地把他指给我看，声音里充满骄傲，仿佛她有了一个新发现。也许她把他看做巴勒斯坦坚定的象征，证明我们仍然是这些可爱的山的主宰。一个人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地在如此沉闷的时期表示骄傲？难道她真的没有意识到她回到的巴勒斯坦还没有解放？怎么她不明白这一点呢？

到达死海，我们现在是在海平面以下四百零五米，地球上最低点。不能再向下走了。

小时候我曾经望着西岸和以色列难以捉摸的分界线。城镇在这里，那边是山，被占领的迦法在地平线上。中间什么也没有。没有路，没有开发，没有建筑。没有想到要搭设电线和水管，要在这么边远的地方建立殖民区。当时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没有技术和经济来源实施这样的工程。我没见有人做过，也从没见过推土机。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需要以色列官方批准才能拥有一台推土机。以色列开始建立殖民区时，开山修路，铲平山顶，给边远地区接通水电，我满心敬畏，还有恐惧。

我无法跟上我成长的乡间如此迅速的变化。有来自美国的大量资金，以色列是能够让沙漠发展成充满混凝土建筑和霓虹灯的城市的。我可爱祖国的大片地区被筑起围栏，不允许我们进入。我感到形势的严峻，愿意竭尽全力去斗争制止它。法律就是我的武器。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我相信如果我们努力，就一定会成功，正义会得到伸张。为了解放到来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我愿意牺牲一切。

现在，奥斯陆协议签署了，在我看来斗争已被出卖，我回到现实。随着现实再次进入我的生命，我死去父亲责备的声音也回来了。他还在生我的气，对我的生活失望，问着令人悲伤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生



命？为什么如此烦乱、失常，而不是养家？我知道答案：我小时候就对将来要有孩子充满恐惧。我无怨无悔。我婚姻美满。但是 I 太软弱，不能阻止他的怒吼。他在我脑海里继续说：你的斗争获得了什么？它把你带到哪里？我预言未来时你从来不听我说。

我们到了海角，正好在瞭望清澈蔚蓝大海的基伯昆兰（Khirbet Qumran），我前面的这个坚硬岩石间的裂缝并不总是存在的。这里曾经是非洲、佛罗里达、南美、南极洲、澳大利亚、印度、西藏、阿拉伯、伊朗和叫做冈瓦纳（Gondwana）的南欧组成的“超级大陆”的一部分。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区的坚硬岩石被挤压隆起，张力使它们粉碎，形成从北叙利亚延伸到东非的裂谷，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

以色列旅游部门用绳子和布告描绘出艾赛尼派教徒（神秘主义宗派）公元前两百年居住过的遗址，指出这个背教社会是如何幸存下来的。信徒们在哪里集会、用餐和写东西，还有他们获取和储藏水及耕作的方法。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脱离统治阶级的权力，在死海边的艰苦条件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居住区，根据自己的法律和惯例生活，并写下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在一世纪罗马人摧毁他们的社区前，他们把文本藏在山洞深

处的罐子里，直到一个巴勒斯坦牧羊人进洞寻找走失的山羊时发现了陶罐里面完好无缺的卷轴。

现在的犹太殖民者和艾赛尼派教徒不同，好像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背教者，打破统治权力，追随自己的信仰和对《圣经》的解释。当你在街角看到他们留着浓密的胡子，长发上是编织的圆顶小帽，流苏在棕色衬衫和满是灰尘的凉鞋下飘动，你感觉他们是多么不合时宜，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不过不像他们的前辈，这些现代反叛者靠国家补助金生活。他们被这个地区最强的军队保护着，不必工作来谋生。反而用他们的时间在有战略性地位的犹太宗教学校研究经文，利用宗教研究为借口把服务于政治目的的犹太殖民扭曲变形。他们的英雄主义归于他们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折磨：试图把妇女、男人和孩子从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现在的殖民者给后世子孙留下的不过是摧毁了他们声称热爱的土地的丑陋建筑，和可恶的殖民实践的遗产，世界会谴责他们尽力拖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的和平关系的建立。

我转身望着我所站立的悬崖下面清澈透明的大海。忍不住回想这是世界濒临消失的奇迹之一。多年来，它以惊人的速度在缩小。一万五千年前，它的表面至少比



现在高两百米，意思是说，站在这个海角靠近库姆兰会社（旧时在死海西岸的一个犹太教教团）废墟，大海会拍打在我的脚上，而不是现在这样几乎一公里远。甚至在20世纪初，死海也比现在高出十二米。最近水位下降每年大约一米，因为以色列分隔了约旦河和流进它的支流，工厂使用以色列和约旦的海水。我们的珍贵土地在我们的脚下溜走，就像死海从它含盐的海滨后退。被标榜为“勇敢者的和平”的协议，就像阿拉法特喜欢用他独特的英语一遍遍重复的那样，只不过是投降文件，是对更美好未来的虚伪诺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站在这里望着濒危大海时，我的记忆又回来了。我父亲很多年前告诉过我，他1948年被迫离开迦法后，还要继续支付那里公寓的租金。尽管他无法回家，要节省钱在拉马拉生活，在迦法也已经没有自己的房子了，租金还是要按期支付。他就是这样的人，非常尽责，又过于诚实。我逐渐开始明白，灾难（巴勒斯坦人将1948年失去巴勒斯坦描述为一场“灾难”）降临时他年龄有多大，他失去了为之努力的一切：律师事务所、婚后的家，还有在迦法投资购买的土地。据我推算，他当时四十出头，就想我现在一样。

短短的二十年时间，我父亲要应付不是一次而是两

次大灾难。迦法之后，他在拉马拉重新安了家，设了办公室，当时拉马拉已经被以色列占领。1967年后的几年间，他都很少工作。再度失去一切的悲伤甚至让他企图自杀。他用散弹猎枪抵住太阳穴要扣动扳机。

关键时刻我母亲阻止了他，几天后他又恢复了信心。从失望转向极度活跃，他开始呼吁政治现实主义，呼吁人们认可所有被占领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居民区并存。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殖民区建立之前，在以色列宗教权利兴起和政治授权前，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他的提议得到关注，那会减少多少痛苦和灾难啊。

过去无法改变，但是我知道我要向现实让步。事实是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了。以色列政策暂时胜利了。很多年我致力于法律和人权的某个领域，结果什么也没有实现。父亲两次失去工作。我只失去一次。在人权领域工作多年，我达到了我事业的高峰。现在新的政治发展让我变得多余，无法利用我的法律知识和经验阻止以色列违反法律。

我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事物上。死海的西坡由带小粒鹅卵石的石灰岩组成，使得通往库姆兰公社山洞的路非常艰难。我独自慢慢走着，看见佩妮和塞尔玛



冲向前面。我继续回想父亲的事。他一生大多时间都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他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他写作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外边的巴勒斯坦领导阶层并不重视。他们把他当做政治对手。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把牌留在国外领导手里。政治私利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以色列对被占领区内外的巴勒斯坦人发动的灭绝战争。在生命的晚年父亲变得愤怒、绝望而痛苦。他常对我说：“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终于认识到的一切。”我尽量不受他致命的悲观影响。但是奥斯陆时期一开始，情况明显变得像他预言的那样，他训诫的声音回来复仇了。

上到半山腰我开始晕高，不得不坐下来。不能再继续走了。我好像在不断下滑。我双手放在地面紧紧抓住，不然我可能轻易地从陡峭山旁深深的河道一路滚落到深渊里去，没有办法阻止。手在地上锚定，我转头望着无法抵达的山洞，我可以看见岩石中黑暗的裂口。多想站在山洞前向里面望望，就像小时候和父亲去杰里科在旧公路边看山洞那样。但是一坐下，就很难站起来继续爬山。我担心滑倒，几乎呆住了。

离我坐的地方不远，一只黑鹰低低盘旋。它一圈又一圈，近得似乎令人晕眩。一个影子开始从我坐的地方

滑过山边：一块厚厚的云遮住太阳。我感觉我抓定的地面向在倾斜。

缓慢而小心地，我尽量贴着地面向下走，几乎是在爬。一下到底，我就站起来，等佩妮和塞尔玛，她们两人好像并不着急。我也不介意等待。我喜欢站在平地上的安全感。大海展现在眼前，完美的蓝色，熠熠发亮。通常海水中的固体物含量在百分之四到六。死海封闭的水域含百分之二十四的固体。太阳猛烈地照在我身上，我想象着投入像蓝天一样清澈的海水。但是我不会这么做。这里不适合跳水。水的味道令人恶心，感觉油腻，它在皮肤表面晾干会留下一层盐。一滴水接触到眼睛都会痒得难以忍受，如果进入肺部，就会导致死亡。尽管这样，没有比它更蓝更吸引人的湖了。马克·吐温 19 世纪参观这个地区时怎么会忽略它的奇异美景？

论到大地上景色的阴沉凄凉，我想巴勒斯坦当属其中之最。山地荒凉，色彩灰暗，形态毫不生动。山谷是难看的沙漠，边缘有衰弱的蔬菜，样子悲哀沮丧。死海和加里里海睡在宽阔的山地和平原之间，放眼望去没有一点舒适宜人的色彩，没有鲜明的形象，没有温柔的图画，没有紫色的雾霭或云



朵影子下的斑斓。所有的轮廓都很粗糙，没有鲜明的特点，没有层次——距离没有产生迷惑的美感。这是毫无希望、沉闷而令人心碎的国度。

(《弱智出国记》)

中午的太阳把南面的山照射成半透明的天蓝色驼峰，卷曲的山脊映衬着天空。下午的阳光照亮靠近我的山峰背面，它与更南边的山峰重叠，它们的边缘由一条暗色的轮廓线标出。远山的颜色和质地与近山的泥土绝壁和荒凉灌木完全不同。

高空，朦胧的正午的月亮看起来短暂而脆弱，就像一片云一样。它让我想起在以色列占领之前，我们一家人在海边度过的那些夜晚。喜爱音乐的乔治一家，是最早来自海法 (Haifa) 的巴勒斯坦人，1948 年他们被迫离开台比留 (Tiberius) 的家，现居拉马拉。在死海度过满月之夜是再美妙不过的了。通常乔治家的女儿弹奏手风琴，不过这种乐器太刺耳，不适合浪漫的月夜，所以他们带了吉他，弹些轻柔的曲子。我记得一天晚上，月亮是明亮的银色。微微泛起涟漪的海甚至让我父亲那样急躁的人都安静下来。我们租了条船，在黑暗中划过油腻的水面，经过月光照亮的小路。

我们度过那难忘夜晚的地方离丽都旅馆不远，可是现在却距离水边有很远的路了，成了被抛弃的悲惨之地。海水后退了，留下含盐的石头散落在粗糙的沙滩上。蒸发是不会停止的：每二十四小时就有二十五毫米水从这个小型海的表面蒸发，剩下更大的盐块。但是，这不是造成高盐度的原因，也不能单以约旦河流入湖水时带来了盐去解释。这些盐不是约旦本地的，而是早期河水冲刷运动再活化出来的。

约旦这一边的死海，海岸陡峭，形成阶梯，离海滨三千英尺高，沙石上覆盖着石灰岩。上游高原下来的溪流和冬天凶猛的雨水冲刷出深深的犁沟。阳光照在石壁上，把它变成耀眼的玫瑰色。我望着，想起华盛顿谈判暂停期间，佩妮和我在海南端的佩特拉（Petra）的纳巴泰（Nabatean）城进行的那次漫步。那座玫瑰色古城里有美妙的散步场所。在他们叫做西可（Sik）的荒凉溪谷里走了一个小时，溪谷两边都是颜色各异的岩石，色调随着阳光照射的角度而变幻，我们来到了帝国的建筑——财政部，由岩石上刻出的带装饰的廊柱组成。只是正面就如此令人敬畏了，我甚至想对它高耸的美丽鞠躬。在空旷的沙漠里走了几个星期之后，古代的旅行者一定会在这精致的艺术品前五体投地。整个佩特拉都布



满了石雕，似乎没有什么实际功能，除了让人难忘和敬畏。完全不像以色列殖民区及其复杂的公路、桥梁和隧道网络，好像是用来戏弄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不过它们不只有建筑正面。

很多年我努力坚持我的希望，相信殖民不会长久。我小心翼翼地证明它们建立的非法过程，每一个步骤和细节。我感觉只要我明白，只要这发生的一切不再神秘，法律骗局就会被揭穿，我不能迷惑、被打败，以色列也不能这样逍遙法外。知识就是力量。我一直跟踪以色列法律策略，把它们公布于众。我曾经觉得我的生命是正在进行的故事，是和巴勒斯坦人民摆脱占领和束缚朝着解放和自由前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大大的错觉。除了在我的思想里，我的知识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只是我自己感觉我是集体斗争的一部分，用主张和坚信苦难有更高的意义来忍受困苦——苦难不是徒劳的，不是没有目的。只要我更好地理解造成这种种悲惨的远大计划，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我不仅仅是受害者。我是解释者，是挑战者，和其他人一起团结奋战。

但是奥斯陆协议埋葬了我的真理。唯一被认可的抵抗是巴解的武装斗争。普遍接受的主张是军事斗争才能

给我们带来和平。多年反对以色列的法律斗争没有得到领导阶层的承认。我发现，他们有权力随意否认。当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最后决裂的感觉，多年来我称之为我的故事的终止。我幻想的计划如泡影般破灭了。

更糟糕的是，世界各地的祝福者们在祝贺我，相信随着奥斯陆协议的签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播放过无数次的阿拉法特和拉宾著名的握手，“善终于得见天日”，1982年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希望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关于西岸生活的书，《第三条道路》。

这一切令我多么困惑！我发现自己是多么孤单，站在这海角，远望死海，沉思恐怖的未来，我原来以为我和他人共有的，这么多年来带给我生命意义的斗争故事的结束。当我望着退却的海水，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汹涌。生态学的灾难在这里隐隐若现。海平面下降，地下淡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分，在沿岸造成上百个灰岩坑。有些坑有半米宽，超过二十米深。不能再在这里行走了，随时有落入盐沙的危险。海的北面，每天有差不多两百个灰岩坑出现，让整个地区笼罩上不安的气氛。

我的沉思冥想被塞尔玛的移动电话打断。是她先生的，告诉她好消息，他拿到了许可，明天就能通过约旦



过桥了。她兴奋得直跳，叫个不停，不假思索地决定缩短旅程，乘的士回家把房屋准备好。佩妮和我继续沿海边向南，回到我们主要目的地的开始，漫步德拉齐溪谷。

佩妮开车，我就可以望出左边的窗外，看着静静的海水，被阳光变成闪耀的铂金，右边仿佛是不可穿越的防线，巨大的高速公路通向另一个世界。

但是斑驳的泥岩和泥灰表面实际上是很脆弱的，薄弱得好像是随时会坍塌、碎裂，陷到下层的盐海里。裂谷的这一侧有粗糙的白砂岩地层穿过淤泥的泥岩形成条纹。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城堡形构造，形状像尖塔和塔楼，柱廊和成堆的泥沙与鹅卵石，被饱和的盐风吹刮雕刻，又被上游高原泻下的水磨平。

我们离开死海的主公路，开上一条蜿蜒小路，来到以色列导游册上标出的路段。停了车，开始在黑色斑斑的小径步行。虽然我们在高处，路又窄，但是标志清晰，规划合理，很容易走。在斜坡的路上，山谷风景格外壮观。十五分钟就到达了溪谷中较宽的部分。阳光强烈，不过有微风吹拂，舒适宜人。我们躺在岩石上休息一小会儿。再次上路之前，我想看看山谷边的一个狭长裂缝里有什么，就前去刺探。我看见一群年轻的以色列

人，在岩石旁围坐成半圆，听老师讲这个峡谷和它的不同特点。他们在接受军前训练，艰苦跋涉，了解不同地方的历史、地理和军事意义。两个持枪士兵分别站在队伍前后两端守护着。靠近裂缝的一个士兵怀疑地看着我。我离开时他跟着我，以确定我不会惹麻烦，不会伤害他保护的那群人。

回到佩妮那儿，我们一起上坡。洪水猛烈时狭窄的入口水流湍急，站在前面的人一定会被冲走，没有机会幸存。从岩壁上的绿锈可以看到上次洪水达到的高度。

我们慢慢走着，最终那群年轻人超过了我们。我们让开路给他们先过。他们开始爬上一大块岩石，非常高，要用绳子才行。最后一个年轻人上去后，一个士兵闪到一旁让我们过去。佩妮走在前面。她很敏捷，用绳子缠在脚上，把自己拉上去。轮到我时，我想我也可以做到。我用脚踏拉绳子，试图模仿佩妮看来那么轻松的动作。结果却发现自己无法离开地面。我尝试了其他办法，都不行。我开始后悔没有受过童子军训训练来掌握这些技术。如果不是一个士兵推了我一下，让我飞上了那可怕的岩石，我也许仍然困在地上，敬畏地看着岩石。我只能感激他。没有他，我们就不能继续我们的漫步了。在这短暂的相遇中，我们俩都没有说一句话。我想



他会认为我是什么人呢，当然不是巴勒斯坦人。

我们继续走。现在山谷显得很深，很难走，在一个地方，我们要经过突出的悬崖和岩石间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窄得根本过不去。佩妮先过，她很顺利就通过了，但是我又不行了。没有别的路。佩妮解释说很容易的，不过她理解眩晕是不会给你讲道理的。她温柔地哄骗我，试图让我觉得那真的不困难。她知道我需要时间，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坐下来，知道不可能退回去，就思考如何完成这个任务。路太长了，我们会困在黑暗的山谷里，没有人帮忙我再也不能用绳子从那块高大的岩石上下去。我慢慢靠近狭窄的弯道，想着如果我摔倒会怎样。我想一定活不了。如果腿支撑不住又怎么办？或者是它们动不了呢？我会被卡在中间，为了活命就得抱住那块突出的岩石。我渴望有绳子绑住我的腰，但是我们没有带这些设备。我们自认为是漫步者，不是攀岩者。也许这次我们选错了路线。

我站在悬崖上，俯视峡谷，开始烦恼。我不断伸长脖子看那个转弯，每次都只看到突出的岩石。我想象一旦到了中间，会被推下去。或者我是担心我会跳下去？我自信不会把自己投进死亡之谷吗，那里充满尖利的岩石，绝对没有幸存的可能。

我还站着，孤独无助地掂量着这个挑战，怀疑自己迎接它的能力。漫长的三十分钟过去了，佩妮在另一边等待着，耐心，宽容。最后我强迫自己行动。紧贴着岩石，慢慢地挪动着脚，尽量什么也不去想，只觉得心脏在剧烈跳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只是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最后发现自己已到了另一边。佩妮几乎就要生气了，不过还是祝贺我的勇敢。

其余的路是上坡，没有什么难走的路段了。我们走着，我这才放松下来，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承认，客观来说那并不是特别难的拐弯。上面的岩石确实突出在小路上，可是路有半米宽，旁边也没有恐怖的悬崖。溪谷的这部分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深。佩妮毫不费力就通过了，就像那些以色列年轻人军前训练一样。我很快意识到，令我恐惧这个拐弯的是我内心的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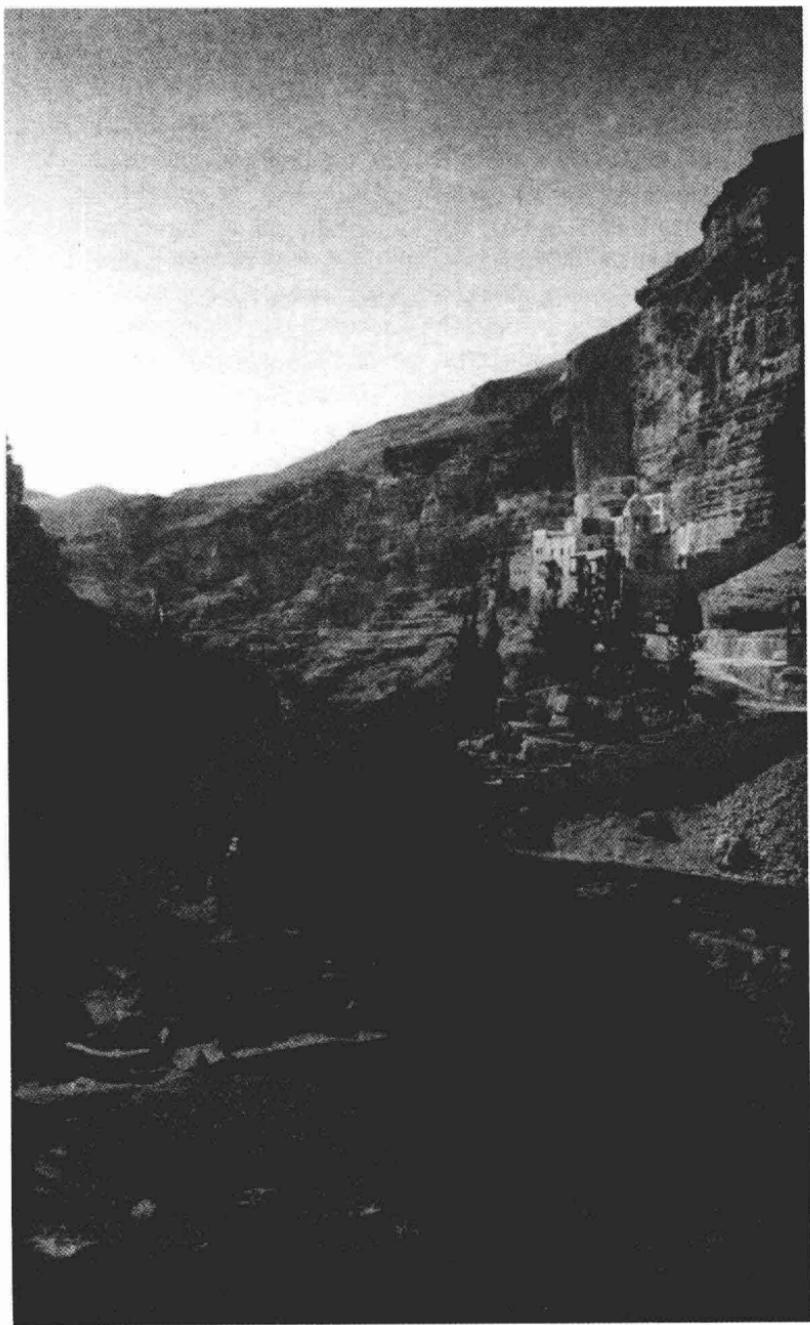
这些情绪不难整理清楚。首先是渴望有父亲或兄长保护我，这种渴望古老而持续。如果我跌落，会有人接住我。

其次，我将此解释为我对生命的把握曾经被动摇过。过去我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生活。使我生存并赋予其高度目标感的是我反抗占领、伸张正义的工作。我感觉



受到召唤，要去拯救什么，去说出事实真相，发出警告，实施抵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现在我的斗争结束了。结果我失去了不能让自己屈服于死亡的信心。这些年来经历的失败和失望让我对生命放松了掌握，几乎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到达了悬崖尽头，开始走在平地上，去拿我们的车，这时我看见过以色列人的车开过来接那群年轻人。他们经过我向自己的车走去时，我看见过他们的脸，因为自信和愉快而焕发着红光。他们彼此说俄语。他们一定是新移民的孩子，来到以色列，要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区居住。他们的样子和行为似乎表明这个世界属于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战争胜利的新生活。我们的生活则是失败的苦果。在他们中间我认出在关键时刻推我上岩石的那个士兵，等所有的孩子上了车，他便使劲地关上了车门。



纤特溪谷中的柯兹巴圣乔治修道院（2007）

漫步 4

沙漠中的修道院

纤特溪谷到杰里科

到 1990 年代末，未来仿佛正朝一个更加血腥的时代发展。以色列殖民区和道路修建的速度加快，西岸部分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实行封锁，殖民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发生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对平民的残酷屠杀，这一切都是前奏。当双方都带着有限的希望观望对方，上一次抵抗运动的短暂间歇和奥斯陆协议最初发展期中普遍的许诺很快就成为过去，随之而去的还有在毗邻纤特溪的优美的艾恩法拉（A 'yn Faraa）溪谷漫步的自由。重要的是有机会的时候不能犹豫，而是要大胆地去走走。虽然纤特溪谷上游的大部分，包括法拉泉，已经对巴勒斯坦人关闭，其下游还可以通行。

佩妮和我同几个朋友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有利玛（Rema），同样喜爱散步的萨巴（Saba），他的医生哥



哥，他也是医生的俄罗斯嫂子玛丽亚，我们打算把车留在拉马拉，乘公交车去杰里科，在耶路撒冷到杰里科的半路下车，然后从那里开始漫步，经过古老的建筑，曾经是为杰里科至耶路撒冷古道上的旅行者服务的客栈。但是以色列官方又在对拉马拉进行经常性的包围，第一个障碍是要设法从卡兰迪亚（Kalandia）检查站出去，它把拉马拉和耶路撒冷分开了。

把守岗哨的是一个戴圆眼镜的中年士兵，面带微笑。他太老了，不可能是一般的士兵，很可能是预备役军人，他在一个满是灰尘的小房间检查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证件。他先要医生（因为他带了医疗身份卡）证明他旁边的俄罗斯妇女（她忘记带自己的证件）是他妻子。然后他决定不能让她通过。

“但是为什么？”她反驳道，“我是医生，你们允许医生通过的啊。”

“如果我拒绝让你过，那就是人道主义问题，如果我让你通过，我可能是谋杀同案犯。”士兵用他口音很重的英语声称，看起来对自己很满意，以为自己口才不错。接着他好像有了另一个主意，开始验证我朋友的医学知识：

“你能告诉我胸骨在哪里吗？”

俄罗斯医生斜视着他，显然很为难。她白皙的皮肤变成了粉色，长形脸拉得更长了，眼睛茫然若失地望着她丈夫，努力想听懂士兵的英语。

“我不明白。”她用俄语对丈夫说。她英语不好。

他转向士兵，回答了他的问题。

“我知道你是医生。我要她回答。”

他又大声抛出另一个问题：“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 Barr virus）引发什么疾病？”玛丽亚又迷惑了，丈夫试图帮她回答。

这种口头检查进行时，一大队人在耐心、沉默地等候。我们其余的人也在边界线等着，我们太震惊或者太入迷了，居然忘记了干预。检查让玛丽亚更加尴尬了，几乎要哭起来。她绝望地破译着这个中年以色列人奇怪的英语问题。这时，圆脸士兵旁边一个中东人长相的士兵命令我们都到他那边去。“什么事？”他责难地问，好像耽搁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在去杰里科散步的路上，但是他的同事决意要检验我们医生朋友的医学知识。他转头神气十足地看了他的同事一眼。他要求我们出示全部身份证件。然后他把它们抓成一捆，递给我们，让我们过了，先前那个士兵没有完成唯一的医学检查，还颇有不满。



过了检查站，我愤怒而不安。不是对士兵而是对我自己。我，一个律师，一个多年的人权活动家，却沉默地旁观，让这出闹剧上演。我比任何其他沉默地站在那儿的人更应该说话。是什么让我这么被动，而不努力制止士兵侮辱我的朋友？我对另一个士兵解救了我们还充满感激，几乎要感谢他。而其他人呢？一群巴勒斯坦乌合之众站在旁边，看一个士兵伤害一位可敬的女士，以此为乐。我们对失败已经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吗？如果这是发生在奥斯陆协议前，我会对那个士兵大叫，要求见他的上级，说清楚他在越权，而且我一定会制止对我朋友的折磨。但是我们都懦弱地站在那儿，连一点儿抗议的声音都不敢发出，反而因为被允许通过而心怀感激。也许到了我离开的时候了。

我的校友维克多是我在同辈中第一个判断他在新的政权下不会有活路的人。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用来建电脑公司了。在最紧张的时局下，在以色列占领和第一次抵抗运动的管制和阻碍下，他期待着和平。他有远大的计划扩展生意地域，并且有天分很高的年轻人协助他工作。一天他和其他公司股东被叫去开会，巴勒斯坦一个什么部门需要电脑软件。他们要投标。他和员工日夜工作，拿出最优惠的条件，但是没有赢得投标。项目被部

长的一个亲戚拿去了。这对维克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这笔大生意抱有很大希望。接着他又经历了破产和不公平竞争的打击。他把软件卖给另一个部门，却没有拿到钱。他很担心在新政权下怎么能活下去。

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告诉妻子，该收拾行李走了。他们申请移民澳洲。他们都是电脑专家，有钱做投资。他们的申请毫不费力就获得了批准。他们有头脑，有资源和技术。我去他们的新国家看望过他们，发现他们不必费事读报了解这里的时事，他们完全脱离了这里。而这些人曾经对发展新巴勒斯坦充满了设想。他们经历了第一次抵抗运动的艰难困苦。他们有宏大的外购电脑软件的设想，这些软件与帮助爱尔兰及印度复兴经济的软件相似。所有这些设想都因为巴勒斯坦官员的目光短浅、利欲熏心、想要快速谋利而夭折。我去澳洲拜访他们时，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遗憾。是不是我也该离开了？还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信仰已经终结了？

我们让的士在耶 - 杰 (Jerusalem Jericho) 公路上放下我们，然后艰难地走下法拉和纤特两条泉水之间光秃的主山路。我们准备先向上，朝纤特谷上游的法拉泉走，然后再折回到下游，参观圣乔治修道院，接着去杰里科。



纤特谷是二十五公里长的溪谷，水量多过巴勒斯坦大多可通行的溪谷。溪流在冬天最为湍急，源于艾恩法沃 (A 'yn Fawwar)，注入约旦河。当希律王在杰里科的冬宫需要水时，他建造了第一道沟渠，从艾恩法沃通到纤特谷。约旦统治时期，沿同一路线修建了一条新水渠。因为供水充足，朝圣者和将来的统治者都将山谷当做去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甚至更远的巴格达的路线。

纤特谷漫步最好是从艾恩法沃开始，壮观的峡谷从东耶路撒冷山脉一直下到杰里科。上次有机会走这条路线是在 1993 年。当时我和佩妮还可以开车穿过环绕耶路撒冷的群山，一直开到阿蒙的犹太人殖民区，它依泉而建，离拉 - 杰公路上的巴勒斯坦人的西斯玛村不远，耶路撒冷东北八公里处。我们把车停在殖民区，锁好，不必担心遭到枪击，从上纤特谷出发开始漫步。的确，一个自然的标示仍然指向殖民区停车场——但是现在不允许巴勒斯坦人接近设有路障的入口。沿这条路穿过溪谷，高度一路下降，从六百四十米降到圣乔治修道院所在的海平面下一百米，最终是海平面下二百五十八米的杰里科。途中经过三个生态系统。因为来自法拉、法沃和纤特三处的泉水不断流淌，使这个山谷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包括狐狸、蹄兔、蜥蜴、箭猪和大量鸟

类，如苍鹭、猎鹰、翠鸟、鹰和大乌鸦。溪流中生活着青蛙、螃蟹和鱼。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路。一到峡谷里，我们就去参观被称作耶路撒冷荒野第一修道院的遗迹，系三世纪的隐士圣查里敦（St Chariton）创立。公元275年查里敦从耶路撒冷朝圣途中被强盗绑架到法拉谷的山洞里。传说强盗喝了一条蛇放了毒的酒而死。绑匪神秘死亡，查里敦决定留在洞中做隐士，后来就被埋在附近。短暂参观了废墟，我们沿一条旧路去英国托管的加油站，周围都是桉树。这里是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纪建造的水渠的开端，将水输送到下一个泉艾恩法沃，再从那里到艾恩纤特，继续流到杰里科郊区。

蜿蜒的山路很快把我们带到巨大的艾恩法拉泉。在沙漠中，周围地区的干旱和法拉谷的草木青葱形成鲜明的对照，提醒人们水能改变事物的强大力量。冬末春初是此地最繁盛的时期。到春季野花就开始凋谢，比拉马拉山里要早得多，因为那里纬度高出很多。

在这峡谷里行走，我们感觉仿佛在大而深的盆地里，两侧是高耸的岩石。1993年的那个冬天，水漫过山谷，某些地方都深到可以游泳了。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决定不要跳进去。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没提，但都记得几



个月前，一个犹太殖民者在同一地点被贝督因男孩谋杀的事。佩妮的浅色头发，白皙皮肤，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殖民者。

我们刚刚绕过岩石到达溪谷的最深处，就看见一只大苍鹭在捕鱼。它听见我们的动静就慢慢拍动宽大笨重的翅膀，不情愿地飞走了。它停在高处的一块岩石上，等我们离开，它可以继续享用它的食物。我很抱歉，它觉得因为我们而需要飞走。这里唯一靠近的海是死海，很难看见鸟类在这些干燥的山里捕鱼。我抬头望着它，看见它栖落的岩石上方，有几个贝督因牧羊人在照看他们的羊群。他们也在观察我们。我对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那是一次紧张时期的危险漫步。

的士把我们带到靠近纤特谷的地方，我们差不多是向山跑去，山像棕色的织锦。我们感到欣快异常。被封闭在每个出口都有检查站的拉马拉，一旦得以享受开阔的空间，没有围墙，没有障碍，高远的天空，这快乐让我们眩晕。我们继续爬上一座山丘，来到一个海角，在那里可以看见峡谷在脚下伸展，然后我们开始下山。

这次漫步的头领是萨巴，他笨重而不修边幅，衬衣掉出，裤腿儿扫着地。占领初期，他还是个少年，以色

列官方把他父亲流放到约旦，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父亲不在，萨巴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憎恨被迫做弟弟家长这个负担。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会感觉到失去青春的痛苦。对朋友们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忠实的一个人。高中毕业后他离开了拉马拉，加入南黎巴嫩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后来在以色列监狱待过。但他还是坚持在开罗和巴黎学习历史专业。在学术论文里，他表现出和在生活中同样的勇敢，大胆写他人回避的话题，比如无正式文件的通敌和以色列屠杀等等。他对主要巴解派系斗争，抵抗运动及其领导亚瑟·阿拉法特的看法是修正主义的。虽然在学术上有很大飞跃，但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严重缺乏父爱和保护给他留下了创伤，无能和被轻视的感觉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一边走一边观察萨巴是怎样接近山的。我知道他是多么喜爱在这里漫步，在自然中可以找到他自己。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他总是不走容易被人发现的路。他重重地走下层层阶梯，让石块滚落，自己开辟新路。有潜在危险时，他从不退缩。如果我们看见一群野狗，就会想要改变方向，但是他不会。他径直走过去，把它们赶走。

不过，也许我们俩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对第二次抵抗



运动的反应上。抵抗开始后好几个月，我拒绝承认发生的事情，继续希望它不存在。而他却立即认识到这会导致我们被以色列集体驱逐。成年累月他都生活在对第二次屠杀的恐惧中。显然他的历史知识和个人经历让他身心疲惫了。

去山谷的路非常陡峭。萨巴领我们走的正应该是这样的路，现在没有清晰可辨的路径了。我们只能攀缘而下。满是水的山谷有成片芳香的芦苇生长。我们担心有水蛇，避免在水里走。最终我们发现了峡谷南边的小路，沿着它走向艾恩法拉。我们决定尽量走得远一些，除非要回避来自阿蒙殖民区的武装守卫。

这一段山谷又深又窄。巨大的石头墙蜿蜒扭曲，形成小的盆地。我们沿着窄路而行，在岩石间转来转去，寻找可以下脚的地方，这里的岩石和艾尔达拉（El Daraj）溪谷一样陡峭而不友好，直到我们到达宽敞一点儿的部分，两边有高高的岩石遮蔽。下面是茂密的水草和荷兰薄荷。上游峡谷陡然转弯，将这个死角后面的山谷完全隐藏起来。我想这可能是我和佩妮从法拉溪方向接近山谷时停留过的地点。我们在一棵大的长豆角树下野餐。我们所在的下面水流湍急。

接着我们听到了声音。抬头看去，对面的小溪悬崖

下，一群殖民者走过来。我们以为是阿蒙的人来查看住处附近“他们的”泉水了。他们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了侵犯土地者，应该很危险，不过看我们坐在这里喝咖啡吃色拉的样子，不像执行军事任务的人。那群人中一个女孩走近来问利玛：“你们从哪里来？”利玛的回答直接又正确，她简单地说：“这里。”

殖民者妇女穿长裙，戴头巾。他们继续在对面陡峭岩石间狭窄的小路上走，而我们则坚守我们长豆角树下的地盘，尽量不看他们。双方不安地分享野餐地点，各自都继续假装若无其事地观望。野餐完毕，我们决定不去那死角后面冒险了。时局紧张，最好别碰运气。我们收拾好东西，朝东面的圣乔治修道院和杰里科进发。

离开时我向上望了望，看见在我们坐过的石壁下方，一个年轻妇女穿着传统的长裙，戴着头巾，虔诚地站着。她面朝西方，一副平静虔诚的表情，正在祈祷。我看不出她是以色列犹太人，还是刚进住的移民。在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探险中，我从没有看见任何人祈祷，虽然我经常把在自然中漫步当做一种冥思的方式。一幅奇怪而令人欣喜的景象：这里有人对我的国家充满感激，所以想到要向她的真主表示感谢。但是我忍不住怀疑她的动机。她在恳求什么呢，是在感谢上帝创造的辉



煌，还是在支持以色列军队统治和占领我的国土，让她可以在阿蒙定居，依傍着如此壮观的泉水？圣经之地的宗教活动鼓励的是排外和歧视，而不是博爱和宽容。没有什么地方比圣地更令人对宗教抱有愤世嫉俗的态度。

离开殖民者，我们沿曲折的岩间小路到了法沃泉。阿拉伯语意思是“起泡的潺潺流水”，因为泉水有规律地喷涌和停止，像喷泉一样。

远离水声，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段，我注意到人类学者利玛在专注地望着地平线。我问她是不是看有没有殖民者。她说不是。她在想念在这个地区漫步经常遇见并交谈的贝督因人。她很了解他们在峡谷里的生活，多年来都在这里牧羊。现在却被以色列官方赶走了。“好像生命被从这些山里掘走了。”她说。来这个地区的旅行者大部分都写到被丰饶山谷周围的荒山震惊的感受，还有贝督因牧羊人徜徉在山间的景象。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离开的贝督因人以及他们对土地的不同感受。他们把土地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夏天在凉爽的高地上搭设帐篷，冬天下到哥尔（Ghor）为避免新生山羊和绵羊死于寒冷。在土地管理这么混乱的国家，他们也不必麻烦去登记了。如果他们没有想到土地是可分割的，他们怎么会想到把某一块地登记在自己的

名下呢？

我们所走的岩石的确特别光秃，下面的水起初在山谷里的漂石上喷涌，到达下一座山泉纤特泉前就渐渐干涸了，然后水势又重新变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泉水流入峡谷对面的灌溉渠里。此处山谷变宽了。走了没多久，我们上了一条土路，是杰 - 耶公路的岔路，早些时候形势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常常开车过来，然后停车，走到圣乔治修道院，再返回。那里有一个面粉场和几座废弃的房子，是胡塞尼家族的。家族中有一个人用阿拉伯语写了献词，记录了把水送到杰里科郊区的老水渠的修复，以及大坝和面粉场的建筑过程。

离这个地区不远是漂亮的朝圣者客栈，根据穆斯林传说，先知摩西就埋葬于此。穆斯林信托公司新近重建了客栈。1948 年前，每年复活节前后，都会有大批的人从巴勒斯坦各地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三天三夜的最盛大的巴勒斯坦历节日。那些参加庆典的人睡在客栈里，或在周围山里搭建帐篷。为了给这么多人提供食物，面粉场供应烤面包的面粉。它也一定为修道院和附近的贝督因部落提供服务。现在这个季节性仪式结束了，以色列公园管理部门控制着这个从前充满活力的地区。

我们走过小溪，沿着山谷北边的水渠直到溪谷唯一



有人居住的地方。几户人家住在砖房子里，就在水渠边，他们是这个地区最后幸存的贝督因人。很明显，他们不能确定我们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穿着牛仔裤，T恤衫，看起来很像外国人。我们用阿拉伯语向他们问好，他们邀请我们喝茶。坐在他们水渠边的门廊上，我们俯视山谷。他们烤面包的筒状泥炉很是诱人。菲米，家族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给我们上茶。她已经出嫁的女儿陪我们坐着，抱着小孩，不让她乱走。后来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出现了，但是他们很少说话，一直好奇地看着我们这群男女都有的小队。我注意到，菲米回答有几个孩子时，她说家里还有两头驴，这让我们大笑起来。我希望听到孩子们能够骑着这些驴去杰里科上学，因为步行至少要三小时。但是他们说没有。孩子们享受不到这样的奢侈。他们每天都要来回走路。

两个女人很快消失到她们的厨房里，我们意识到她们是去取食物给我们配着茶吃。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不要麻烦了，但他们不听。我们是客人，一定要款待。

我们阿拉伯人有传统的值得赞扬的慷慨大方，这一点被视为上帝的特征之一。的确，在神圣的古兰经里，慷慨也是他的众多名字之一。它是吝啬的反义词。像博爱一样，阿拉伯意义上的慷慨就是不计较。是不期待回

报的给予。不是做别人期待你做的。它既不是贫困的反面，也不能被定义为挥霍。我们在学校都学习过有关哈特姆（Hatem）的著名例子，他的名字和慷慨成了同义词，所以一个人如果慷慨，大家就会说他是哈特姆。他住在边远的地方，一次有旅行者拜访，他没有肉给他们吃，到处搜寻，看见他的骆驼，他唯一的交通工具，他就杀了骆驼招待客人，而不是让他们没有吃一顿像样的饭就走。

在阿拉伯传说中，这种对慷慨的赞颂和相信有时会对自己有害。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阿拉伯领导人没有超越个人的局限，看清他们对自己所服务的政策在大发善心。因此很多人被来我们土地上的殖民者迷惑，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还是犹太复国者。最近，挪威人，国际舞台上的新角色，利用这个弱点邀请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和他们的以色列同伴一起住在挪威森林的处所，挪威官员的小孩子被带到那里活跃气氛。所有这些都是意在让他们相互信任，好像我们问题的关键是缺乏信任，而不是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行动。挪威人成功了。奥斯陆协议签订了，殖民区没有消除，长久期待的和平没有实现。

我们坐在贝督因人家的门廊上，在流水淙淙的水泥



沟渠边，啜饮着茶，品尝他们新出炉的面包和快速备好的饭菜。尽管我们真诚地恳求，我们的主人还是不肯加入我们。按照他们的传统，主人和客人一起吃饭是不礼貌的。主人的任务是照顾客人吃饭，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吃完饭后，菲米得知我是律师，就拿出一张纸给我。那是以色列公园管理部门的通知，说他们在这里还有一年的时间，之后就要离开，因为土地已经被开发，将变成自然保护区。

占领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赞扬过军方的贡献，他们通过这样的宣布保护我们的乡村。然而那以后，他们大量建筑的殖民区显然对土地和动植物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他们好像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为他们自己的人而改造乡村，开发空地，并把其他地区确定为保护区，准备将来利用。1967年后，以色列占领和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当以色列市政当局确立那些地方为环保区时，我父亲失去了很多值钱的土地。我开始想，以色列打算把东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天堂般的绿色公园，结果认识到，土地被从阿拉伯主人手上夺走后，仅仅通过数年的征收，它的名称就改变了。让东耶路撒冷保持葱绿的崇高目的被放弃，转而利用土地建造居住区，为了犹太人的专有利益，让城市更加拥挤和沉闷。我的父亲也比

以往更沮丧了。

菲米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家。她丈夫一直为以色列自然保护协会工作，他的聘用期也要终止了。她指着山谷对面的土地说，俯视杰里科的殖民区正蔓延过峡谷之上的山丘。到时候他们会把这里围起来，溪谷入口将被殖民者控制。只有以色列犹太人和游客可以进入山谷，不再需要贝督因雇员来阻止阿拉伯牧羊人和散步者的侵入。这让我奇怪以色列协会在保护自然不受谁的破坏。

萨巴转向我说：“我早就知道。以色列计划的目的是预先限制我们所有人，准备最终把我们驱逐出去。就像他们 1948 年那样。”

我看着他痛苦的脸，认识到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被不断的恐惧折磨，担心 1948 年的悲剧会重演。对萨巴这种忧郁气质的人，历史也许不是最好的专业。

我们待在那里的整段时间，带孩子的年轻些的女人一直保持着沉默。我们问她有几个孩子时，注意到她眼泪汪汪的。她告诉我们，她的小儿子才刚刚会爬。她只是留他在门廊，自己跑进去取些食物，就这几分钟的工夫，他就爬到水渠里，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她拼命地追赶，但是无法救他。她在离家不远的被栅栏阻隔的水



草和碎石垃圾间找到了他，已经淹死了。

为了不致冒犯这么慷慨款待我们的家庭，我们待到觉得是恰当的时间，然后才继续上路。

1948 年后，大批阿拉伯人离开海法，卡梅尔（Carmel）的部分森林被确立为自然保护区。人们相信，这些森林最大的敌人是设法留在这里的阿拉伯农夫的山羊。于是颁布法律，强制执行，限制山羊在这些保护区吃草。不可否认，山羊不能分辨它们吃的东西。它们有爬上树干啃咬绿色树叶的令人烦恼的习惯，尤其是幼枝，却经常不碰下面的草。这么多年来它们对巴勒斯坦自然植物造成了一定的损坏。但是任何干预自然的企图都是冒险。在卡梅尔森林，山羊过去以很难控制、几乎无法根除的寄生植物菟丝子维生。它丝一般黄色的茎缠绕在松树干上。禁止山羊进森林后，菟丝子疯狂蔓延，山火爆发，它们向更大的地域伸展。虽然山羊吃掉我们很多美丽的野花，它们却肥沃了土地，滋补了土壤，确保将来植物生长得更强壮。它们既获取也给予。

菲米和她家人所属的贝督因人，大多数都不在当地，来自加哈林（Jahalin）部落。他们最早在内盖夫（Negev）安家，住帐篷，过着游牧生活，饲养山羊，偶尔从事季节性的耕作。1950 年以色列军队把他们赶走，他们在耶

路撒冷旁边的荒野边缘重新定居，在属于阿拉伯村庄阿布第司（Abu Dees）的土地上。他们继续生活在帐篷里，冬天就向东部暖和的地区转移，在那里待到早春，等他们的山羊产了小羊，小羊长到能行动时才离开。但是1976年一些以色列家庭在玛莱阿杜米（Maaleh Adumim）建立了新殖民区，加哈林人再次被驱逐。他们进行了持久的斗争，企图保住他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案子送到以色列最高法院，像往常一样，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发出一份经过仔细拟定、篇幅很长、有利于国家的决定，予人深刻印象。用以色列殖民区包围东耶路撒冷的政策不会因为贝督因部落而接受复查和纠正。在被媒体关注后，足够仁慈的国家将靠近地方垃圾站的一块地给了作证的贝督因人，很多年后，他们又被赶到别处。不论人类或环境付出什么代价，一些崇高的目的总要实现。

我们沿沟渠下坡去往杰里科，山谷渐渐变宽，草木繁盛。我们经过的罂粟地比拉马拉溪谷里任何地方都茂盛。我们所走的小路经过峡谷两边延伸的沟渠，因为晕高，我费了很大力气才通过。我宁可在溪谷里走，但这样花的时间要长些。我的恐高一定是因为年纪增长而更加严重了。当然我不记得以前在同一地方散步时遇到过



这么大的困难。

我忍着恐惧感，尽量不让其他人怀疑我的感受。如果我屈服，我就会放弃漫步，而错过还没见到的壮观景象。

我看见佩妮关切地看着我红如番茄、满是汗水的脸。她知道我的感受。我尽量不看两侧下面的深渊。我满心恐惧，不断告诉自己，要战胜我的恐惧，必须继续前进。我抬头望着蓝天。它总是有助于让人把精神集中在好的事物上，而不是让自己沉浸在绝望和沮丧中。我想到漂亮修道院里的清爽空气，就在山的另一面等待我们。

慢慢地，完全凭着意志的力量，表现出一副勇敢的姿态，我克服了恐惧，终于越过了它。我满身大汗，心还在咚咚地跳，但是我做到了。越接近圣乔治修道院，风景越让人惊心动魄，悬崖越是险峻、高低不平。沟渠跨过高高的岩壁，从我在的有利地势，可以望见对面我们走过的悬崖最高点固定着一个十字，推测耶 - 杰公路上的旅行者也可以看见，表明这块被诅咒土地的神圣性。这些地方的神秘魅力在于其偏远和与世隔绝。以前的散步中我能看到的仅仅是空荡的荒野。现在这里看起来像是建筑工地，因为通往玛莱米克哈玛斯（Maaleh

Mikhmas)、卡杜米恩 (Kfar Adumim)、米舍阿杜米 (Mischor Adumim) 和米茨比杰里科 (Mitzpe Jericho) 殖民区的道路正在山中挖掘修建，土地被铲平准备建筑更多房屋。这些殖民区建成后，一个楔形会把西岸分成南北包围圈，让巴勒斯坦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周围岩石被照得通亮。我们沿着水渠以单行默默地走着，各自想心事。没有更陡峭的斜坡，我可以放松了。萨巴带路，俄罗斯医生在我前面。一路上她多半都是沉默不语，我猜是在回想着早上令人烦恼的插曲。大家都累了，所以走得很慢。

在寂静和脚步的节奏中，我开始回顾我这几年的生活历程。只要我坚持斗争，我相信国际法、理性和庄严最终会重现。据猜测，曾在荒野里无望哭泣的犹太先知以赛亚，在去埃及的路上在这个溪谷里停留过。我也在荒野里大声呼喊，对着听不见我声音的世界。和被占领区其他有责任感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我对以色列方演说，警告他们如果这些殖民区不停下来，未来对我们都将会惨淡凄凉。我在独自或和他人一起去美国的演讲旅行中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要当心支持资助殖民项目的灾难性政策。以赛亚如此绝望，乞求结束他无望的生命。我希望我们不要经历那样的绝望。



在悬崖中转了个弯，我们就不直接暴露在阳光中了。在庇荫处走着，清凉袭来，令人安静和放松。我记得就是这个窄而深的峡谷引发了诗篇第二十三首——那是强劲生命的颂歌：“我虽行经死荫的幽谷，我却不怕遭害。”

走近库兹巴（Koziba）的圣乔治修道院，我们注意到地面的石头已经清理。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棕榈、橄榄、柑橘、夹竹桃和柏树。溪谷东面有一片小松林，较低一层是美丽的棕榈，向各个方向舒展着叶子。对着修道院的两棵橄榄树的树干交错盘结，仿佛是树根长错了位置，把自己围绕在树干上而不是深入地下。奇异的树干就像南面的悬崖，有形状相似的多节圆柱，仿佛城堡的廊柱。

花园似乎有自己的生命，这种感觉总是令我震惊。看不到有人在工作，白天这个时间也没有。在这荒野的深处培植花园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修道院依溪谷北面的悬崖而建，和沙漠边缘的其他修道院样子仿佛，比如伯利恒的玛萨巴（Mar Saba）和杰里科的克仑图（Kruntal）。岩壁另一面有无数的岩洞，有的入口被墙封住，其他有隐士住过，还留着他们爬过的梯子。五个隐士于公元 420 到 430 年间建造的小教堂

被底比斯的约翰在 480 年改造成现在的修道院。事实上 614 年它被波斯人毁掉后就已废弃，但 1179 年又被曼努埃尔·康尼努斯一世（Manuel I Comnenus）重新修复。几个世纪居住在这里的僧侣成功地躲避了一波又一波的统治者，其中有一些非常残忍。他们忍受夏天的酷暑，征服和饥荒年间不可避免的供给匮乏，军队和强盗的掠夺袭击的恐惧，努力过着修道生活并培植好花园。

在溪流两边高高的柏树、夹竹桃林和柑橘树下走过，我盼望进入修道院，它由一系列的小室和大厅构成，由拱顶支撑。我记得教堂内部是多么黑暗、寂静和清凉，那些肖像是多么令人敬畏。走过深谷上的小桥，爬上有扶栏的长而宽的石级，来到大门口。一段窄窄的有锻铁栏杆的楼梯上，棕色的金属门关闭着。以前多次漫步来修道院它都是关着的。这次也不能进去吗？我轻轻敲了一下金属门环。没有人开门。等了一会儿，又敲，这次重一些。一个老修道士穿着棕色服装，满脸皱纹，从阳台朝下看是谁在吵闹，打破了这个僻静地方的安宁。

“是谁，有什么事？”

我说想参观教堂。他仔细打量我的脸，然后开了门，我感到一丝宽慰。



“不过只能一小会儿。”

走进一个小门廊，最右边的楼梯通向一些仿佛属于私人的房间，继续走，进入好像是地下室的另一个房间。修道士带我进了教堂。黑黑的小礼拜堂，四周都是圣像，还有淡淡的薰香味儿。作为教堂，它的设计很不寻常，朝向很特别，顺着与它邻接的悬崖的方向。半圆形壁龛旁，东面的窗子呈九十度角。在这个昏暗的 20 世纪的小礼拜堂里，我感觉自己被深陷的岩石埋葬了。墙上有模糊的壁画，拼花地面只保留了一半。我穿过满是反映最后审判题材壁画的走廊，来到一个岩石凿成的房间，有拱顶安放着古人的骨头。这是建筑最古老的部分。我看着圣像，一些较新，一些很古老。门口的两张圣像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张上画着带天使翅膀的圣母牛。我从没见过以这种方式在教堂里纪念母牛的。另一个上面是鹿，鹿角间有十字架，一个僧侣敬畏地看着它。也许是荒野中还有鹿的时候发生了奇迹。

离开时，和内部的装饰比起来，教堂外表的粗糙让我不敢相信。在岩石中建立的修道院有一种坚实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如果修道士不开门，我是无法进入的。要寻求独立隔绝，甚至在荒野里也需要精心筹划和设计。

充满战乱的土地上总还能找到宁静和平的绿洲，僧侣们隐藏在那里，不必费神考虑门外发生的世事。这也许是唯一在圣地保全宗教尊严的方式。我想到我也应该从这古老的传统里寻求灵感，找一个安静的去处避难，度过艰难时期，让自己因为以色列肆无忌惮的破坏而绝望的心受到抚慰，直到它平复。

我不能再继续这种愤怒状态了，否则会消耗我的能量，我的生命会浪费在抱怨和悔恨中。该是接受现实的时候了，尽管会很艰难，却一定要找到坚持下去的方式，而不丧失自尊和原则。数百年来这些隐士和僧侣们不正是这么做的吗，远离尘世，保持自己的本质，等待潮流逆转，而他们周围一切神圣的东西都遭到了侵犯。是时候让自己献身于不同的计划了，一个我可以实现的，没有人能从我这里夺走的计划。写作会有助于支撑我继续下去，但必须是诚实和大胆的写作才能穿透封锁我的、令我麻木的重重包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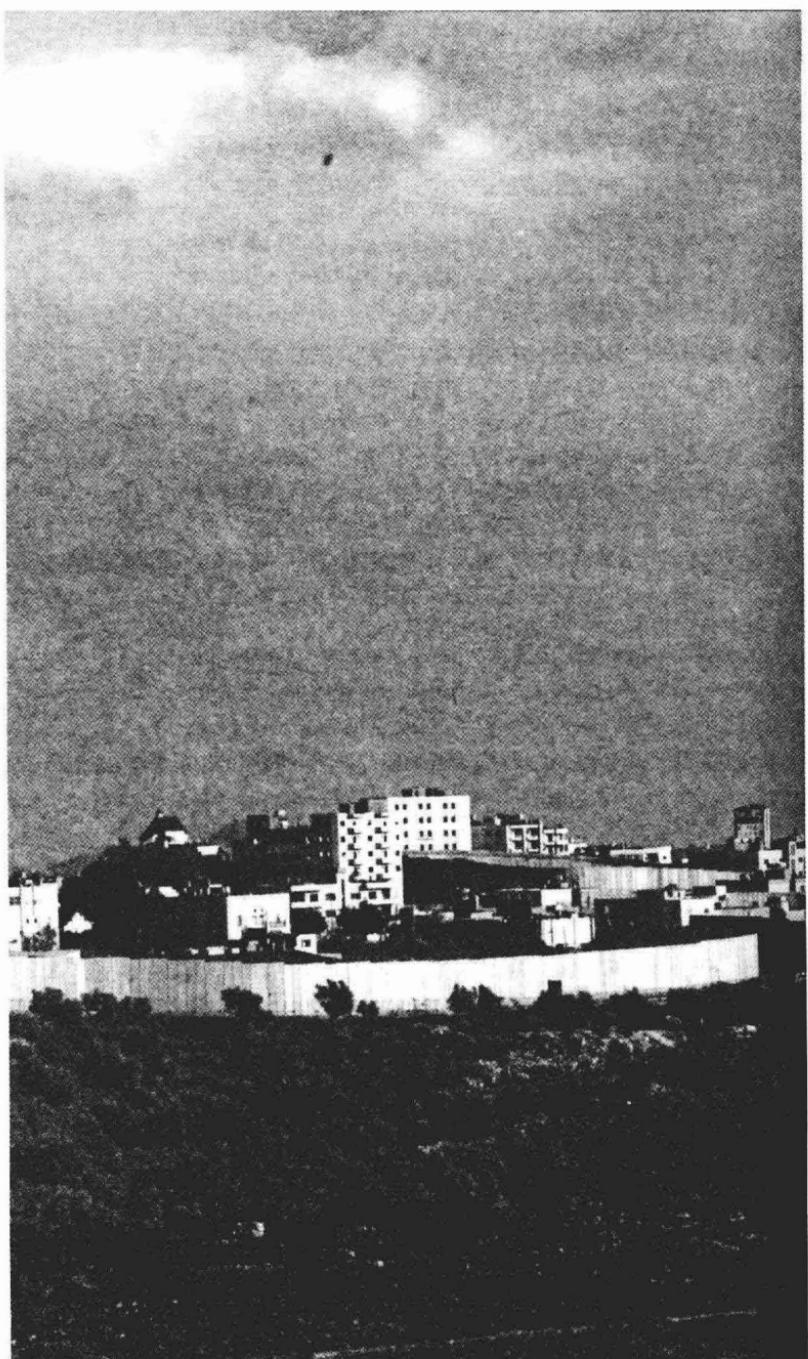
耶路撒冷后面的荒野现在大多有人居住了，僧侣们住在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除了长期居住在偏僻山谷里要克服的艰苦和磨难之外，变迁的时代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挑战。这次的变迁是永久的。不论棘手的政治冲突会有什么结局，这个地区再也不会回归成原有



的荒野了。以赛亚不会希望重生。至于这些有自我恢复力的僧侣，我不怀疑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幸存下去。

我们在修道院花园里休息，吃了几个柑橘，喝点水，继续向杰里科进发，那里是世界上持续有人类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过去，它依靠的是农业和给山里来的游客提供服务，游客们来享受温和宜人的气候与上好的餐馆。现在检查站挡住了进城的入口，城里绝望的失业青年为了工作，帮助建造附近的殖民区，在以色列工业区做劳力。以色列不仅重新划分了我们的土地，还决定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

漫步接近结束，我们合乘一辆的士回拉马拉，望着哥尔上空那笼罩耶路撒冷西部山岭的耀眼迷雾，我自言自语：你还在抱怨什么？物质上我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有律师事务所和我的家。我有幸福的婚姻。我知道我会找到处理失败困境的办法。尽管有困难和恐惧，我还会坚持漫步，坚持写作。我父亲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成功地度过了两次灾难性的失败。我要幸运一些。到现在，我只经历过一次。



被土墙围绕的伯利恒 (2007)

漫步 5

你是如何超越它的 加尼亞、拉斯卡卡和迪爾阿瑪

我认真研究过奥斯陆协议，认识到它必然会引起混乱。所以我试图采取措施预防我确信将要发生的情况。我在拉马拉边界内建造了我的房子，认为它不会被以色列开发，继续开垦我的花园，写作构思了很久的自传，《房子里的陌生人》。我站稳脚跟，以石头房子为避难所，静观风向变化，这是圣地光荣的传统，数个世纪以来，有这么多教士、僧侣和一群群宗教和种族集团在圣地建立修道院、学校或机构，把自己限制在墙壁内，站在梁柱上等待厄运过去。佩妮和我在拉马拉的土地上建造我们的房子，中间有开阔的庭院，为自己保留了一片天空。在灰暗时期找到这样的庇护可能是保持个人正直和生活方式的唯一办法。也许是前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就是《西班牙园丁》，讲述一个小男孩的父亲想让



他在漂亮的有围墙的花园里长大，不受外界邪恶的侵扰。

穆斯塔法·巴古提（Mustafa Barghouti）和我是多年的好友，尽管我们有根本的区别。他是医生兼政治家，我则是律师和作家。我们都喜欢在山里漫步，谈论时事、分享对事物发展的政治分析。1978年，我们几乎同时开始了职业生涯。他创办了医疗救助组织；我则创办了人权组织艾尔哈克（Al Haq）。我们是很多年的邻居，有很多机会一起在我们住处后面的山上散步。我们讨论民主社会在抵抗占领中的作用，讨论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意义，比如我们在70年代末创办的这两个。它们都是先锋组织，在各自领域里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公民反抗占领的其他形式，尤其在1987年底爆发的第一次抵抗运动中。但是自从巴解组织回来，开始了奥斯陆协议所谓的过渡阶段，很多情况都改变了。民政事务现在大致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处理，以色列军事部门重新部署，换了一个新角色，减少了和巴勒斯坦社会的直接接触。大量国内基金涌入，新兴中间分子的唯物主义倾向明显上升。志愿主义精神匮乏。解放的理想似乎比以往更远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但是能做什么来制止价值观的侵蚀呢，穆斯塔法问。像他这样的人在如此动荡

的时局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我们在路上有很多话题要谈。

我们决定不从拉马拉出发，而是先坐车到艾恩昆亚。从村子走到迪尔卡卡，穿过加尼亞和高山上的拉斯卡卡村。除了最后一个建在山顶上的，正像它的名字表示的（拉斯的意思是“顶部”），巴勒斯坦人绕山建造他们的村庄，而不是骑在上面。这个策略给了他们保护，能抵御强风和恶劣天气。以色列人占领山顶，因为他们眼睛盯着的是安全和军事优势。所以殖民区看起来很突出。看着山，就可以分辨巴勒斯坦村和以色列村。匆忙建造的殖民区像蜂房，建筑紧密，排列经过严格计划。而没有计划的巴勒斯坦村是长期慢慢发展起来的，和土地有机地融合成一体。我了解这些，但还是感到很吃惊。这些年，关于以色列殖民的总体规划，我读了很多，也写了很多。知道以色列规划者意在扼制我们的居住区，让它们彼此分隔。有时读着这些东西，我会对未来感到恐惧的战栗：如果这些计划就在我住处旁边实行怎么办？我们会怎样？但是阅读和亲眼看见是不同的。从拉马拉远处，我无法想象，现在拉马拉周围广泛蔓延和加速建造的殖民区所造成的剧变和浩劫是从我们的山里开始的。



到艾恩昆亚只有七分钟的车程，我们下了的士。这个小村子好像从来没有发展似的，尽管和拉马拉这么近。它和供水网络没有接通。妇女和孩子继续每天跋涉去山泉，装满简便油桶，架在驴身上或担在肩上，运回家。村子就是以泉水命名的，在泉边你经常能看见成队的人在等候装水，从新鲜清凉的水管口接水，我前几次散步喝过，还洗过脸。不过这次我们没有在泉边停留。从村子中心，我们下的士的地点开始，朝向西流的戴博（Dalb）溪而行。通向山谷的路边可以看见村民丢弃的成堆垃圾。这里没有垃圾收集站或任何垃圾处理装置，所以垃圾都扔在外边。过去，塑料和泡沫聚苯乙烯这类合成材料还没有引进前，自然可以消化生物能分解的废物；现在它们堆积起来，形成难看的一垛垛，很多东西甚至飘进了溪水里，被带到开阔地的其他地方。经过这可憎的眼中钉时，我想，对于我们这些漫步者，村子和山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只有他们的房子和周围小片地方被认为是他们的空间，要保持干净。

在村子西边的山上，是十五年前建立的多莱（Dolev）殖民区，那里景色非凡，有组织得更好、资金更多的地方部门执行以色列法律。犹太殖民者和阿拉伯邻居没有

任何关系。以色列官方宣布艾恩昆亚地区为自然保护区。在这里不准随地乱扔垃圾。但是没有措施处理阿拉伯村子的垃圾，美丽山谷因此遭到破坏。也许以色列当局希望艾恩昆亚村能自然消失。

多莱不是一个有活力的殖民区。在相对很长时间内，就像其他犹太殖民区一样，局限在山上。它的人口不超过两千五百人。山上有树林，殖民者在他们的房子间种了更多的树，和自然环境的融合比其他殖民区好很多。如果这是唯一的殖民区，情况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两个社区良好的邻里关系会适时发展起来。但是多莱只是野心勃勃的总体规划之一，规划要求以宽而直的公路网络将殖民区连接起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居民和沿海平原相连。为了实现这些计划，需要对群山实施大面积的改造和超过以往的破坏。

很多年，我关注着以色列军事政府颁布的命令，它们宣布西岸的部分地区为自然保护区。最初的命令，第554号命令，于1974年7月16日颁布。之后修改了至少二十次。纤特溪谷是最早的保护区之一。一开始我很满意引进法律保护特别的风景点，虽然是来自占领者。军队终于在做对土地有益的事情了。得知不允许修建房屋和公路，自然动植物会受到保护，我感到很欣慰。但是



这个命令对我们有好处的希望破灭了，另一个相关命令于1996年通过，没有军事总督的允许，禁止非以色列人进入所谓的C区。所有自然保护区都在C区范围内，所以依照法律，巴勒斯坦人不能进入。

穆斯塔法和我按照计划的路线漫步前，我已经知道它是被禁止的。我们没有得到军事总督许可，如果遇到士兵，可能会被拘捕。犹太殖民者也有权力拘捕市民。我们要当心两种人。我确信穆斯塔法像大多巴勒斯坦人一样，对这个禁令还不了解。我们出发前，我考虑是否告诉他，但最后决定不告诉。这么可爱的散步中有一人担心就够了。

经过山上堆积的垃圾，我们穿过山下新开垦的橄榄地，去往溪谷。找到溪水边小路，我们沿路而行。在干燥的山里，靠水边行走是少有的享受。我们右边是攀岩者喜欢的悬崖。我们继续沉默着溜达，听汩汩的流水在岩石间缓缓流动。这时我忽然听见一声铃声。我愣了一下，穆斯塔法很尴尬。他俯下身拉起裤腿露出绑在腿上的手机，他想把它隐藏起来。我坚持说漫步不要带手机。这样被打断，我感到恼火，不过意识到要接受我的朋友，他需要和外界保持联络。他是政治家，会谈涉及他的党派。即使几个小时的散步中也不能完全置

之不顾。

我们行走的山谷相对宽些，一条绿带穿过干燥的溪谷。它一路延伸到拉马拉，阿卜·阿米恩在小森林的别墅里用的就是这条溪水。附近是通向北边的小路，将艾恩昆亚和比奇特村（Birzeit）、库伯村（Kober）和米兹基里村连接起来。这些村庄位于我们途中可以望见的卡夫山和哈诺克山悬崖之外。南面坐落着多莱，然后是更小的村落分散在山间，一直延续到海滨平原，最终是地中海。我们右边的小溪旁有橄榄地，被多莱所在的山遮蔽住一部分。橄榄林中新耕的地上撒着太阳透过树枝形成的斑驳光影。

多莱的殖民者一定是不习惯看见有漫步者在溪谷里闲逛。村民们不喜欢悠闲地散步，就像在海边住的穷人们不把游泳当娱乐一样，只是因为没有时间娱乐。我知道殖民区周围有武装守卫，不清楚他们碰巧向下看时发现我们会把我们当做什么人。希望不会朝我们射击或下来拘捕我们。

现在我们穿过溪谷。踩着湿滑的石头跋涉，过到狭窄峡谷另一边的小路上。轻松地爬上西北坡，越过开垦的地，进入种着尚未剪枝的橄榄田，我们不得不弯下腰，拨开层层枝叶前进。也许在田里走还安全点儿，能



躲过那些殖民地守卫警觉的眼睛。未开垦的地上盛开着野花，有云影点缀。看见几只山鹤迈着小短腿急急跑开，我们朝后退了几步，直到它们飞出缠绕的树枝，到别的田地上去吃种子。

离我们不远，有两个年轻人在山间策马驰骋，姿势优美，和背景构成一幅漂亮的画面。我们的视线跟随着他们，看见他们就停在多莱所在的山脚下，一个属于殖民区的马厩。我们走的路从环绕多莱山的溪谷分岔，通到看起来像是乡村俱乐部的地方，那里有以色列和游客在享受我们可爱的山景。

接近山顶时，土壤变得潮湿，虽然附近没有山泉，而且也没有下过雨。不久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北塔蒙的以色列殖民者的公共排水道。这个殖民区一定有垃圾收集系统，但是没有排水处理，结果污水就随意流入山谷里巴勒斯坦农夫的土地。我们尽量小心迈步，不让鞋子浸入殖民者的废污中。正当我们在湿地上艰难跋涉时，两个小男孩给我们指路，走出了泥沼。发现他们在引我们偏离铺好的路，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

“太危险了。”他们说。

我们问为什么。

“殖民者，”他们说，“如果走路，他们开车经过会突然转向来撞你。他们就是这样从麦金（Mazen）身上轧过。如果有军用吉普车经过，他们就开枪。没人走这条路。”

我们坚持要走，他们就不情愿地跟着。我想他们也许是在夸大危险，一般男孩子常常这样，但是我可以从他们的表现看出，走这条通向他们村子的路是冒险。我观察到他们保持在我们的侧翼，并且始终沿着路边走，支起耳朵警觉地倾听是否有殖民者的车或军用吉普车靠近，以备能够跑回到山里。一路上他们都很紧张，讲了一件又一件殖民者干的恐怖事儿。

“阿布·纳贝尔（‘Abu Nabeel）不能去那边他自己的橄榄林，”小一点儿的男孩子说，指着我们刚经过的地，“他没办法耕地。每次想去，殖民者都朝他开枪，把他和儿子们赶回来。”

我没看见巴勒斯坦车经过。觉得很奇怪。

“加尼亞的人开车走这条路吗？”我问。

“他们不能，”大的男孩说，“村子的入口被封锁了。”

到了通向村子的路，可以看见军队设置在人口的混凝土路障，不准任何人移动。我想知道，村民如果有骡



马，可以骑着走这条路吗？估计也不行。

从殖民者的角度看，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保护他们的人不被扔石头的人砸伤。他们如此确信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以致利用实际上的起诉豁免权来胁迫他们的邻居。一些人使用武器残酷杀害巴勒斯坦人。早在1982年，艾尔哈克人权组织和其他组织就曾经记录过殖民暴力事件。但是以色列公诉人很少对殖民者采取行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权组织都为此进行了游说和疏通。

加尼亚村比艾恩昆亚大，而且更富裕。它的大量居民移民美国，在那里发展得很好，就汇款帮助村中的亲戚。我们走上通向村中心的柏油马路，向人问路，被指引到通往下一个溪谷的小路。我们面前是壮观的小溪谷，比戴博谷宽，更为茂盛。像在艾恩昆亚一样，我们在村边看见成堆的垃圾。下坡的路比以前走过的都陡，然后是长满草的野地。一边走一边能听见推土机在村西北翻动土地，打碎岩床，为新居住区塔蒙贝斯（Talmon Beth）奠基。现存的塔蒙区旁边是哈拉沙（Harasha）和霍里斯（Horesh Yaron），我努力不去听这声音，但是做不到。

很奇怪，我们没有发现在自己土地上干活的村民。传统上，这些村子都是农业村。几十年中居民一直遭受

着胁迫，他们的生命安全不保，很多土地被征用。他们被变成建筑工人，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殖民地。这就是新时代的开始，我了解这种与土地的新关系和对山的破坏。

到达溪谷后，路转向北方，我们的位置太低，看不到东面山上的建筑工事。我们走过一块丰饶的突起的土地，种着鹰嘴豆。然后看到一座土坯结构建筑。新刷的白粉在一片绿色背景上显得很突出。它是纳比·阿聂尔 (Nabi Aneer) 的墓，尊贵的长者或当地圣人的墓。通常在墓周围会建有小圆顶建筑，当地人可以在那里祈祷和沉思。靠近的时候，穆斯塔法和我压低了声音。到了门前，朝里面看去，漆黑一片。眼睛适应过来后，我们看见一个留胡子的人静静地坐着。我们迅速退回，不想打扰他。他把鞋子留在外边，蹲在圆顶下，正在沉思。

我们走开，悄悄沿着朝南的上坡路去拉斯卡卡村。它是巴勒斯坦二十多个君主村之一。这些村庄是乡村贵族的所在地，随着土耳其中央集权的衰弱，这些乡村贵族自行收税，在当地取得了极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付不起税的人就要被征用土地。村子原来叫做加尼特酋长萨玛 (Janiet Sheikh Sam ‘an)，是以统治它的酋长



命名的。他在村中建造了城堡，住在里面。一战期间，村长和土耳其人站在一边。英国开始统治巴勒斯坦后，罚他把村名改回原来的拉斯卡卡。拉斯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顶部，卡卡是贼鸥。但是这些鸟不是本土的，很可能英国人想的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即忽然大笑。

路两边高高的青草让我们显得很矮。我们朝西走，离开村子和殖民区。我们被山间的开阔地环绕，除了很少几条很早以前修的窄路，几乎保持着圣经时代的原貌。很久以来，相关土地法的改变占据了我的心思，削弱了我对这些山的愉快感受。但是如果以独特的方式去看待，这样的人工建筑可以被忽略。从土地的角度看，它们根本不算什么。一条路在山上留下一道疤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疤愈合，吸收并合为一体。收集起来建造房屋的石头会崩坍并回归土地，不管它们曾经是多么强大。十字军纪念城堡荒废了，点缀着土地，还有其他统治这个地区的帝国的废墟。帝王和统治者们来来去去，但是土地依旧。所有这些思绪穿过我的脑海，让我忍不住想，这种长远观点仅仅是剥夺我的行动主义的理由，还是一种对以色列所假设的这些改变是永久不变的合理抵抗！我意识到，越是试图让我对它们的永恒性印象深刻，我的大脑就越是寻求它们短暂的证明。

长远考虑让我能够把当前和其他时间分开，也因此可以认识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现状不可能是永远的。我在尘世逗留相对短暂的时间，这段时间过后，生活将继续，没有我的观点、偏见和恐惧。

在《卡梅尔角》(Carmel Point)中，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问到，当“破坏者到来”时，自然是否在意，他回答说：

一点儿也不。它拥有所有时间。它知道人类就像潮水汹涌澎湃，到时间自然会退潮

他们所有的工作将溶解。同时，原始美的形象活在花岗岩的每一条纹理中，

安然如同爬上我们悬崖的无边大洋——至于我们：我们必须取消自我中心；

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观点稍微失掉些人性，并变得像构成我们自身的岩石和海洋一样自信。

穆斯塔法和我认识很久了，他一定注意到这种想法改变了我。漫步到一个地方，他转向我问道：“告诉我，你是怎么战胜你的愤怒的？”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奇怪。我没意识到我被认为是一



个不爱生气的人。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接受我们投降的现实，然后继续。”

刚说完这话，我几乎马上意识到我遗漏了最重要的因素。写作比任何其他东西更有助于克服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心中燃烧的愤怒。在我的自传《房子里的陌生人》中，我写了1948年灾难中父母和祖父母的经历。通过感受和表达他们的痛苦，连带还有我自己的过去，我可以从控制我想象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我感觉这种束缚很难超越。我自己的经历和在我出生前发生的暴行相比已经微不足道。自从我从行动转向写作，我发现自己更为自由了。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从来没有获得完全的舒适感，是社会环境将那个角色强加给了我。

“你认为情况很糟糕吗？”他问。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临被领导者鼓吹成胜利的失败。”我回答，“我们的历史充满相似的例子。在谎言中生活的代价对我太大了。我宁愿面对现实，盘算一下，以色列已经赢了这一轮。需要很多年才能消解奥斯陆协议的危害。如果面对失败的现实，我们也许还可以争取到有价值的时间。”

“我的党派给我很大压力，要我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你不能想象他们有多么顽强不懈。他们说这是唯一

的策略。我和你一样认为注定要失败，但是参加也有巨大的回报——政府高级职位，金钱，权力。就像拿回人人都能看见都想要的战利品。我已经努力过了。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对他们说了我对协议和官方的想法。如果我们追求短期利益，就会毁掉未来的机会。这一点我很明确。我不太确定的是另外的选择。如果不在政府里，我们能扮演什么角色？”

“你一直扮演的角色，反对派。”

“但是我们在占领者行使所有民权时就这样做了。”

“你不必把巴勒斯坦官方当做敌人。我的意思是把它当做过去的现象，为下一阶段准备。”

“那么你认为会是什么？”

“继续斗争。协议是投降做法。接下来会有更强烈的殖民活动。以色列方明白他们分享了西岸，给我们 A 区和 B 区，把 C 区留给他们自己。因此宣布 C 区为封闭的军事区，准备在上面建满殖民区。”

“C 区封锁了吗？我还不知道呢？”

“1996 年军事命令封锁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是非法的了？”

“没错。”

“我们的官方保持沉默。他们没有任何挑战以色列



的行动。好像这个问题和他们无关。”

“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吧。”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难道他们不是政府吗，不是负责的人吗？他们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我们一致同意，现在所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授权于社会民众。穆斯塔法认为这个部分在阻止我们无经验的新政府的过渡和错误上会起很大作用。他是个足够机敏的政治家，了解在政府里是不能批评奥斯陆协议的。加入政府是一个陷阱，就像出卖他的发言权一样。

“我已经发动了一个战役，”他告诉我，“反对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政府准备的草案对这部分加以各种严格限制。如果它通过了，我们的情况会更加糟糕，甚至比完全在以色列统治下还糟糕。他们试图这样做，因为他们政治上有全权，我们必须及时制止他们。”

穆斯塔法总是知道他想要什么；我只是提供法律论据，支持他的政治直觉。

我们已经围着美丽的村子绕了一圈，它的房屋在有峰的山顶上，然后继续向西在烈日下走。穆斯塔法开始给我讲他上次从国外旅行回来在西岸和约旦间的艾伦比桥的经历，他认为可以形象地说明我的观点：

“到达那里时，我把旅行文件交给边界的巴勒斯坦

官员。他立刻传给了他后面哨卡里的以色列人，甚至连看都没看。我看到分隔两个官员的玻璃上的油漆——目的在于藏住以色列人的——已经脱落。这说明了奥斯陆协议的全部秘密，”穆斯塔法吃吃地笑着，“我能看穿掩盖，奥斯陆协议的骗局。根本看不见巴勒斯坦旗子，那是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用几次会议斗争得来的。它被除掉了。以色列对边界实行绝对的控制。油漆脱落的玻璃后他们的官员显然想看见我。这是倒霉的巴勒斯坦官员传递给我的意思。我拒绝离开。告诉他：‘难道你不为自己感到可耻吗，服从以色列人的命令？我一直被高贵地对待，而现在要向一个以色列岗哨屈服。我拒绝离开。你想把我怎样就怎样。’

“我被扣留在那里直到半夜，他们才最终同意以色列人从他的岗亭里出来和巴勒斯坦官员站在一条线上。还有就是他们都会和我握手，以色列人把我的护照递给我。以色列人以这种方式表明他的存在，证明他才有实权。

“我问桥上的巴勒斯坦官员们，他们怎么能忍受这种愚蠢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伪装。他们认同说达成的协议很糟糕，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屈服。我耽搁了很久，但是最后我表明了立场观点。如果



每个人都抵制这种做法，我们会取得一些进展。他们交还给我护照，我拒绝和以色列人握手。而是告诉他：‘我会寄照片给你的。’‘为什么？’以色列人问。‘挂在你小卧室的墙上，这样你可以经常看见我。’我说，‘你不是很想看到我吗？’”

我们继续向西，朝村子下坡的蔚溪走。又可以听见上面推土机工作的声音，知道他们在开一条新的穿山公路，将东面的塔蒙和西北的纳尔，与市内殖民区莫丁伊特（Modi ‘in Illit）和绿色带上的玛地提亚（Matityahu）连接起来，起伏山脉中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

我们爬上去，新建筑的整个场面暴露在眼前。真是剧变，好像整个地球被改装了。开发者铲平山顶，毁掉梯田，从地里挖掘出大块石头用来筑墙。这些安插在我们中间的以色列殖民地再也不是可以消除的适度的飞地了。发生巨大变化很难让人不把它看做是永久的。好像千万年的地壳构造运动现在几个月就完成了，完全重绘了地图。我所认识的巴勒斯坦，我视为自己的土地，正在眼前迅速改变。

我们漫步的几座山的北部是哈拉米斯殖民区，靠近迪尔加沙内（Deir Ghassaneh），那是穆斯塔法家族最早起源的村子。1967年战争期间，他父亲把他和兄弟姐妹

送进村子，以为那里可能比拉马拉要安全些。他们从村子回来的路上，穆斯塔法第一次遇到以色列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告诉我，“我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父亲送我们和妈妈去迪尔加沙内。我还很小，大概十四年前。以色列军队到达时，人民以为是纳塞爾（Nasser）的埃及士兵。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被他们拦住，要检查身份证件。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年幼无知了。意识到我们对纳塞爾的信任是个错误。这个人不可能拯救我们，我感到肩上强烈的责任。我想我要努力工作了，因为我们的命运在自己手里。纳塞爾要辞职时，老一辈人都对他生气，心怀愤恨。我个人的反应不同。我认为他做不到，是他力所不及的。我并不因此对他有恶意。”

我看到穆斯塔法和我父亲的反应是那么相似。两个人都全力投入国家事业。考虑过各种选择后，却相信和平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最佳办法。尽管有年龄的差异，1967年战争对他们来说是转折点。父亲提出和平解决冲突，遭到双方极端分子的攻击，他们的政治观点只能带给我们灾难。同样挑剔穆斯塔法策略的人也非常多。在一个这么小的社会里，嫉妒也会起作用。地方领导只有善意和对政治的敏锐是不能有什么发展的。正像我父亲晚年认识到的，金钱在鼓动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世



界任何地方都是。

我们在这些山的漫步过程中没有遇到一个士兵或殖民者。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无所不在，他们继续建造新殖民区，扩大现有的，并且修路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向山谷深处走去，山挡住了声音，我们可以再次假装这块土地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和平安静地漫步，不受干扰。

我们现在来到了艾尔纳达（El Nada，露珠）溪谷，发现水中漂浮着黄色芥茉种子和蓝牛舌草。不过迪尔阿玛下面宽阔平坦山谷的主色调是大片罂粟亮丽的红色。天上有些许浮云。阳光透过云彩照得整个溪谷越发绚烂。当太阳穿出云层，色彩更浓烈了。草地在闪耀，随着微风摇曳，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光影。我们决定在山谷边坐下来休息，然后再攀登迪尔阿玛，我们的最终目的地。

爬山时可以看见青翠的山野中有一片片岩石，像灰色的小岛被草地上长有穗状叶子的黄色金雀花环绕。接近村子时，动物屠宰的腐烂气味扑面而来，强烈到我们要捂着鼻子快速逃掉。到了山上我们停下来，从远处望向村子，这才意识到一群男孩子正聚集在一起，好奇地看着冲上山的两个中年男子是什么人。浮云散尽，万物

在明澈的光明中闪耀。这美丽的山野，这美丽而被破坏了的国家！

穆斯塔法在迪尔阿玛很有名。村子有难民营，是1949年在村子的土地上建的，由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管理，1948年被以色列从边境村落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居住。作为报酬，联合国代理为村中的非难民提供服务。穆斯塔法和他的医疗救助组织来过这里，在第一次抵抗运动时以色列对村子的多次围困中给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我们散步结束时，我认识到有必要超越对我们政治现状的绝望。我太多地沉浸在过去，沉湎于自认为是失败的自我鞭挞，太过急切地认可了这种状态。我感激穆斯塔法鼓励我思考我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屈服于绝望。我试图提醒自己应该更加积极地看待过去。有幸参与民众斗争是我唯一的回报。我没有权力要求我的劳动得到更多的认可。



我们对奥斯陆协议的评价证明是正确的。和以色列达成的协议是错误的开始，它给巴勒斯坦人结束占领获得主权的斗争带来了灾难性结果。穆斯塔法在政治上做



得很好，没有加入新建立的巴勒斯坦当局。他离开作为高级成员服务过的人民党。他建立了自己的党，在亚瑟·阿拉法特 2005 年去世后参加巴勒斯坦政府首脑的竞选，获得了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多年来他一直是巴勒斯坦立法会成员，后来担任 2007 年建立的联合政府内阁总理。我继续在外围参与公众事务，作为旅伴，随时随地帮助穆斯塔法。不过我大多集中在自己的写作上。就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的房子继续作为避难所，是我和佩妮可以引退的地方，在被战争分裂的国度里过着尽可能安静的生活。

但是国家并没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以色列军队对西岸令人窒息的包围，遍及各地的大量殖民区建造工程，奥斯陆协议及其所有错误导致的对安定时期的巨大压力，这一切依然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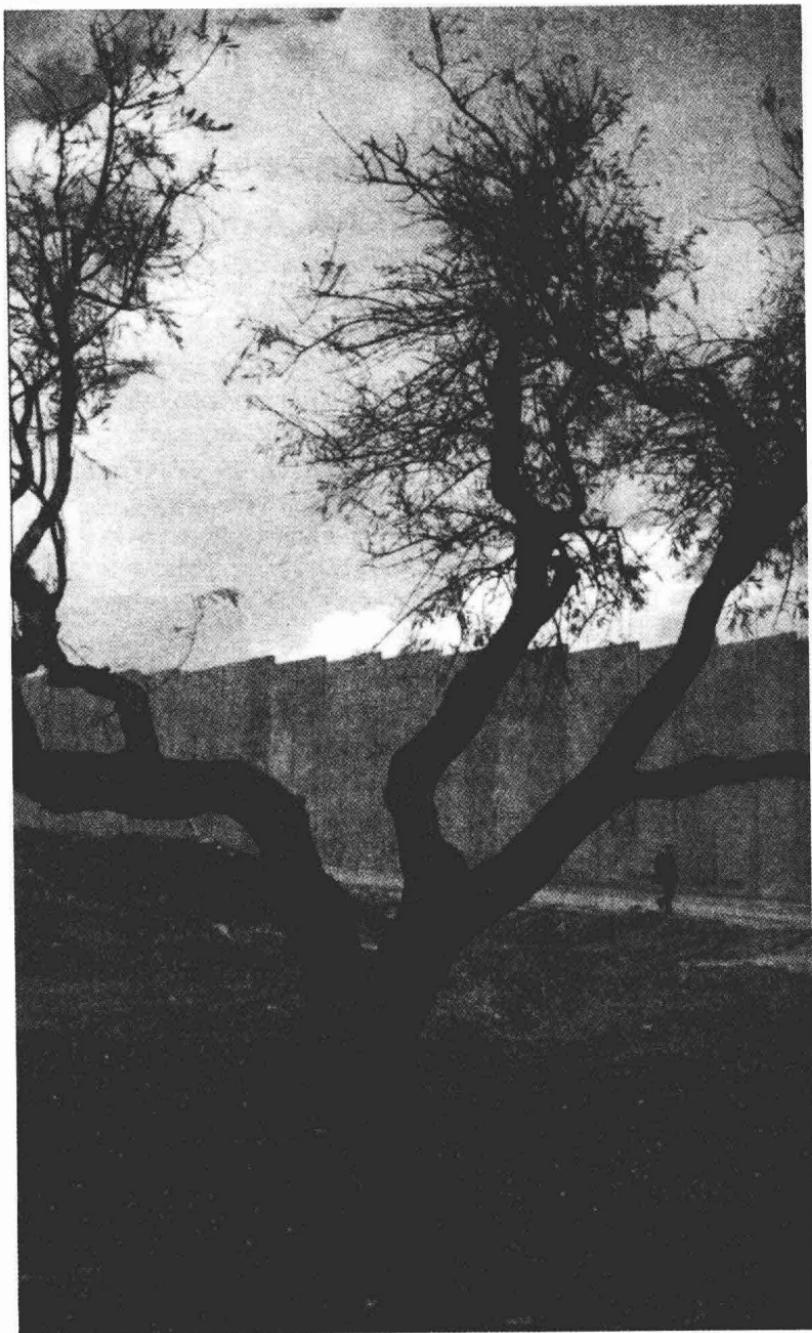
在更早的地质时期，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无法承受而炸裂，形成大裂谷。只有和平才能避免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民族的相似的决裂。但是以色列政府不愿意让土地和它的人民和平。

穆斯塔法和我在山中漫步时目睹到，我们的土地正在我们眼前被改变，新的地图在规划。我们不想看到这些，只是盲目地相信以色列领导层空洞的和平宣言，一

个仅存在于口头上的和平，纯属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

但是全国民众无法被长久蒙蔽。另一场动乱就要开始，这次抵抗运动将会比上次更激烈，它将导致两国人民最终不能逾越的分裂。





一个巴勒斯坦男子走在将巴勒斯坦村庄阿布迪斯与东耶路撒冷分隔开的大墙下（2005）

漫步 6

想象的漫步

戴博谷

上一章讲述的那次漫步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2002年的春天，我希望在我的石头房子里找到庇护的想法被打消了，以色列军队入侵拉马拉，进了我的家，让它失去了避难所的意义。以色列入侵西岸城市给出的虚假理由是要保卫国家。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眼里，“以色列”意味着“伟大的以色列国度”，包括大部分殖民区。事实上，以色列学校教科书使用的地图已经擦除了1967年以前以色列和被占领区的边界。保卫国家也包括保卫被占领区的殖民者。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决中肯定了这一点。它统治下的殖民者有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保护。他们是在非法强占的土地上这个事实没有造成什么差别。

2006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 说明了他的注定要遭受惩罚的计划，将被占西岸的犹太殖民区并入以色列，还把它称作“会聚计划”(Convergence Plan)。1967 年前，旧的以色列边界和被占西岸的新以色列融合形成“大以色列”。以色列承认奥斯陆协议的十三年后，在和巴勒斯坦邻居交涉犹太殖民区命运的最后阶段，政府宣布它要单方决定将大多数殖民区合并到以色列，并重新划分国家边界，不再进一步协商。合并后巴勒斯坦将变成分散的、互不连续的地区，不可能构成建立可行国家的基础。以色列变得如此强大，加之它从美国和英国盟友处得到的强大支持，它觉得可以推翻以前对巴勒斯坦的承诺而免受惩罚。

巴勒斯坦抵抗战士反对以色列的突击队行动后，一些这样的殖民地被建立起来，以色列政府声称这是他们“合理的犹太复国运动反应”。多年来，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从来没有发展到相信唯一维持其长久存在的政策是和阿拉伯邻居寻求和平以及地区一体化，而不是继续和巴勒斯坦敌对，强占更多土地，在他们的领土上安置外国飞地。以色列与其周边的民族和国家仍然处于敌对状态，殖民者完全和本地的巴勒斯坦居民隔绝。以色列领导人喜欢反复说，他们想要将犹太人在我们土地上的存在“深深烙入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要让我们交出我

们对土地的权力。

紧随着对拉马拉的入侵，激烈的措施在军队撤走很久以后还在继续。以维持安定做借口，所有城市和数百个村子的人口都被封锁。西岸大多数公路禁止巴勒斯坦人通行，还毁坏经过的车辆，迫使我们使用没有铺设的路，隐蔽、多岩石的小路和危险的弯道。

以色列军队在西岸设置大量的检查站和路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以色列轰炸结束后，检查站的数量甚至从 2005 年 8 月的 376 个增加到 2006 年 10 月的 528 个。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要秘密行动，像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烦恼不断，从不感到安全。我们变成了大以色列的临时居民，生活在以色列的宽容下，在控制检查站的年轻男女士兵手下遭受侮辱的对待，他们随意决定是让我们等上几个小时，还是放我们过去。最糟糕的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来日无多的那种怨恨心情，某一天我们可能成为另一次大驱逐的受害者。

作为巴勒斯坦官方中心，拉马拉的居民也没有逃过西岸其他城市经受的强迫性集中居住。以色列军队控制了所有城市人口。拉马拉西南通向贝特恩的公路上的贝图亚 (Beitunia) 出口，也就是阿宾纳土地所在地，一个起初监禁少年犯的临时帐篷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



永久性堡垒，有瞭望塔，上面有带刺铁丝网的高墙，成了以色列军事法庭传召的地方。东西走向的高速路穿过矮矮的山，阻止了拉马拉朝那个方向发展。它是留给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殖民者使用的，还有围绕西北边界一直到特拉维夫和沿海平原的殖民区。这个入口禁止巴勒斯坦人通行。

奥斯陆协议时期即已存在的环绕拉马拉的殖民地扩大了，新增数量超过了十个，甚至有些是建在有偏见的以色列法律也承认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的。其中之一在拉马拉西北，和阿卜·阿米恩的夏日农场有着同样响亮的名字，小森林。夜晚从我的房顶遥望地平线，我能看见非法前哨的黄色灯光形成环绕城市的明亮圈套。

但是，更具破坏性的开发是以色列修筑的分隔墙，它预示着悲剧，它的诅咒将使未来的冲突不断。锯齿状的延伸路线不仅是出于以色列军事方面的考虑，还照顾到殖民者和排外土地主的特殊利益，它们切入山体，摧毁自然形状，吞并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它只是部分遵循1967年停战时国际公认的以巴边境划分，现在这个边界线已经从以色列官方地图上抹去了。以色列计划吞并的殖民区像短剑一样戳进巴勒斯坦土地，现在又被围墙戴上剑鞘，保护起来了。

我决心不让这些阻止我在山中的漫步。封锁西岸大多地区的军事命令，检查站和路障，还有犹太殖民区都不能让我停止。就天气来说，2006年的春天是多年来难得的晴朗。一直雨水充沛，分布均匀。雨甚至持续到4月，给通常到这个月末就开始枯萎然后死亡的野花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不能不去漫步而浪费了这个季节。

我不想重复几个月前从约旦谷开车回来时迷路的恐怖经历，这个鲁莽的决定让我有点扫兴。我一定是拐错了一个弯，结果发现自己开到了新殖民区和工业区里，大片开阔的空间让我迷惑，不知自己到了哪个国家。我告诉自己不要惊慌。只要我继续向西开，最终一定会到达我认识的地方。但是路越开越陌生。所有的路标都指向犹太殖民区，找不到通常指示方向的特征：大片漂亮的漂石堆，那些转弯时深入峡谷的石壁，然后又转回右边有美丽村子的公路。“我在哪里？”我不断问自己。开始我假装这只是一个游戏。我车上有足够的汽油，最终一定会走出这个迷宫。不过时间渐渐过去，我看不到任何熟悉的景物，便开始慌张起来。小时候，我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在陌生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会大声呼救，结果却发不出声音。现在的感觉极其相似。我开始冒冷汗。我到底在哪儿？怎么才能出去？天就要黑



了，微光中的一切显得更加陌生。我不顾后果地乱开，不在十字路口停车。绕来绕去，不知朝哪个方向开，这使我产生了幻觉。这些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我似乎是这虚幻之地唯一的旅行者，独自一人经历这场醒着的噩梦。“也许我应该停下来镇定一下。”我告诉自己。但是那又有什么用。佩妮总是建议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做一下深呼吸。可这次情况不同。我不知从哪里开始，让自己摆脱混乱。我觉得自己被诱人了我在法庭上一直与之纠缠的殖民区的迷宫，永远也不允许我逃脱。等我的汽油用完就不得不待在这里，等人来救我。可是，除了武装殖民者，还有谁会在我曾经熟悉的新世界里游荡呢。最后，终于找到办法出去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究竟是怎么出来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怀疑，由于新殖民区的建设和连通它们的道路，我很可能会再次迷路。于是我决定加倍小心，谨慎看路。

我考虑着前景。不能走阿卜·阿米恩的路去艾恩昆亚，因为这条路大部分被拉马拉向西北扩展的新建筑毁掉了。此外，多莱和贝特伊的犹太殖民者筹资建造了旁道，穿过群山和峡谷，越过巴勒斯坦的土地，连接起他们的两个殖民区。这条设计糟糕的私路给山造成了严重

损坏，阻碍了溪谷的水流，摧毁了一些山泉，还有很多独特的岩石地层，其中有一座壮观的悬崖，镶嵌着我经常要停下来观赏的樱草植物。

至于我发现恐龙脚印的南部山谷，现在已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用做打靶场了。夜里可以听见断断续续的枪声。艾恩昆亚的通道也被军哨阻截，它设在拉巴（Rabah）家的山上，离亚德亚尔（Yad Yair）军哨五百米。

所以我决定查看山形地图。我不得不这样做。一般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向别人屈服，向地图的绘制者和他们的主观偏见屈服。我宁愿按照自己头脑里的地图自由自在地走，它是由历史记忆和相关资料标明的：这里是阿卜·阿米恩别墅所在的地方，那里是我和乔纳森停下来长谈的岩石。还有见证过佩妮和我难忘的漫步的山。但是我别无选择。要找条能走的路，没有殖民者或射击练习者，没有军哨或殖民者自修的旁路，真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最终找到了一条路线。乘的士向北，去比泽特（Birzeit），穿过 B 区，巴勒斯坦人不需要以色列军队通行证也能进入的地方。到大学前叫的士左转，向东到米兹拉奇比亚村（Mizra'a Qibliya）。然后下车。我还要冒险经过 C 区，不过我已经想到可以避开军哨等等的路



了。朝西南方向避开塔蒙殖民区和它的新伙伴：小森林，霍利司亚伦（Horesh Yaron），纳利泰（Nahlei Tai）和扎伊拉南（Zayit Ra'anana）。然后下到艾恩昆亚泉。再从山谷里朝北，绕回拉马拉，这样就不必经过亚德亚尔和加巴克瓦（Jabal Kwa'a）的其他军哨。

到达米兹拉后，我让司机带我上坡。

“去小森林？”他问。

“是的。”我回答，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就开始跳。
我被拉到山上那片松林。

“到了，”司机说，“这是你想去的地方吗？”我看得出他在想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发现自己独自在一个可能曾经和阿卜·阿米恩的土地相似的地方。山丘高处，一棵绿色松树立在泉旁，临近一个果园。我精神振作起来了。想起阿卜·阿米恩和他那大为不同的年代给了我力量，我不在乎有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我要享受在这山里的漫步。我沿着很容易找到的小径，向南走，爬到更高的拉克艾哈努克（'raq El Khanouq），俯视戴博溪谷的悬崖。这里太高了，也太令我眩晕，我下不去。于是我继续向北，走到溪谷，发现一条很陡的小路，但从那里看去，山谷景色很美，宽宽的一条绿带，流水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在这

干燥的山里发现有小溪的绿谷真是太奇异了。我的心猛跳着。我几乎想跑下小路，但是想了想，最好不要这样，为了我的膝盖着想，还是慢慢走好了。在这里感觉很安全，我想继续走，直到艾恩昆亚东南开垦的田地。

刚到水边我就意识到有人已经在那里了，我用余光注意到他。我没有直视他，不想让他打扰我的平静。但是我知道他在那里，而且是个以色列殖民者。

这时我闻到一股强烈的怪味。我意识到那是印度大麻和另一种更浓烈的我不清楚的物质混合的气味。那人在小溪旁一块平石头上正忙着装自己的水烟筒。他对我突然闯入他的私人空间感到惊奇，停下手上的事。他一定看出我注意到了他的违法活动。但还不能马上确定我是什么人：也许是以色列人，是执法者，可以因为吸食违禁烟草逮捕他。但是当然他有权利，他就是法律。他还有枪。而且殖民者可以随意向巴勒斯坦人开枪。

我仔细看他的脸。窄窄的，鼻子突出，眼睛善良聪明。他长而直的棕色头发像围巾一样垂在肩两侧。很明显是以色列殖民者，就像我开始时假设的。但我不想对他进行评价，我要走自己的路。一句话没说，我集中精力选择最好踩的石头渡过小溪。差不多快到对岸了，才听见他用希伯来语叫我：



“你的帽子，你的帽子掉了。”

他的声音轻柔而善。让我多少有点儿意外，我只是想悄悄地过去，不被人注意，也不想注意什么别的人，各自相安无事。但是这次好像不行。2006年春天巴勒斯坦的山上，再这样不行了。

我的帽子快速顺流而下。我蹲下去拿，但够不到。看着它漂呀漂，在石头上跳动。以色列人冲了过去。他比我年轻灵活。他拿到了帽子，站在那里朝我挥动着。我的视线从他身上转到他平放烟筒的石头上，他的枪也在那儿。他的目光随着我的目光转动，我看不见他变得僵直了，显然是在决定是跑回去拿枪，还是把帽子给我。我没有动。好奇地想看他下一步会怎么做。他弄不清我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我用英语说：

“你的枪靠着岩石放的不是地方，你说是吧？”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没听明白我的英语。我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说：

“这么好的天气和枪在一起气氛很不融洽。”

沉默了片刻，他说话了。语气几乎像是在道歉，完全不像一般的以色列人。他说：

“我知道，不过我别无选择。”

“你是哪里人？”

“上面。”

“多菜?”

“是的。”

“你住在那里?”

“没错。”

看着烟筒，我直截了当地问：“你经常来这儿吗？”

我想知道他是否经常从家里跑出来偷偷吸毒，我们的山是否现在成了以色列年轻人非法活动的避难所了。

“我很喜欢这地方。”他回答。

当然了，我想。完美的隐匿处。我看得出他希望我离开，然后他可以继续准备吸烟。

“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害怕？为什么？我又没对谁做什么坏事。”

没做坏事，我心想，他和他的人夺走了这么多土地，毁坏我们的生活这么久，还说没做坏事。

“那为什么还带枪？”

“我应该带。”

“你住得离山谷这么近，走下山就到了，多方便。”

“我来这里找清净。”他也直言不讳地说。

我明白他的暗讽，但不想就这样离开，我想试试发现我们这位不受欢迎的邻居的一些新东西。



“你在多莱出生的吗?”

“不是，我五岁时父母搬过来的。”

“是哪一年?”

“1986年。”

“你还在服兵役吗?”

“服完了，我是消防队员。”

“多莱没有什么火灾。那是个很小的社区。”

“我在罗得工业区做。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我想用利玛在纤特溪谷回答殖民者的无特征的回答
应付他——“这里”，但决定告诉他事实。“拉马拉。”
我说。

“我怀疑你是阿拉伯人，但不确定。阿拉伯人不散步的。”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很多阿拉伯人吗？”

“不。一个都不认识。”

“那你怎么得出那个结论？”

“只是观察周围的村民。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散步或
坐在水边。”

“也许因为他们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你们。”

“害怕我？”

“对。你不是带着枪吗？”

“我也不想带枪。太重了，是负担。但是我说过，我不得不带。”

我忍不住用明显的讽刺语气说：“我想你是愿意。”
不过我立刻就后悔了。我在找碴打架，我没有勇气也不想打架。

“你什么意思？”他突然大声说。

“保护你们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土地。”我平淡地说，
不在乎这样的回答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没有夺取任何人的土地。多莱是在公共土地
上建造的。”

“即便是，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用？”

“因为是允诺给我们的。整个圣地以色列都是我们
的。”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住哪里？”

“你们有你们的，我们有我们的。”

“但是你们不断扩张，占用更多土地，没留下多少
土地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需要另一个国家？你们已经有二十一个阿
拉伯国家。我们却只有一个。”



我想离开，继续我的漫步，不想再听下去了。我让自己落入了什么样的境地？这个年轻人利用官方的宣传在鹦鹉学舌。我为什么要让这种讨厌的废话破坏我漫步的兴趣呢？

“你就不能自己动动脑筋吗？”我不假思索地冲口说道，开始申斥这个年轻人，尽管我原来决定不和他理论。“你只能重复别人告诉你的话吗？”

他惊异而蔑视地看着我。他不想忍受这个。好，我心想，也许现在我要表达一些真正的感受和真实的想法了。

“你知道你站的土地已经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了吗？是我们保护这个地区。如果没有我们它就会被破坏。作为一个漫步者，你应该感激。”

我真不能相信。我又说：“你们在保护我们的土地？你们的推土机在山里挖路所造成的损害，倒混凝土修建殖民地，还声称是在保护这块土地？”

“已经禁止在这里建筑、毁坏小路或摘野花。没有这些规定，这个美丽的景点将会被破坏。”

“让我告诉你这里是一个真正的自然公园时的样子吧。你们来搞破坏之前，这里没有任何新建筑，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噪音。鹿在有台地的山上跳跃，还有野兔、

豺和狐狸，成片成片的野花。那才是公园呢。它几百年都保持着原样。”

“没有什么可以几百年不改变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你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做。只是你们缺乏物质和技术条件，无法供水供电。看看这里的村民，你的阿拉伯同胞，他们还要从山泉打水。我看见他们每天早晨挑着沉重的水桶跋山涉水。没有水的生活一定像地狱一样无法忍受。再看看你们的人在上游野餐的地方。塑料袋、一次性盘子和杯子，还有烧烤剩下的鸡骨头等等，一堆堆丢弃的垃圾。你们缺乏实际知识和纪律。把规划和法律强化留给我们。我们在空旷荒野里建造了很多城镇。特拉维夫是在沙丘上建的，看它现在多有生机。将来这里也会是一样。”

“但愿不会如此。”

“我爱这些山不比你少。我在这里长大。这土地的面貌和气息是我神圣的一部分。我到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这么开心。每次离开，我都盼望快些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你管这个溪谷叫什么？”

“多莱谷。”

“山泉呢？”



“艾恩多莱。”

“以悬铃树命名的。你们叫多莱，我们叫戴博。”

“难道春天不是很美吗？”

“尤其是这里。”

“是的。今年雨水比往年充足。”

“对这个地区是很不寻常的。”

“这里还非常安静。”

“这也很不寻常。”

“你准备去哪里？”

“没有特别的目标。我是来看看山谷怎么样了。有好一阵没有散步了。”

“我也喜欢散步。我经常在这些山里走。”

我屏住了呼吸。我想脱口说出我知道的所有诅咒：你们，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像主人一样在这里散步，而我却像罪犯一样在少数受控制的小路上走。不过这次我保持住了沉默。

“你们会在拉马拉救火吗？”我问。

“你们有自己的消防队员，我想。”

“如果他们应付不来向你们求救呢？”

“你保证我不会被处以私刑吗？”

“我们又不是那么没有人性，如果你来就会发现。

你去过拉马拉吗？开车只要几分钟。”

“没有。长大后没有。”

“小时候去过？”

“是的。我们过去经常穿过城市到贝特伊的学校去。但我不记得什么了。唯一的记忆是有人朝我们扔石头，凶猛恐怖的阿拉伯人朝我们扔石头。他全身裹得严严的只露出眼睛。他愤怒和憎恨地砸我们。石头打在玻璃上的样子让我感觉到这些，什么都没打坏。我们也没有谁受伤，但是我心里的东西毁掉了，留下的也许是永远的伤痛。这比我们被碎玻璃弄伤身体还要严重，因为那还会愈合。我非常害怕，上学哭了一路。不是因为老师会怎么想，而是因为那些石头，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么憎恨我们。到学校时我问老师原因。”

“她怎么回答的？”

“因为他们是坏人，”她说，“他们憎恨犹太人。所以我们要强大起来保护自己。”

“那么你仍然这样认为吗？”

“我和阿拉伯人没有什么接触。现在我们有自己的路。”

“山谷路？”

“不是，我们已经不用那条路了。”



“你们无缘无故挖我们的山。”

“修路是进步，不是破坏。”

但愿他知道军队使用的那条路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打算告诉他。我想他不会明白的。

“我希望你知道你们在这里的存在意味着永久的战争。”

“为什么？”

“因为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却拒绝承认事实。”

“那么假如我们还给你们：你们能保证不要回迦法和海法吗？”

“按照国际法怎么样？”

“那是为弱者制定的法律。”

“它是更美好更文明的标志。”

“我当了三年兵。我要保护我的家人为之斗争的一切。是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的存在是你们必须忍受的事实。我祖父死于独立战争。”

“为谁的独立？”

“英国人的。”

“但是他们来掠夺我们的土地给了你们。你没有读过委任托管条款吗？”

“他们限制我们。他们不允许移民来。他们想让我

们只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小块地方。以色列不可能是有发展的国家。我们要摆脱他们，做自己的事情，不受任何人阻挠，能够欢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犹太人到这里来。”

“你们会对 1948 年夺走的田产做补偿吗？”

“如果你们在开罗、巴格达和也门给犹太人补偿的话。”

“我们和埃及、伊拉克和也门有什么关系？问他们要去。它们是不同的国家。据我所知，所有失去财产的人都应当得到补偿。但你不应该把两件事搅在一起。”

“他们是阿拉伯人，不是吗？”

“你只是在重复别人告诉你的话。如果你想自己说的话，你会意识到它有多荒谬。比如我们认可你们保持殖民区，你们会愿意被限制在建好的地区吗？”

“你想把我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犹太区，我们在欧洲已经经历了那些。绝对不能再来了。”

“那么如果你们想扩展到全地，会让我们在你们殖民区里购买和租借土地吗？”

“不会。这些是犹太人的地方。”

“让我们假设你们的殖民区是建造在你所谓的公共土地非私人土地上。什么人会同意自己国家的土地被切



割出来，分给别国的人，而连自己都不允许分享呢？”

“但是你们不是一个国家。你们从来没有自己的政府。”

“你是不是要重复戈尔迪·梅厄森（Golda Meir）的著名论断，说巴勒斯坦不存在？”

“不，我没有那样说。我知道你们存在。我可以看见你站在我面前。我知道你不是以色列人。你确实存在，没错。但是你们没有，从来没有国家存在于圣地以色列。”

“那么你们有吗？”

“当然。这里的朱迪亚（Judea）就有我们的一个王国。”

“那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

“那又怎么了？”

“除了耶路撒冷与希布伦有很小的社区，西岸从那时起就没有犹太人了。这块土地一直主要是阿拉伯人居住。你认为这不算什么吗？”

“犹太人花了三千年时间才回到自己的土地。这是我们唯一的国家。而你却要让我们放弃它？”

“你们想要全部土地，不想分享。你不觉得是偏见吗？”

“对什么事情的偏见？我们做错了什么？你喜欢散步？我们划定地区作为自然保护区禁止任何人在上面建筑，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这些地方。”

“自从你们的人来后我就无法享受这些山了。散步时担心挨枪子遭逮捕。这里曾经像天堂一样，每个泉边都有带花园的房子。小得不显眼的房子，没有用水泥建造的。然后犹太人来了，像蛇一样毁坏了理想花园中的一切。你们把一切归罪于我们，不是吗？但是不要紧。我们已经从磨难重重的漫长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存在不应该由你们的接受为前提。我们早已懂得要在这里活下去就必须坚强。”

这之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让他意识到那些声称热爱土地的人对土地做了什么。我说：

“沿着这条路我们会到达一片被道路划成十字的地。我能想象我们都是在圆圈里绕来绕去。不论它叫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都将变成一个混凝土大迷宫。”

他没说话，手里还拿着我的湿帽子。我们两个都站着。



“你要把帽子给我吗？”我问，“我想要继续散步了。”

他迈了一步。我伸手接过了帽子，转身离开。我可以感觉到殖民者的存在，他拿着枪就在我背后。然后我听见他叫我停下来。听起来更像是命令、法律，他的法律给他权力发出的命令。我担心发生更糟糕的情况。不过我转过头发现，他不是在威胁我。而是用手指着烟筒。

“你想和我一起抽烟吗？”他问。

他的邀请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凭着直觉是最好的选择的经验，我感觉这种场合不能拒绝。

我找了一块舒服的石头，腿向水边伸直坐在他身旁，接过烟筒，在我们以同样名字称呼的小溪边，它以同样的树命名的，只是各自发音不同。

浓烈的烟草开始起作用了，在这些山上另一次漫步的记忆涌进我脑海。那次我是和朋友碧莎拉（Bishara）在黄昏的艾尔达（El Wrda）溪谷。我们在长满樱草的岩石下方的艾恩伊扎（A ‘yn El Lwza）旁的石头上坐着，离这儿不远。我们走了很久，很开心，准备返回前休息一会儿。夕阳西斜，漂石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浓。色彩在变换，把我们熟悉的群山变成一个寂静的世

界，只属于我们。穿过我们的田地，像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幻影，一个矮个子男人小心翼翼地走着，仿佛在度量。在那一刻我做了最坏的推测，我们美丽群山的可怕未来的消息。那之后不久，就开始修建连接多莱和贝特伊的殖民者公路，刚好经过那个人横过的小路。他一定是为殖民者效力的阿拉伯承包商工作的。那以后山就永远变了样子。

我们轮换着抽烟筒，烟雾在水上汨汨穿行。我深深吸进，听着溪流轻柔的低语在岩石间滑过，悠悠鸟鸣以及我遮住的一切声响和景色。我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竟然心甘情愿的和殖民者分享这些山。不过我又想到：不管情况怎样改变，这些山还是我的。它们也属于欣赏它们的任何人。如果我推迟享受，可能就永远不能实现自己计划这么久的漫步了。就像被人指责父亲遭谋杀后还喝酒的阿拉伯诗人说的：今天是酒，明天是另天。

对时局的紧张感，经过 C 区的担心，遇到士兵或殖民者的可能性，遭枪击或失踪，这种种忧虑都烟消云散了。每吸一下烟筒，我都渐渐回归自己，进入这块土地未经蹂躏和变形之前的景象，每一座山丘，每一条水道，每一块岩石，还有我们与之和谐共处的居民。



这年轻人鼓弄烟还真有一套，我想，他是个天才。

“这里面有什么？”我问。

“是加了鸦片的大麻。”

我能充分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悲剧和摆在我两个民族面前的战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但是现在，我和他可以坐在一起暂缓一下神经，抽抽烟，暂时被共同热爱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远处传来了枪声，让我们两个都颤抖了一下。“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问。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同意先不管它们，此刻我们能听到的声响，只有烟筒汩汩的水声和我们珍爱的岩石间涓涓细流的轻声漫语。

尾声
戴面具的牧羊人
拉马拉到艾恩伊扎

我是在爱丁堡认识的路易莎·沃 (Louisa Waugh)。她是作家，写过关于蒙古的书，在那里住过三年。她说有兴趣作为志愿者到巴勒斯坦来，我帮助她在网上人权刊物《巴勒斯坦观察》找到了工作，那是我的朋友穆斯塔法·巴古提创建的。2007年6月，在抵达处在危机和冲突的巴勒斯坦之前，格拉斯哥《先驱报》委托她写一篇相关文章，与《漫步巴勒斯坦》一同出版。当然她也想和我一起体验一下漫步的感觉。我想如果我们能单独进山，那是最好的了，虽然我知道在这紧张时期这样做不够谨慎。选择一番日期之后，我们把散步安排在星期五，即8月13日（有人会说选的日子不好）。天气宜人，我们决定下午晚些时候出发。这次远足不算长，路易莎说只想感受一下山。

我们不能从本书中描写的其他几次漫步开始的地点出发，因为现在这个地区塞满了高层住宅——一些宏伟矗立，一些建到一半，还有些仍在打地基。碎石从山上滚落。我妻子佩妮开车把我们送到镇外，可以俯视远处的多莱犹太殖民区，还有它下面的巴勒斯坦村子艾恩昆亚。

我们到了一个海角，朝第二次漫步描写过的山谷望下去，破坏性的殖民公路给它镶上了边，那是 1990 年代中期修建的，用以连接多莱和贝特伊。不过，现在只供以色列军车使用。很久以来，我就担心会遇到军队，这让我不敢在这些山谷里行走，但今天是犹太人安息日，是他们的周末，我想我们不太可能遇到以色列军用吉普。我们期待地向下望着还看不见的山谷，我问路易莎是否想继续。春天我曾开心地随巴勒斯坦徒步旅行队一起去更远的山谷漫步过很多次，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不能确定独自进谷是不是个好主意。但是路易莎说她很想去，我也好奇的想看看我 1980 年代经常每周都散步的土地现在怎么样了。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下，我们穿过种着百年老橄榄树的有台地的山坡。

这个季节的最后一场雨在 4 月初已经下过了。和我预想的一样，到处都干干的，只有一些多汁植物和地榆

刺覆盖着灰色石灰岩周围的地面。远处有狗叫，我们商量着，如果是野狗应该怎么做。路易莎说应该朝它们奔过去，把它们吓走，而不要表现出任何恐惧的神情。“它们很善于察觉恐惧，”她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拿着多刺的树枝靠近，它们会误以为我们是来袭击它们的。我说，地榆刺可以拿来当武器。她说，在蒙古行走，最大的问题就是被野狗袭击，有的野狗还患有狂犬病。不过，我们听见的声音很远，没有机会让我们试验一下各自不同的防御装置。

我们到了艾恩伊扎（杏树泉），荒废的别墅就在不远处。我们对面是今年早些时候还装饰着樱草的漂亮岩石。山泉给在这里放牧的成群山羊和绵羊提供必须的水源。泉水形成一个肮脏的暗绿色小池塘，有青蛙在里面聒噪，还丛生着荷兰薄荷以及普通的芦苇。但是旁边蜿蜒的小径几乎被完全淹没了，被1992年非法修路时滚落的大石头阻塞。几百年不变的美景被摧毁，竟然没有引起愤怒。我在乱糟糟的岩石上坐下，试图回忆从前的景象，默默哀悼曾经美丽的山谷就被这样摧毁了。我不知道像路易莎这样一个不了解山谷过去的人，会对山有怎样的感觉。

随时都可能有以色列军用吉普从上面的路上开过并



看见我们。他们会命令我们上去，把我们逮捕。这个山谷是奥斯陆协议称作 C 区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没有以色列军方允许是不准冒险进入的。我们当然没有得到许可。我不愿细想这些，尽量把回忆集中在以前那些难忘的下午，那时，远足后我常常坐在泉边，看夕阳从不同角度照在阶梯墙上。

我们休息时，路易莎给我讲述她在巴勒斯坦领地生活的印象。她说：“你们巴勒斯坦人总是在等待。在检查站等待，为拿到通行证等待，要早早到机场以确保可以通过。你们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的等待。你们怎么能忍受得了？为什么不叫喊？”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向忍受老年侮辱的“蠢人们”问过这个问题。而它让我想起的是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小说《太阳底下的人》（*Men Under the Sun*），写的是巴勒斯坦工人被封闭在集装箱里从伊朗偷运到科威特，最终窒息而死的事情。卡纳法尼也在询问为什么他们不叫喊？也许我们叫喊了太多年了，但毫无作用。现在路易莎所能看见的是一个默默忍受的民族：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在等待。

从上一级岩层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仿佛有人用硬物敲打着干燥的树丛。不可能是动物发出的声音。是什

么人在上面呢。几分钟后，两个年轻人出现了。他们的脸上蒙着黑白格子的巴勒斯坦头巾，只露出眼睛，手持粗长的棍棒，朝我们走来。

他们先是找我们要水。喝完又问：“你们是哪里人？”

“拉马拉。”我回答，但是感觉他们并不相信。

“为什么到这里来？”

“散步。”我说，意识到他们对此更加不信。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悠闲漫步，这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很荒谬的。

“但是你们知道来这里是很危险的。”

“是的。我知道殖民公路和军用吉普。”

“那为什么还来？”

“你们出生前，这条路还没修好前，我就一直在这儿漫步，你们又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值班。监视看有什么人来。”

我忽然感觉熟悉的山谷不再是我的了。上面的殖民公路很安静，没有车辆经过。它在山谷边上，框住了山谷，但不是唯一的掠夺者了。

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在第二次猛烈的抵抗运动中他们还是少年。他们只知道剧变和混乱，不会记得我多年熟知的山谷曾经是安全的田园。他们一定以为，



任何来这里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人不可能是本地人。他们又问了一遍：“你们究竟是哪里来的？”

我再次说我是拉马拉人。

“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身份证件吗？”

我拿出律师证。

“她的呢？”

“她是英国人。”

“她的证件呢？”

但是路易莎没带证件。这是我的失误，如果军队知道了，我们就会被抓起来。这里的法律规定要带身份证件。

我解释说我们没打算走远。她没有带手袋。

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在要求携带身份证明的环境下长大。免带这些文件的特权是占领者才有的，所以她一定是他们的一员。

“我们怎么知道她不是以色列安全局的？”

“因为她和我一起。如果她是那些人中的，我还会和她一起散步吗？”我说话的时候眼睛挨个直视他们。我注意到小个子的那个面善一点儿，高个子火气大也更好斗。我对前者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用最客气的态度说：“见到你们很高兴，不过我们得继续走路了。”我准

备走开，路易莎在我前面。

我们已经走了几步又被叫回。这次两个年轻人不那么礼貌了。

“你们想去哪里？我们没弄清楚她是谁不能放你们走。我们要对‘坦济姆’^①负责。”

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是组织或武力青年团。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哪一种，也不想问。

“我们受命把守这些山，报告有谁来过。不知道她是谁不能让她走。”

“我告诉过你们她是英国人，到巴勒斯坦来做志愿者。以色列安全局为什么要派人到这里来？”我想到路易莎的红头发，但是说完这话我意识到这些年轻人不可能知道以色列妇女是什么样子。他们只见过以色列士兵。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

“我带她来看看我们美丽的山。你们刚才过来时，我正给她描述殖民者修路之前这里的景色。你们太年轻了不会记得。这里曾经就像小天堂一样。你们能想象这些大石头上面没有公路落下的碎石，前面的小径没有被落石遮住时的样子吗？”

① 坦济姆 (Tanzim)，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听着，但好像并不感兴趣。他们被不安、狂暴的现实吞没了。他们只了解这些。这里的过去显然是另一个国家。

我耐心地和这些蒙面的孩子争辩，说我可以担保路易莎的清白，请他们务必放行。

“不行，”他们说，“如果不是你我们应该立刻杀掉她。杀掉有罪的英国人是正当的。”

我恳求地望着他们。他们的眼睛像许多少年一样水汪汪的，但显得不安。“你说什么？”我问，尽量克制我的恐惧和愤怒，不让他们看出我的感觉。在占领区生活了四十年，我可以依靠我这方面的经验。

“难道你没说她是英国人吗？英国人是我们灾难的起源。”然后他们转向路易莎问她：“你认识巴尔弗吗？”

路易莎迷惑地问我：“他们说巴尔弗什么？”我忍住微笑说：“他们问你认不认识他？”

高个子的继续问：“你知道布莱尔吗？阿兰·约翰斯通呢？”

我笑了。我想就此开开玩笑。“你们怎么能把这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归罪到她头上？”我辩护道。

“难道不是英国人杀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吗？

成千上万的无辜儿童因为她被杀害。没有你我们会在这儿马上杀了她。”

“但是你不应该让她为他们政府的行为负责。她离开国家是来这里志愿服务的。这难道不说明她是反对那些政策的吗？”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为什么你和她在一起。她是你妻子吗？”

我说不是。

“那么你怎么能单独和一个女人来这里？伊斯兰教对此不能宽恕。”

我尽力表现出高傲的姿态回答道：“但是我相信自己，你们绝不能指责我不道德，否则是对我的不尊重。你们认为我来这里是为了不道德的目的吗？”

“你是穆斯林吗？”他们问。

我说了谎。我想这样我可以对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更有主动权。

“那么她可以走了。你留下来，等她拿回身份证件给我们看。”

“你说什么？”我被激怒了，“她不认识路。”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我变成了这些挥舞棍棒的年轻人的人质，他们不许我继续在我走了这么多年的山里漫



步。我又想起了路易莎的话：“你们巴勒斯坦人总是在等待。”现在我在等待年龄不足我一半的青年允许我离开。巴勒斯坦青年玩着和我们的压迫者同样的游戏。我们本可以对以色列占领者持共同的看法，但是我的世界和他们太不一样了。他们更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他们短暂的生活中只有危险和不安，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别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敌意。它出卖了他们，他们要保卫自己的世界。阿拉伯人的慷慨被诡计多端的殖民者滥用了一一先是英国人，现在是以色列人。所以抵押人质是正确的。他们想逮捕路易莎，但似乎不知道怎么操作。他们还在接受训练，锻炼他们的肌肉，就像少年人经常做的。每当想要强调某一个观点，他们就威胁地举起手中的棍棒。

“我们有责任，”高个子继续坚持说，“我们必须报告看见的每一个人。”

我希望这事尽快结束，不要再有麻烦甚或悲剧，但我知道不可能。

“你们为什么不给上级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我问。“他们会知道你在和谁打交道。”我自信地说。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你的身份证件。”他们回答，意思

是指以色列签署的那种。

“你们知道我是律师。”我说，然后意识到他们也许不识字，看不懂律师证上我的以色列身份证号码或名字。这时我改变了策略，我利用年龄的优势，设法用长辈的语气说话。

“让我们仍然做朋友好吗，”我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了。但是走之前我要让你们知道，让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山里散步，了解它们的历史，感受它们的美景是很重要的。而你们这样做是阻止人们来这里。”

“美景？”高个子脱口说道，看起来很生气，“每天有这么多人死掉，你还要求我们关心美景？”

“可是那仍然是很重要的。”我咕哝道。

“你说你们要去哪个方向？”

我指着我们的路。

“那边有很多野猪。”

“我们碰碰运气吧。”我一边说，一边拔腿走开。

“等等，”他们叫着，“我们必须拍下你们的照片你们才能走。”

的确他们有移动电话，可以用来拍照。

“现在可以走了。但是别回头。”

我们迅速爬上山。路易莎的软运动鞋不适合爬这种



石头山，但是我们都想尽快逃离两个蒙面的年轻人。走了好一会儿，我们停下来回头看，听见他们大声叫我们继续。我们不得不错过了这条路上所有美丽的地方，包括幸存的别墅和我想让路易莎参观的一切。

走到更远的地方我们才停下来，在一个废弃别墅的石头上坐下。现在，我有时间回想我们遇到的是不是靠近艾恩昆亚泉的贝督因营地的牧童，他们整天照看山羊，厌倦了，想和我们玩个游戏，不顾我们会有怎样的代价。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么热的天要戴着厚厚的头巾？他们用头巾把脸遮住的样子，挥动棍棒的方式，都超出了我对没有电和电视的山边营地出来的牧童的想象。而且他们怎么知道巴尔弗或阿富汗，怎么会有可以拍照的手机，又有谁会知道这其中的究竟呢？

站在山谷里我最喜爱的一个地方的废墟里，靠近我出生和一直生活的地方，我感觉这些山不再属于我了。我不能再来这里自由漫步了。它们变成了危险之地，让人不安。这次经历标志着一个美好时代的结束。

不能否认，这次遭遇让我震惊。的确如此。每一刻，我都担心情况会恶化。他们是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着棍棒，我则身材瘦小而且不会打斗。更严重的是，我没有带手机，路易莎也没带。如果他们决定对我

们动粗，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人会听见我们的叫喊来救援。通常遇到蒙面的人，我都会特别喋喋不休，因为我意识到，只要我看得见他们的眼睛，就能够和他们沟通，看出他们的想法，接近他。只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就能保持镇静和理智，至少控制住自己的恐惧。

可是，当我转身去看路易莎，我看到她眼中含满泪水。一个人刚刚来到世界上这么暴力的地方，而且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她自然会受到惊吓。“我不介意被拍照；但是如果他们打你，强奸我，我会死掉的。”

从山中离开时，我转身看着西沉的落日，看着我们所站的山坡这一侧沉没在阴影里。山谷对面，石灰岩反射着柔和的光芒。我和山谷告别。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在我有生之年，也许在和以色列可恶的冲突及其所有后果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来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漫步巴勒斯坦

作者=

页数=225

SS号=12671127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